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4620 2

挫敗的三十年剖析

香港抗爭運動史

林匡正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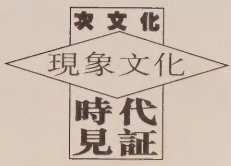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林匡正 筆名武大郎，一九八三年生於太平盛世的香港，熱愛中華文化，以中國人身份感到高興，以振興社會為己任。曾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和英國波爾矛夫大學。著有：《八十後運動》、《香港大崩壞》、《夾縫•九十後看中國》、《激進．香港進步民主運動史》。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46202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九十七

香港抗爭運動史

挫敗的三十年剖析

林匡正⊙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⑨⑦

香港抗爭運動史 • 挫敗的三十年剖析

作　　者：林匡正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4年7月初版
書　　號：SCB613
ISBN：978-962-992-351-8
定　　價：HK$118

© 二〇一四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言

讓香港人坦誠面對自己的政治歷史

陳志宏

香港大學講師

香港人當初對回歸中國大陸的種種憂慮，並沒有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馬上湧現，然而時至今日，中共對於香港行政的干預，及其在港代理人出手之粗暴橫蠻，顯明噩夢已經成真。過去在國際舞台上被中英兩國呵護有加的香港，忽然掉落歷史的深谷、政經的邊緣之中，一時間民情躁動與對立，加上政治改革路上失敗連連，使人來不及整理出未來的棋步。

在成功時候拚命的往自己身上堆砌理由，在失敗時候拚命的諉過於人，這都本是人性之本質，最終叫人盲目。這種描述用之於香港人解讀自己過往三十年的歷史的態度，更是貼切不過。從今天香港各個主流政團的政治改革藍圖來看，其手法之守舊，表現之疲憊，都可見到他們並沒有全面總結過去成敗之經驗，從中我們也可見到，坦誠面對香港政治歷史的必須。

香港過去紀錄自身政治歷史的角度，多以紀錄磋商及揭秘檯底交易為主，這固然反映磋商與檯底交易在香港過去推動政治步伐的作用。然而此等經驗在 2014 年的今天的啟示價值又是否足夠全面？又是否足夠全面否定抗爭在今天政治進程的反向推進作用？在五十年不變餘下三十多年的今天，香港既已沒有蹉跎歲月的本錢，也沒有假手於人的選擇，分析過去的成敗，與爭取未來的本錢，都只可以靠香港人自己的智慧與膽識。

「前途一起期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草《基本法》的宣傳口號，期待至今，餘下了我們現正面對的局面。香港以政治改革保存香港人既有生活方式遭受挫敗的現實已再不容逃避，香港人的前途該是靠爭取，而不該是靠期待。讓我們透過作者的剖析，坦誠面對香港自身政治歷史，同時開始深入思考未來爭取民主的積極可行之道。

前言

林匡正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中人必有不滿；有人的地方必有紛爭，有紛爭就必有爭鬥，此乃人性使然。而為自己謀求利益，甚或為大眾追求公義，也是人之本性。所以，不論甚麼社會，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爭取行動、抗爭運動、社會運動。抗爭文化、社會運動，就像娛樂、經濟、政治，就好像人體內臟般，是一個完整社會入面必然出現的元素，

1842 年《南京條約》，滿清政府要將香港島割讓給香港，令一個漁火閃閃的漁村成為一個華洋雜處的殖民地社會，再慢慢發展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大都會」。而這百多年來，香港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抗爭運動、社會運動，好像上世紀二十年代，聲援中國反帝愛國運動的「省港大罷工」、五十年代的雙十暴動、六十年代的六七「運 / 暴動、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與中文運動、八十年代的爭取八八直選運動等等，不論經濟低沉期，還是商貿繁盛期，社運都會隨之而來。

有階級高低之分，就必定有抗爭，因為「抗爭」是指由下而上的反抗，是低層 / 下層人民，為爭取他們認為應有的權

利，進而反抗上層統治者的行為。因此，所有由下而上的爭權行為，皆可視為「抗爭行動」。階級之別，可以權力、財富、社會地位去劃分，只要有不平等之處，例如較富有者比較貧窮者享有更多利益，或某些種族在社會上壟斷一些支配地位，都會製造出階級之別。

而同一階層內的紛爭，因地位平等相同，乃「鬥爭」，乃互相爭鬥，務求壓過對方，使對方成為比自己壓住的更低下階層。而上層，即權力較大的人群，與下層，即權力較細的人群，發生紛爭，務求阻止下層人士爭權或進一步剝削下層人士權益，則叫「打壓」甚至是「欺壓」。

涉及公眾利益的抗爭行為，可喚作「社會運動」，例如爭取大眾人權、爭取社會上某群體利益的抗爭行為，都是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的出現，不外乎幾個因素。

社運出現的原因

抗爭行為與社會運動的出現，不外乎幾個因素。

首先是表態，亦即發表意見、表達訴求，乃社運最基本出發點。此即人們對社會某些事情產生意見，希望尋求改變，進而發聲表達訴求，希望意見會被有權者接納，從而改變那些事情。例如透過遊行示威，表達對某些政府政策、公共政策、甚

或是制度流弊的一些意見。

其次，是爭取其他人民的認同，一起參與爭取行動，或最低限度，不親身參與，也不要反對他們的爭取行動，務求壯大爭取力量，從而令當權者感到壓力而讓步，甚而答應訴求。因此，在抗爭行動中，對外、對他者的宣傳是必須的，務求得到更多認同，得到更大力量；希望透過宣傳，使他者「覺醒」、透過行動，感染他人，令「沉默」者也支持以及加入行動。

當然，要使到他人認同，必須出師有名。例如，必須讓別人認為你的訴求是合理的，甚至與他們的生活、性命財產相關，令別人產生共鳴。因此，宣傳手法與行動的道德感染力，乃能否壯大抗爭力量的關鍵。

表態與爭取，可以是一次性的，可以是長久持續的，視乎爭取者的堅毅程度，以及訴求是否實現。

社運的層次

社會運動與抗爭，可劃分為數個不同層面。

最低層是純粹表態，把訴求帶出，然後讓議題在社會發酵。遊行集會、遞信、在諮詢會發表意見、投稿給媒體、發表文章，乃表態。

更高層次，是除了表態之外，還嘗試給予當權者壓力、增

加當權者的營運成本、打擊當權者聲望，務求訴求受理、意見不被漠視，從而出現改變。大型示威、聯署聲明譴責政府、衝擊當權者、透過道德感召去號召更多人參與遊行集會（例如絕食、自焚）、製造輿論壓力等，是不同施壓的例子。

香港民主運動的誕生

社會就像人一樣，有優點，也有缺點；有美麗的地方，也有醜惡之處，所以社會必然有需要改善的地方。社會也會隨着時間流逝而不斷成長，就像人會年華老去一樣。因此，某些事情，今日可能盡善盡美，他日隨着歲月流逝，也會變質，出現有待調整修理的地方。

有能力才能帶來改變，但有權力才能決定是否進行改變。政府乃人民的公權力代言者，代表人民運行權力去保障大家，代人民運行公權力，包括是否改變一些牽涉大眾權益的事物的決策權。因此社會運動的矛頭，多是向着政府而發。

政府由人組成，更由制度所組成。所以世界上不同地方，也希望完善制度，或使制度可以與時並進，務求從制度上可確保代為執行大眾公權力的政府，是以大眾的權益為本，以「天下為公」，即是常常說的「以民為本」、「以民為主」。而爭取改善 / 完善制度的行動，可稱之為民主運動。

過往百多年，香港由於是殖民地，被外來者統治，主權不在自己手上，政府乃以宗主國（英國）為本，而非以民為本。因此過往百多年，香港人對改變制度的信心與意向不太濃厚，因為要改變香港被外來者統治的狀況，就必須革命。奈何，不知是基因問題、是小農 DNA 作祟，還是怎樣，香港人一直缺乏推動推翻港英政府革命的決心，只是追求英國政府能好好地看待殖民港人。因此在港英時代，大多數的社會運動，都是訴求改善生活質素的民生議題，例如改善居住環境、改善衞生環境、改善勞動環境等，希望政府政策可以好好照顧「被統治（被外來者統治）」的香港人、能夠公平對待香港人，所以過往的社會運動，以民生訴求為主體。例如六十年代反對天星小輪加價風波、八十年代初的反加風浪潮、的士騷亂、七八十年代的艇戶居民抗爭、八十年代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廠……

另一個過往社會運動主體，乃身份構建運動。作為香港人，普遍不會認為白種的英國人是同根同種。而在港英殖民時代，「被統治」的香港黃種人，地位當然不及宗主國的英國人，甚或宗主國賦予更高地位的其他有色人種。在生而較低等的情況下，燃起了人類不滿不公平待遇的本性，於是部份香港人會透過反殖反宗主反不公，去爭取回應得的平等地位；一些則透過尋找香港人的根，來構建身份，去尋求安慰。在港英時

代，普遍香港人認為香港的「根」就在中國，因為香港「自古以來」，是中華地區的一部份；香港人是華夏民族，是炎黃子孫，所以香港的根就在中國。因此，過往也會出現六七工運／暴動、中文運動這些反殖運動，也會出現一些協助「根源」，即協助中國的運動，例如新界居民勇武抗英兵、多次救濟接濟內地親友的行動、保釣運動、在辛亥革命期間，成為革命宣傳基地，協助「內地同胞」，一起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政權。也由於香港居民，很多是從中國逃難或移民到香港定居後才落地生根，例如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中共土改革命、中共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數次大型逃難潮與移民潮，因此，很多香港人在港英時代，甚或現在，也認同香港的根在中國，因為香港人是中華民族其中一個族群，甚或是中國內地移民。故此，在殖民年代，香港人也透過一些支持中國內地政權的運動，來構建身份，也許也趁機彌補「被殖民」的心靈創傷。例如省港大罷工、雙十暴動（分別向藍色中華民國政權與紅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表示效忠）……

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被談，令香港人意識到，原來香港人也可以有自己當家作主的一天；意識到，不用革命，香港人也有自己管治自己的一日。所以在中英談判期間，香港人的民主意識才開始較廣泛地滋生起來。因為在那

時開始，才意識到當到了當家作主的一天來臨、當到了自己管治自己的一日來臨，是需要建立一套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制度去管治、需要建立一套以保障香港人民權益為主體的制度。因此，在八十年代起，香港的社會運動主體，由以往爭取改善民生為主導的抗爭，或從反殖去構建身份認同的抗爭，也加上了以爭取民主為主體的抗爭。所以香港在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聯合聲明》誕生，確定香港人能有當家作主一天、能有建立自己制度的一天，才正式廣泛地展開屬於香港的民主運動。這就像學者羅永生所說「1982 年的中英談判，同時啟動了迄今『仍在進行』的民主運動」。

而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在香港開展民主運動的第三十個年頭，來個小總結，探討、剖析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的成敗得失，也會揭露香港各大民主派的思維與真面目。

而從抗爭手法與信念思維角度分析，這三十年間的香港民主抗爭運動，又可分為三個波浪 / 浪潮：

第一波民主運動——回歸浪潮；

第二波民主運動——保育浪潮；

第三波民主運動——本土浪潮。

故，此書名為《香港抗爭運動史——挫敗的三十年剖析》。

目錄

序言——讓香港人坦誠面對自己的政治歷史（陳志宏）

前言

第一章 • 第一波民主運動——回歸浪潮 3

第二章 • 第二波民主運動——保育浪潮 51

第三章 • 第三波民主運動——本土浪潮 97

第四章 • 左右互搏 155

第五章 • 傳統民主派的危機 179

第六章 • 新媒體運動 235

第七章 • 沉默的港人？沉睡的港豬？ 257

後語

香港抗爭運動史

挫敗的三十年剖析

第一章・第一波民主運動——回歸浪潮

香港抗爭運動性質

在前言已約略提及過，上世紀香港的抗爭運動，大致上可以分為四種：

⑴ 民族情義結的抗爭，為港人身份的「根源」中華民族去抗爭，例如聲援 1989 年的北京學運、保釣運動、1982 年反對日本教科書篡改侵華歷史運動；

⑵ 民生議題，爭取改善生活質素，例如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房屋問題、大坑東重建問題、反對南丫島興建油庫等；

⑶ 民主議題，爭取改善制度以保障香港人的權益，例如爭取普選；

⑷ 反殖行動，出於民族情意結、對生活狀況不滿、對制度的偏頗與不公平而出現不滿，便出來抗爭，反對港英政府管治香港，乃以上三大種類的混合版，例如六七工運 / 暴動。

我討厭政治

人的一生，總會不停地為前途擔憂和打算。人會為感情前途擔憂、會為生活前途擔憂、會為子女前途擔憂、會為雙親安老問題擔

憂。因此人生總是充滿喜、怒、哀、樂，當擔憂暫時被解決，例如子女找到好的學校升讀，會喜；當生計前途不穩定或不符預期，入不敷支之餘，同時又要供養父母與子女，會憂心。

可以說，人的前途受着各種因素影響，社會因素、週邊環境、經濟氣候也有直接影響，就連政治因素也會對每個人的前途有直接影響，因為政治關乎社會以甚麼制度、法律、基礎去運作，因此有時看到一些歌影視明星，或因怕談政治而影響前途、或因覺得政治千變萬化而衍生紛爭不斷，但又想突顯自己「純潔」、「高貴」而說出甚麼「我討厭政治！」，那不是無知，就是虛偽。

民主不是靈丹妙藥

人們很自然會關心由誰當權、由誰代表大家運行公權力的問題，因此，理想的制度，是運行公權力的政府，因為是代表大家，最好由大家自己選擇與授權，所以每個地方的人民也會不斷爭取民主，因這是對大眾最公道、最公平的做法。而政府運行制度，也直接影響公權力的運用是否「對得住」大家，所以每個地方的人民，也會不斷爭取完善管治制度，務求制度的設計與運作，是以受服務對象的大眾為根本。所以不斷有學者研究、發表論述，尋求制度應

該怎樣運作，才能最保障社會持份者的權益，不會偏頗任何一方，例如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的啟蒙思想能千古流頌；而一些主張獨裁專制、違反公平公道原則的制度或人物，從來也是歷史科的反面教材。

而那些為了保障自己或背後老闆既得利益的政客，說甚麼「民主不是靈丹妙藥」去詆毀人民正常的爭取民主行動，是無賴所為。

香港前途問題

在殖民時代，由於主權不在人民，而是在於侵略、在當地撈油水、搾取當地資源以壯大侵略者利益的宗主國，所以大多殖民地人民，在爭取民主前，會先爭取反殖、反宗主國、獨立、踢走侵略者，讓自己能當家作主先。所以非洲國家人民策劃革命反英國、法國等殖民帝國，便是這個原因。

香港有百多年的時間被英國殖民統治，或因人民心理質素問題、或因英國對香港的「愚民政策」與「愚民教育」、或因港英政府軟硬兼施的手法高明，香港人較少推行反英革命，反而更多支援中國內部的革命。

但當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出現，香港人原來可以

有「當家作主」的時候，香港人便勇躍爭取民主、爭取屬於香港人的制度、爭取能夠保障香港大眾權益的制度起來。而香港的前途問題，中英談判，可追溯至 1979 年 3 月，時任港督麥理浩，應時為中國外貿部長李強邀請，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面，商討新界續約問題，即英國方面希望續租香港。

不過鄧小平態度非常強硬，強調必然會在 1997 年或之前收回香港，更稱如果收不回香港，將會進行「焦土政策」，一拍兩散。此種態度的強硬，尤如一妙齡女子對背叛自己的偷情男友那麼決絕。這次是首次有港督以官方身份訪問北京，也為之後中英談判打下基礎。雖然麥理浩回港後，為免引起社會震盪，選擇性公佈訊息，只說鄧小平叮囑香港的投資者放心，沒有說出鄧小平必定收回香港的決心。

不過，紙是包不住火的，醜婦終須見家翁，而且麥理浩和其他出訪官員又不是死人，當然不能永遠地把秘密守住。1980 年，一班工商界人士促請港府向英國提出，要就香港前途問題與中共政府談判，否則，不利香港長遠發展、不利營商環境，更會令社會出現憂慮情緒。不論是 1980 年《香港觀察社》或 1982 年《香港革新會》做的民調，當時大部份香港市民希望維持現狀，即對把香港主權交

給中國政府十分保留。之後英國保守黨政府在八十年代初幾次頻密地訪華，就是為中英談判進行準備。而中共方面則繼續表明會收回香港，但會保障香港的營商與生活環境不變，以穩定民心。

為免刺激中共，麥理浩在八十年代初推動的政制改革方案，由原本立法局層面也改革，改為只有地區組織層面改革，即只在區議會與區域、市政兩局推行。也有說法認為，港英政府在這段時候推動政制民主改革，是在認知無甚機會保留香港統治權下，來個改革，令香港的體制更開放，使制度也保障市場的自由開放；即使最後失去主權，也有利英國的投資者在香港賺錢，保障英國人在香港擁有一定利益與商機。於是乎 1980 年的《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1981 年的《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都只談及區議會與區域、市政兩局的制度改革，引入民選成份。不過，這是首次港英政府首肯在香港的體制引入民主成份，足以震撼社會，令市民開始關注體制改革問題，也喚起香港人追求民主之心。

也有分析指，在準備與中共談判期間在香港展開政制改革，也是對中共施一個「下馬威」，希望加強談判籌碼。不過這猶如「學徒仔紮馬」，在缺乏基本有利條件下，下的馬威是不足以令對方流馬尿。

中英談判

1983 年 2 月，中共與英國政府正式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當時香港的社運份子與政治人物都希望增加香港人在中英談判的參與程度。好在 1982 年 9 月，在中英談判正式展開前，行政局與立法局數位要員，包括陳鑑泉、鍾士元、李福、羅保與鄧蓮如等人，也向中英兩方爭取增加香港人的參與度，或最低限度，增加談判的透明度，好讓香港人清楚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得到應有的知情權以及有利穩定民心。而李柱銘與李鵬飛等支持英國「主權換治權」。

當時社運份子與政客的訴求，綜合後，有以下幾點：

(1) 除了中共與英國政府，也讓香港人參與談判，形成三方會談，但這個訴求沒有實現。例如馮檢基、陳立橋、馮可立等人曾前往英國，向英國國會訴求，表明就《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進行「全民公投」；

(2) 中英雙方必須公開談判詳情，讓談判來得透明；

(3) 中英雙方要就談判向香港人交代；

(4) 談判要以香港人利益為依歸。

經過二十二次談判，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談判完畢，中英

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英國要交還香港的主權給中國政府。為了穩定民心，避免重蹈 1983 年當談判陷入停頓不前境況，而令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使樓股兩市大跌、港元大跌、物價騰飛的覆轍，在談判期間，中共政府只好像熱戀中的男子向有離心的女友發出山盟海誓般，作出數點承諾，以安定香港人之心，以穩定投資環境，避免回歸後，香港陷入危機，不利中共政府在香港得到經濟利益：

⑴ 承諾在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享有「高度自治」，即除了國防與外交屬北京政府管理外，其餘範疇由香港政府管理；

⑵ 承諾「港人治港」，即由香港人當家作主，而不是北京政府委派官員來管治香港，以令香港人放心，願意回歸；

⑶ 承諾「五十年不變」，包括制度、營商環境、投資環境、生活方式不變，香港市民可以「馬照跑，舞照跳」；更說「五十年後不需要變」，因中國大陸已經學習香港的好處，跟上香港的制度和節奏，兩地融合。

堅決拒共派 VS 民主回歸派

由於英國放棄「主權換治權」的主張（英國政府在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後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內的「民主條款」，已表示英國對香港履行了「道德義務」，加上英資權益得到一定保證，所以最後放棄「主權換治權」的主張），香港主權必定在 1997 年交還給中國政府，在香港人無可選擇與「認命」下，同時商界人士，例如包玉剛、李嘉誠等也轉向「認命」；中共這些承諾，的確穩定了大部份香港市民的心，包括當時的社運份子與政客。在八十年代開始政制改革、中英談判，已令社運份子與政界人士開始爭取民主。在主權必定交回中國政府下，當時一些社運及專業人士，希望透過在香港引入民主制度，使得於 1997 年回歸時，社會在制度民主下能保持安定，於是「民主回歸」浪潮開始出現，「民主回歸派」開始成形。當時以司徒華為首的教協也投入香港未來政制發展的商討，不少民間組織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開始定期在高山劇場商討香港未來的發展與改革。而一些關心與爭取民主的組織，也紛紛成立，包括 1984 年 2 月，一班專業人士與學者，組成「太平山學會」，由黃震遐醫生擔任會長，周永新博士與文世昌律師擔任副會長，其他成員包括何俊仁、韋家祥、李偉傑等。「太平山學

會」在 1984 年開始，不斷舉辦大型討論會，商討香港的法制、政制、經濟發展。

其他新成立的民主派團體，包括 1983 年成立的「匯點」，是由劉迺強、馮偉華、楊華等人創立的論政團體。1986 年，由十一個基層民間壓力團體組成的「民協」，由民生公義協會的陳立橋任主席、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李永達與馮檢基任副主席，加上陳偉業、王岸等人。

以上民主派團體在當時是主張「民主回歸」，被稱為「民主回歸派」。民主回歸派有以下特點：

⑴ 肯定與支持《中英聯合聲明》，認為英國把主權交還中國政府的方向完全正確。認為主權交還中國政府，是回歸祖國懷抱，這與一路以來的民族情意結和中港兩地的緊密關係有莫大關係；也認為回歸中國統治，脫離英國統治，是洗刷多年來的「被殖民屈辱」；

⑵ 但同時也對中共政府不大信任，所以主張完善香港體制、爭取民主、爭取普選，以確保回歸後的制度能保障香港人權益；

⑶ 認為在《中英聯合聲明》框架下，有必要也可以爭取保障香港人的憲法與制度，在回歸後落實憲政；

⑷ 由於認為他們這班學者與專業人士擁有良好知識，是社會上

的先覺醒者與精英份子，因此有責任推動香港的體制改革與監察中國政府，確保《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能兑現。

這便是「民主回歸」，一方面支持回歸，一方面親身參與民主運動，爭取民主，推動香港發展。這種心態，説明了為何在 1984 年 4 月 20 日，當時任英國外相賀維宣佈英國的「主權換治權」失敗（英國政府曾一度爭取，交還香港主權，但保留在香港的管理權，代中國政府管理香港，以保障英國人在港利益），也坦承在 1997 年後保留主權已經不切實際時，立法局議員張鑑泉立刻抱頭痛哭，但何俊仁等民主回歸派人士並不抗拒（註1）。

當時除了民主回歸派，還有「堅決拒共派」。堅決拒共派特點：

⑴ 強烈質疑《中英聯合聲明》有否落實的機會；

⑵ 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根繫於鴨腳的繩子，令港英政府管理香港時，處處受中共政府牽制，令管治出現困難，不利香港人，也不利政制發展；

⑶ 對中共政府反感與不信任，堅決不滿香港將要回歸中共政府統治下的中國；

⑷ 不滿英國政府為了促成談判完成而對中共政府讓步，是出賣

了香港人。

堅決拒共派以在 1984 年立法局，於《中英聯合聲明草案》投下棄權票的陳鑑泉與施偉賢為代表人物，以前者為甚。縱然無法改變回歸現實，他們也支持爭取民主、改善香港體制。例如反對立法局通過《1986 公安修訂條例》、爭取「八八直選」等。

而當時香港市民是選擇了民主回歸派，多於堅決拒共派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主導。這是因為當時普遍香港人也反殖，認為被殖民是屈辱，因民族情意結，支持回歸中國，也是民主回歸派成為主流原因。看看香港人在 1989 年聲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可以見出當年支持那些學生，是基於民族情意結，也基於認為香港也將回歸，成為中共政府的管治地方之一，無法脫離中共政府，因此中共政府越民主，對香港也越有利。而後來六四屠城後的悲憤，除了是基於良知對血腥鎮壓憤怒、對無法改變中共將會收回香港的現實的不滿，更大原因是民族情意結。這從香港人大力聲援 91 華東水災、08 汶川地震、六四前無甚香港人申請居英權，便可知香港人過往的民族情意結是多麼深。

此外，也有觀點認為陳鑑泉等人過份親英。例如陳鑑泉反對八十年代中的修改《就任誓詞議案》，認為港英政府為了吸納更多

不親英的華人進入議會，而容許立法局議員在就任宣誓時，可自由選擇向英女皇還是香港市民效忠的修改，是不合理，因為會打擊英國政府威信。這種親英立場，當然得不到市民認同，這也說明為何《中英聯合聲明》簽定後，1984 年 12 月 19 日公佈的民調顯示，大約 76% 受訪者對《中英聯合聲明》有保留，30% 受訪者認為「一國兩制」行不通，堅決拒共派也敵不過民主回歸派，無法成為香港人信任的民主運動主流。始終當時香港很多人口，是由之前三四十年不斷從中國大陸移入，堅決拒共派那種親英立場難以成為主流。

民主回歸派

民主回歸派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主導與主流，加上陳鑑泉在 1988 年後沒有再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以及移民海外，堅決拒共派更差不多從政壇上消失，使民主回歸派完全領導香港民主運動。故這個從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浪潮，叫做「回歸浪潮」。由於不少由原本民生壓力團體組成，他們除了像過往的民生訴求之外，再加上社會精英相繼加入，也有很多民主訴求，主要可這樣劃分：

(1) 爭取回歸後在港實行的法例，即《基本法》，是「以民為本」、以法治精神為本、以普通法的公平精神為本，在《基本法》

內加入民主政制。因此一些民主派領袖，如李柱銘與司徒華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⑵ 監察中英兩地政府，確保香港體制朝民主標準發展，爭取普選早日在香港落實，而爭取「八八直選」是他們的第一擊，爭取取消三級議會所有委任議席是第二擊；

⑶ 擴大立法局權力，支持「兩局分家」，即立法局與行政局分家，讓「行政主導」的政府能被立法局妥善監察。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定後，港英政府不用過份顧忌中共政府，決心在香港推行民主起來。於是 1984 年 11 月公佈的《代議政制白皮書》，開始討論在立法局引入民主選舉，加強香港人爭取民主之作氣，務求回歸後香港的體制，民主成份越高，便越透明、越開放，有利英國等外資在香港營商、謀取利益。

由於當時港英政府與香港民主派心意大致相同，只要不威脅港英政府的統治，港英政府是鼓勵，甚至間接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彼此不是完全對立。故此，那時開始，香港抗爭運動，不用再像以前那麼激烈，便能爭取一定成果。例如不用再像 1967 年的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事件，需要絕食和包圍政府部門，甚至騷亂；不用像金禧事件需要罷課；不用像《中英聯合聲明》簽定前的抗議的士加牌費事

件，出現騷亂；而手法可以相對溫和，例如集會、遊行、示威、談判、團結抗爭力量，如此發表意見便成。

而較激烈的抗爭手法，例如 1988 年，學生焚燒《明報》以抗議《雙查方案》、李柱銘與司徒華帶領焚燒《基本法》，抗議《基本法》草案過份保守、甘浩望神父連續多年進行絕食行動，每年增加絕食日子一天，抗議中共政府監禁香港民運份子劉山青、1989 年大型遊行聲援北京學生、1995 年 12 月 10 日，劉慧卿等人抗議首任特首由小圈子選出，在示威時因受阻而瞓街，這些要採用到當時社會普遍視為較激烈的手法，對象也是中共政府，而非港英政府。

在餘下倒數日子，港英政府根本不必硬碰硬，因此多願意與民主派人士談判，尤其是民生政策，多數有商有量。而且，經過「六七暴動」教訓，以及之後幾次因抗爭而引發成的群眾騷亂，港英政府也改變過往過份強硬、冇得傾的態度。

為團結而團結

團結抗爭力量，是社運份子慣常做法，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立的「教協」便是團結教育界力量、1986 年，多個團體成立「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六七期間，左派工會成立「港九同

胞反對港英逼害鬥爭委員會」、1978 年成立的「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1989 年成立「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等等，也是好的例子，是抗爭團體與人士，為求有更大的抗爭與談判籌碼，去逼使當權者讓步，從而合併抗爭勢力。

此也可說明，為何香港的民主派一向迷信「團結論」。所以現在，當一些較激進的進步民主派出現，例如社民連、人民力量、本土派、激進左翼等，當與主流民主派，例如民主黨、教協等，不是處於合作狀態，甚至批評對方立場保守，會被傳統民主派安上「分裂民主派」、「破壞團結」等罪名。

但細心看看，那些「分裂民主派」、「破壞團結」等罪名的指責，並不妥當。因為過往的團結合併，是就單一議題、單一方向而合作，並沒有甚麼大分歧，甚至可以說原則與立場都是一致的，例如爭取中文成為合法語言、停建大亞灣核電廠、爭取八八直選等。而且這些合併與團結，不是永久性的，當議題結束或爭取目標已經達到，那些團結與合作便消失，是短暫性的。

但是現在，在普選立場與原則上已有分歧，例如一些團體在特首普選提名上，堅持「公民直接提名不可少」，有些則認為公民

提名可有可無，在立場上已經不同，根本不能盲目地強求團結與合併。又例如 2010 年，就 2012 年政改方案，民主黨贊成方案，但社民連等政黨則反對，在之後出現爭拗是正常的，因為雙方立場處於對立面，所以現在那些甚麼「要團結」的聲音，是罔顧傳統民主派與新興民主派在原則立場的分歧與對立，這種不問原則、只問團結的「為團結而團結」思維，是不切實際。就正如建制派與泛民，在六四事件立場取態的對立面，是沒有可能就此事而團結一樣。民主派可就個別民生議題而團結合作，甚或乎與建制派就民生議題合作（例如民主黨與自由黨在醫療問題上合作），但因為溫和民主派與進步民主派在政治理念的不同，強求合併與團結是不符現實。

更不能接受的是，為了團結而放棄原則底線。當現在，一些民主派團體高舉「公民提名不可少」旗幟，以此為底線，卻竟然有泛民要求那些團體，為了「團結」，要放棄「公民提名不可少」，與那些認為「公民提名非不可少」的泛民團體團結，否則就是破壞與分裂民主派。這種為團結而團結、為團結而原則底線也可以放棄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香港電影哲學家周星馳曾說過：「沒有理想，和一條鹹魚是沒有分別的。」而筆者認為，「沒有原則，和一隻禽獸是沒有分別的」。

高山大會

1986 年教協、民協、太平山學會、匯點等民主回歸派，為了團結力量去爭取八八直選以及爭取《基本法》和未來政制以民為本，在高山劇場舉行「高山大會」，打着「促進政制民主、發揮高度自治、落實港人治港」旗號，喊着「打造新香港、民主再啟航」的口號，希望香港的民主團體能一致爭取普選政制與憲政，有數千人參加。他們支持《一九零人政制方案》，爭取普選行政長官及 1997 年至少有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以抗衡較保守的工商界《八十九人方案》及親中界的《雙查方案》。

高山大會之後，民協、太平山學會、匯點、教協等十一個民主派團體，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爭取八八直選與民主《基本法》，由李柱銘與司徒華領導。這是民主派首次最大型的團結。

雖然最後爭取八八直選失敗，但也換來港英政府在 1988 年的《代議政制往後發展白皮書》，宣佈 1991 年立法局選舉會引入直選議席。雖然引入民主《基本法》成果不大，但某程度上令中共政

府對《雙查方案》沒有照單全收，不在第三任特首期間全民投票是否在第四任特首開始全面普選（當時認為要第四屆，即 2012 年才可以開始普選特首是太保守），以及第五屆立法會才可以開始普選太保守（即 2013 年那屆，當時還以為有「直通車」，沒有臨立會，所以第五屆是 2013 年）；成功換取中共承諾 2007 年開始可以普選特首、2008 年開始可以普選立法會。不過當時民主派與香港市民也許太天真，看漏了「可以」二字，因為可以有，也可以沒有。而不少事實也證明，民主回歸派對中共是過份信任，此乃因為不及中共「老江湖」，猶如天真的郭靖遇着機靈的黃蓉，怎會不吃虧？

港英政府收回八八直選的「苦衷」

當年令人想不通的是，為何一直有意推動八八直選的港英政府，最後收回八八直選，甚至要核突地，把大部份贊同八八直選的市民簽名列為「無參考價值」，反而動員人士提交建議書去反對八八直選，然後就以「民意反對」為由，取消八八直選安排。這使民主派和市民也震怒。

不過彭定康離港後，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及，當時中共政府威脅，如果八八直選實現，中共便不承諾在回歸後引入直選。所以英國才施展「迴馬槍」，把八八直選煞停，以換取中共協議承諾在回歸後引入直選。（註2）

天真得過份的民主派

尤其是在八九六四後，還相信中共政府真的會完全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事後回顧，也是天真得過份吧！

八九六四後，香港人對回歸信心敲響警鐘，出現移民潮，大量港人移民海外。而一向乏人問津的居英權和 BNO 也突然出現人頭湧湧的申請。

可是當應該對中共政府信任破滅的時候，一些被譽為民主派標誌的政客與社運領袖，還是對中共抱有過份的期望，沒有相對引入較強烈的抗爭態度與手法，還停留於1984年後，較好相處的港英政府態度，結果，當然是被淘汰，使香港的民主運動浪潮，由第一波的回歸浪潮，昇華到有生力軍推動的第二波民主浪潮。此話題稍後再述，先說說民主回歸派的過份天真事件。

民主黨成立

八九六四後，民主派其實也意識到需要變陣或加大抗爭力度，因為那時根本對中共沒有信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隨時成為空話，因此有必要「更團結」，令抗爭力量更大。

目標與立場大同小異，當然能夠團結。但是，當目標與立場出現大分歧，就無法團結，縱使勉強也是貌合神離，就像 2013 年成立的「真普選聯」，人民力量與社民連這些進步民主派，與保守民主派的民主黨和民協便是這樣。

回說當時民主派決定成立「香港民主同盟」，簡稱「港同盟」，由民協和太平山學會，與泛藍人士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合併，希望壯大民主派力量。不過最後，以馮檢基為首的部份民協成員，拒絕加盟港同盟，選擇留在民協。當時曾有批評指，接着成為民協主席的馮檢基，為了權力、為了做主席而最後不肯加入港同盟。不過馮檢基否認，他指出最後不肯加盟港同盟，是因港同盟是跨階層團體，而民協是標榜代表基層的團體，在民生立場上分歧甚大。而政治立場上，馮檢基主張對中共行「又傾又砌」路線，而非與中共對立路線，故最後不離開民協。

現在看來，馮檢基當年的說法可信，說他貪權的指控有點取巧。當然，現在回顧，馮檢基「又傾又砌」主張，似乎實效甚微，此乃基於中共與民協的權力太過懸殊，而且民協的力量、抗爭力度、抗爭手段，遠遠未足夠讓中共對其讓步甚至重視。

當時港同盟集中了大部份民主派人士，包括吳明欽、李柱銘、司徒華、何俊仁、李永達、陳偉業、劉江華（還未變節的劉江華）等。

1992 年，彭定康上任，他堅決為香港帶來更大民主，務求在港英政府結束前，香港盡可能有最大民主。因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取消區議會、立法局的委任議席。在 1995 年的立法局，一半議席全面直選、另一半則成立新九組的功能組別，乃一人兩票變相直選。

不知是一些人本身立場保守，但一直扮作開明、扮作民主鬥士，或是臨近回歸，為了在回歸後能得到中共信任，能升官發財，一些人立場突然保守起來，甚至保守得令人難以置信，差不多判若兩人。例如匯點創辦人之一的劉迺強，不滿彭定康政改方案，認為這樣會得不到中共支持，不利香港民主進程，反之，主張應盡量迎

合中共保守口味，他因而退出匯點，之後成為親中建制派的保守力量。而他離開匯點後，匯點也跟港同盟合併，成立民主黨。

反口覆舌的鄧蓮如

而行政會議成員鄧蓮如，也由當年因英國視之作與香港人溝通橋樑，而授予英國上議院議員身份，以及曾大力主張《兩局共識方案》（行政局與立法局）的政改方案，在 1992 年，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身，上演比四川文藝變臉更強的變臉技巧，突然保守起來。鄧蓮如表示在 91 立法局後，再增加直選議席是不智，更指如果繼續增加香港政制的民主成份，會為社會帶來緊張、破壞香港的穩定繁榮，更放棄過往支持兩局分家的態度，被批評為反口覆舌。鄧蓮如說此是因為香港發展必須看中共立場，但有觀點認為，她此舉是想討中共歡心，好讓她在回歸後能成為特首。

唉，權力使人腐化，而未得到權力，在發「權力夢」時已經腐化，確實令人搖頭嘆息，真如電視劇《溏心風暴》入面的李司棋一句著名對白：「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鄧蓮如的故事，有沒有令大家想起此句對白？

令人更不齒的是，在 2005 年，當泛民主派決心否決當時的政改方案，認為方案沒有更加民主化程度可言時，鄧蓮如竟然越洋發聲，呼籲民主派在政改方案投贊成票。不知鄧爵士是否年齡與保守思維同時增長，還是年齡與智慧成反比例。

不少香港人稱讚鄧蓮如在 1996 年選擇到英國退隱，比鍾士元、陳方安生等港英時代重臣，選擇效力特區政府來得清高。但也有觀點認為，鄧蓮如之走是因得不到中共信任，不但特首沒機會做，就連政務司司長與行政會議召集人也無望，才心灰意冷，選擇離場走人；否則，如果得到中共信任，故事將會改寫。

民主派對選票的迷思

民主回歸派都是一班主動站出來，為香港爭取民主法制與民主政治的人，肩負着一個「為民作主」的心態與信念，希望自己能站出來為香港的民主出力，甚而進入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一邊監察政府，一邊提出合乎民主的改革方案。

由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民主聲音很細，民主在八十年代才開始在香港發酵，那班站出來的是「先醒覺」與「先啟蒙」的

一群。加上他們的背景多是學者、專業人士、教育界人士，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階級分明的社會、這個在港英時代推動的「順民教育」社會（鼓吹人民應該跟隨當權者領導）、在港英時代鼓吹「精英統治」的社會（社會發展是由「上而下」的，社會應是由有能力的精英帶領，而中下層市民則跟隨帶領或提供輔助）；再加上由大陸南移來港的人口也受着大陸「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影響，這些民主派人士認為站出來領導香港人爭取民主、為民作主的心態是應份的。於是乎，那時的香港民主運動，便是一班「先啟蒙」的社會精英，期望得到市民的認同，帶領市民爭取民主。加上八十年代起，開始在議會內引入直選，那些民主派人士認為有途徑進入政府，在制度內推動民主。但要勝出選舉，便必須要得到市民的授權與選票，所以民主派人士想盡辦法去獲得市民的認同和選票，否則，很難在制度內推動民主發展。因此一些看不透的市民，或不認同他們的市民，便常常說那些參與民運的人，只是為了「選票」，不是真心為民，但卻忽視了選票之重要性，以及為何民主派人士那麼「迷信」於選票，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了選票，便無法在制度內「為民作主」，便很難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

為民作主心態

要爭取選票，要爭取授權，便要先爭取市民認同。所以不論社運、民運、抗爭運動，手法應該盡量不能再像以往那麼激烈，因為在港英「順民教育」與「愚民政策」之下，絕大部份市民都會認為「過激」手法會對社會帶來破壞，影響社會的穩定，因而不接受過激手法。故此，社運人士要放棄過往那些激烈手法，不能再像五十年代雙十事件、六十年代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七十年代爭取艇戶上岸事件、八十年代抗的士加牌費事件那樣，動不動便包圍政府機構，甚至罷課罷工。再加上之前解釋過，在中英談判後，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民運根本不會有大抗拒，更加不須動用到激烈手法，因此當時香港的民運手法與以前相比，溫和得多了。

而這也可以說明，為何由八十年代開始成為民運主流的民主回歸派，那班傳統的民主派人士，到今時今日，對較激烈的抗爭手法甚為抗拒，甚至對近年冒起的激進民主派也頗為抗拒，是因為傳統上，這班主流民主派一早已經摒棄了較激烈的手法，甚至思維。當社會轉變到對激烈手法與思維有需求時，如果那班傳統民主派不能與時並進，便會出現落伍情況。今時今日的民主黨主流，便面對這

Hail Elsie
絕飲食
hunger
fare
increase

情況。

而着重選票、為民作主心態，是傳統民主派的思維。他們認為，只要把他們選入議會與政府，他們這班「先啟蒙」的精英，會在議會內推動民主，在議會外則發聲表態、溫和地宣傳理念，爭取市民認同。所以在傳統民主派心目中，爭取選票與爭取認同是最重要的，最緊要是選到他們入議會，才能有效地為香港推動民主。否則，入不了議會與政府，不能有效的推動民主，只能停留於以前只是壓力團體的角色，凡事要激烈到逼到政府就範才有成果。所以大家細心看看，為何現在，在特首的普選方案，傳統的民主回歸派的民主黨等，在市民的提名權上，不堅持「公民提名不可少」，反之，只認為普選方案「沒有篩選」，他們那些溫和民主派能夠入閘成為候選人便可。因為傳統民主派是「信人」，信民主代言人能「為民作主」，於是乎，只要選到他們入議會，選到他們入閘，然後勝出選舉，成為執政政府，這班民主代言人、先啟蒙的精英一群，便會「自然地」推動民主發展，所以毋須堅持「公民提名不可少」，否則，若政改方案拉倒，便連入閘出選的機會也沒有。當然，這想法有點樂觀，因為如果沒有公民提名權下，市民的影響力

會大減，而由於北京政府對特首有最終提名權，即使能夠入閘做候選人，候選人們在市民的影響力較低下，便會很大程度上受北京政府的牽制，再加上北京政府對司局長等政府班底有委任權，縱使勝出選舉也要受到一定制肘。而且「權力使人腐化」，在沒有制度制衡下，更易腐化。所以毛澤東、希特拉上台執政前，為了得到選票或人民支持（中共說法是人民「用腳投票」），不也是高舉「爭取民主」的民主鬥士嗎？所以香港新一代的爭取民主者，傾向「信制度」多於「信人」，認為要先完善制度，才能確保當選者是真正以民為本。因為「信人」、「為民作主」思維始終有濃厚信任「人治」色彩，而非信「法治」，有違憲政精神。

這也說明為何新一代社運人士高舉「公民提名不可少」，因為只有從制度上爭取、完善制度，人民才能當家作主，才能真正「人民作主」。但傳統一代民運領袖，雖則也支持公民提名，但認為並非「不可少」，乃「可有可無」。

策反論

「為民作主」思維，令傳統民主派要選入政府和議會，然後在

建制內推動民主，進行「策反」。策反論是常見的，但要成功必須有兩大條件：

一、制度是開放透明，反對派和異見者可以透過公平開放的選舉進入制度內，而非靠小圈子推薦或被委任才能入內；

二、入到建制內，不會被「同化」，不會成為建制的花瓶、裝飾品，令到策反不成，反而成為幫對方塗脂抹粉的工具和利用品。而是入到去，能成為「關鍵少數」，能有所作為，或最少喚起人民的支持與醒覺，從而對建制的不公處反思。

因此，大家不會見到有人加入中共去策反中共，因不符合以上兩大條件，所以會被「同化」、「被變質」。所以香港一直有民主派人士被委任入政府或諮詢會，例如張炳良、黃仁龍、胡紅玉、單仲偕等等，他們不是被同化，便是被利用為塗脂抹粉的工具。

相反，進入立法會，尤其透過民選議席進入，便可以進行「策反」，因為符合兩大條件。例如社民連三子首次一起勝出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後，在議會內牽起的衝擊與抗爭風潮，又拉布又衝擊，便成功帶起部份策反功用，令人反思制度不公與政府政策錯漏，雖然同時也帶來保守市民不喜歡過份激烈的觀感等負面影響。

而策反能否成功，也看入了建制後的表現。例如張炳良與黃仁龍，成為了專權政府一份子多於成為異見的「關鍵少數」；而傳統民主派被指多年來活動千篇一律，提出議案或發言質疑政府，之後遊行示威造勢，頂多加上絕食行動去感召市民支持，但之後在立法會投票時，因制度設計使然下，「意料之內」地投票失敗，然後出來開記者會譴責政府與制度，再宣佈「今日是民主最黑暗一天」，或「今日是香港最黑暗一天」，或「今日是法治最黑暗一天」，人家鍾鎮濤首歌叫《日日是好日》，民主派主唱的歌叫《日日是黑日》，最黑暗一天的次數比黑色暴雨日子還要多，久而久之，人們麻木了，而民主派還是因循地不斷重施故技，沒有新思維、新手法加入，只會發揮不了「關鍵少數」作用，做不成策反。而進步民主派在議會內的抗爭手法，也開始被批評為因循了，也需要有新思維突破。

民主回歸派的失敗

為何新一代社運人士會出現與舊一代社運人士如此大分別的思維？這是因為傳統民主派頻頻出現失誤，或與市民的預期出現重大

落差時，新一代便會摒棄舊一代思維，會思考屬於自己的道路。

而傳統的民主回歸派的失誤在哪？

首先，是對中共過份信任，或民主派過份天真。

在上世紀，民主回歸派認為，只要他們努力監察與推動，中共會兌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惜回歸後，事與願違，那些承諾沒有一一兌現，反之不斷違反，結果除了令市民減低對中共的信任，也減低對民主派的能力信任，故才出現新一代要取代舊一代不被信任的一群。

第一，所謂的「高度自治」，現在已被「西環治港」陰影籠罩。當時高度自治是指除了國防與外交事務由北京政府負責，其餘由香港政府負責，北京政府不會干預過問，只會關心而已。可是，回歸後，北京政府與中聯辦多次為香港普選問題發言、表態、干預，甚至主動取代特區政府角色，直接入民間、入香港與民主派傾政改，已嚴重破壞高度自治承諾。按梁振英智囊邵善波說法，以及很多觀點都認同，中聯辦多年來在政府一些重大議題中，為政府向議員拉票，雖則「很正常」，但已經有違高度自治承諾，失去了港人信任。加上選舉時，中聯辦與親中背景人士不斷為建制派拉票、

梁振英當選後立即去中聯辦「拜票」，這些事件已有違「高度自治」承諾。

第二，當要從市民與中共之間二選一時，例如普選問題、政制問題，特首可能基於權力始終來自中共與其利益集團，便會站在中共一邊而非市民一邊，市民便意識到所謂「港人治港」只是一班擁有香港人身份證，但心底裏卻非效忠香港人，而是效忠中共的「港人頭，紅色底」的「港人」治港而已。或根本那些「港人」能力太低，處處依賴北京政府，例如 03 沙士後，只懂鸚鵡學舌的照跟中共的「中港融合」方針，不懂反映港人意願或有自己想法，使香港市民認識到，沒有真正普選下，那些「港人治港」的「港人」，也只是中共傀儡而已，當香港人與中共有利益或思想衝突時，傀儡會自動地選擇維護中共利益為主。

第三，民主回歸派信任中共會在香港落實民主法制，不改變香港的法治基礎的想法，也已經證明是錯信他人。回歸後，臨立會「還原惡法」，已經使香港的法治倒退，更不要說要進步。香港在 1991 年引入《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人權法律條例》已有國際公約的條例去保障香港的人權。當時有聲音已認

為，雖然引入了《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但還沒引入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國際公約，人民權利還未全面得到應有的保障，未完全符合普世標準。但回歸後，不但沒有引入其他方面的權利保障，還要「還原惡法」，不進反退，破壞了「五十年不變」承諾。

在 1995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備委員會」向人大常委建議，《基本法》入面應該將《香港人權法律條例》中，被指為凌駕性地位的條文廢除，將一些已修訂的條例「還原」。當時建議是有八條條例要「還原」，包括公安條例（和平集會）、社團條例（結社自由）、電訊條例（新聞自由）等等。在當時社會強烈反對與民主派反對下，後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建議，只撤銷有關公安條例、社團條例中的內容，而臨立會修訂的條例也較原本相對溫和（表面上）。沒有「百分百還原惡法」，但「還原惡法」的事件，因為與憲政理念背道而馳，已嚴重打擊香港人信心，而民主派爭取不還原惡法則未竟全功，也令人失去不少信心。（註3）

第四，北京政府後來通過人大釋法，廢除 2012 雙普選之可能性，違反當年承諾 07、08 年後，香港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落實雙普選，也令香港人失望，也反映民主派監察不力。

尤其是 1994 年，劉慧卿提出比彭定康方案更激、更進步、更民主的政改方案，就是在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取消功能組別，所有議席是一人一票全面直選。可是當時民主黨內的匯點派系議員，包括李華明、狄志遠、黃偉賢、梁智鴻，認為此方案太激進，會刺激中共政府，所以寧願放棄香港有機會可以首次全面普選，也反對議案。結果在 1994 年 6 月 29 日，劉慧卿方案因這四人有份投反對票，以三票之差而落敗。這除了令香港錯失全面普選機會（到今天，全面普選能否實行也是未知之數），也令民主思維在民間錯失大力發酵的機會（因市民試過全面普選之好處後，以後要取消全面普選，便變得更困難），而那四位錯估形勢或過份看待中共心態的「民主派」議員，因此成為民主千古罪人，引來千古罵名、遺臭萬年。

第五，頭三次的人大釋法，不是特首提出就是人大主動釋法，違反《基本法》內，釋法應該是由終審法院提呈的條文，破壞了法治精神。除了令市民對中共維護法治的信心大降，也對民主派無力牽制中共破壞法治之舉感到無奈，對民主派「為民作主」的信心下降。

第六，政制倒退，董建華恢復區議會委任制、人大釋法，把全面普選的關卡由三部曲無端增加為五部曲，增加實現普選難度，都是中共違反承諾，民主派以往過度盲目信任之故。本來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過，之後特首提請，然後人大常委會同意，便可以進行普選方案討論。怎知，在第三次人大釋法，加上要先由人大常委會認為有需要改變現行的政制，才讓立法會投票是否改變政制的框架，變相令改變政制的主導權由立法會身上奪去，奪給人大常委會，把香港人可以主動提出修改政制的權力剝奪，怎不令人震怒？

第七，加上中共較牽強地，以彭定康政改方案不合《中英聯合聲明》中的「平穩過渡原則」，取消「直通車」，不容許立法局直接過渡回歸後的立法會，取消「直通車」承諾；以及回歸後，中共多次或明示、或暗示香港不應再「三權分立」，應像中國大陸的「三權合作」，意圖把「行政主導」推上極致，已完全違反「五十年不變」承諾，也是對以為在大力監察下，中共就會遵守承諾的民主派，打了深深兩掌。

民主回歸派的天真與錯估形勢，比自稱因「太天真太傻」而一時「做錯事」的阿嬌更難以令人信服和體諒。因為阿嬌只是一時

貪玩，但民主回歸派卻是多番投注錯誤，如果以一個賭徒來說，次次都押錯注，不是其他賭仔的「明燈」，就是「地獄黑仔王」。如此表現，香港人當然會逐漸對傳統民主派失去信心，甚至自己出來取而代之。故此，在回歸後，香港政制法制不斷倒退，而傳統民主派卻無力挽回敗局，自然「長江後來推前浪」，被新興的民主派取代，或至少被新的民主浪潮打擊，動搖主流地位與領導位置。

註釋：

(1) 請參考何俊仁《謙卑的奮鬥》一書。

(2) 請參考《非一般的外交家（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錄）》一書。

(3) 請參考羅敏威《香港人權法新論》一書。

第一波民主運動大事列表

日期	事件	性質
1956年		
10月10-12日	李鄭屋徙置區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拆，引發《雙十暴動》。	紅藍之爭
1965年		
10月	天星小輪申請加價，由2角加至2角5分。	
11月	葉錫恩收集超過二萬人簽名，反對天星小輪加價。	收集簽名行動
1966年		
4月4日	25歲青年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反加價。	絕食抗議
4月5日	11名青年受蘇守忠道德感召，加入絕食行列。下午，警方以「阻街」為由，拘捕蘇守忠。十多名青年在晚上由尖沙嘴碼頭遊行至佐敦道碼頭，要求釋放蘇守忠，途中不少市民加入。	遊行抗議
4月6日	警方拘捕其中4名遊行青年，引發港九地方出現示威。彌敦道更有人放火、掟石、搶劫商店，出現暴動；約300人包圍油麻地警署，掟石及玻璃樽。	包圍行動；群眾騷亂
4月7日	01:30-06:00實行宵禁；晚上數百人包圍旺角警署、油麻地警署，企圖縱火。	包圍行動；群眾騷亂
4月8日	英軍與裝甲車出動，拘捕400多人。	包圍行動；群眾騷亂
5月4日	港英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天星小輪加價風波」出現原因。	
12月	「天星小輪加價風波」調查報告出台，認為乃市民生活質素有待提升所致。	

日期	事件	性質
1967年		
4月	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出現勞資糾紛，工人與資方出現衝突。	
4月27日	港英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	
5月4日	受大陸文革影響，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工人，在工廠貼大字報、高舉毛語錄。	包圍行動
5月6日	百多名工人包圍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警方拉人。	包圍行動
5月7日	《大公報》社論譴責香港警方拉人行動；左派工會投訴警方執法不公。	
5月11日	工潮演變成騷亂。	群眾騷亂
5月1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出聲明，奠定港英政府勾結美國帝國主義，反對中國，逼害工人。	
5月16日	左派工會成立「港九同胞反對港英逼害鬥爭委員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委員會主任；《大公報》、《文匯報》指責港英政府進行「法西斯暴行」。	團結抗爭力量
5月20日	開始全港出現大規模騷亂。	群眾騷亂
5月23日	巴士、電車、煤氣等工會罷工。	罷工
6月27日	左派學校罷課一天。	罷課
6月29日	左派發動大罷市。	罷市
7月	騷亂演變成暴動，土製炸彈在全港多處出現，炸彈上多寫上「同胞勿近」四字。	群眾暴動
8月22日	商台主持林彬在節目《欲罷不能》，譴責左派工會的所為，指對方想癱瘓香港。	
8月24日	林彬上班途中，在座駕上被人放火燒車，後不治。	血腥攻擊
10月	港英政府推行「香港節」，希望籠絡民心，希望市民增加對殖民地香港的歸屬感，擺脫紅藍中國身份。	

日期	事件	性質
12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令停止炸彈風潮，群眾騷亂才告一段落，因在1967年發生的關係，史上稱為「六七事件」或「六七暴動」。	
1968年		
	專上學生成立學界委員會，爭取中文合法化、反對教育「重英輕中」、不滿殖民統治，成立「促進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委員會」，舉辦簽名運動。抗爭直到1971年，港英政府通過報告，承諾會給中文法定地位（在1974年正式給予中文法定地位），才稍為低調些，是為第一波「中文運動」。	團結抗爭力量
1971年		
2月	由教師與學生為主，組成「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	團結抗爭力量
7月7日	學聯於維園舉行七七大示威，抗議日本侵佔釣魚台，最後演變成示威者與警察衝突。	大型示威
1973年		
4月4日	由時任「教協籌備委員會」主席司徒華牽頭的「全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舉行第一次教師大罷工，抗議政府削減文憑教師薪酬15%。	罷工
4月15日	「全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舉行第二次教師大罷工，抗議政府削減文憑教師薪酬15%，成功逼令政府取消減薪計劃。	罷工
7月	被指貪污成性的總警司葛柏提早退休。	
7月	民間出現「反貪污，捉葛柏」行動，要求政府反貪，最後成功爭取政府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廉政公署（ICAC）。	示威抗議

日期	事件	性質
1977年		
6月	金禧學校師生靜坐罷課，不滿學校沒有正視帳目混亂與私自扣減教職員薪酬問題，而剛成立的教協則大力協助師生抗爭。	罷課、靜坐抗議
1978年		
5月	政府關掉金禧學校，改名德蘭中學，但新學校不聘用曾參與靜坐的原金禧學校老師，有師生絕食抗議。	絕食
5月28日	金禧學校風波越演越烈，過萬名市民在維園集會，聲援抗爭師生。	大型集會
7月	教署成立五育中學，那些不獲德蘭中學聘用的教師，可以往五育中學任教，才開始平息金禧學校風波。	
10月	教署推出《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學界成立「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由司徒華擔任主席，反對政府「重英輕中」的教育政策，提出母語教學，是為第二次中文運動。	團結抗爭力量
1979年		
1月7日	油麻地艇戶乘搭旅遊巴往禮賓府，表達不滿政府多年還未妥善處理安置水上艇戶上樓問題途中，在紅磡隧道外被警車截停。警方以「非法集會」之名拘捕車上70多人。	
2月13日	法庭裁定艇戶及聲援者67人「非法集會」罪名成立，除了小童，全部成年人皆罪名成立，此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艇戶抗爭風波的關鍵事件。當年，甘浩望神父、陳順馨、余德新等人大力協助艇戶。	
1980年		
6月	政府公佈《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開始研究在香港的地方架構，區議會與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引入民主選舉。	

日期	事件	性質
1981年		
1月	政府公佈《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進一步使社會討論把民主引入香港政制。	
1982年		
2月	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與鄧小平在北京會面，商討香港未來主權問題。開始令香港人熱烈討論前途問題。	
3月4日	新界區議會選舉，首次有民選議席。	
9月18日	市民在維園舉行「九一八集會」，由司徒華等人領導，抗議日本政府在教科書上篡改有關侵華歷史的內容，認為與史實不符，還發起罷買日貨行動。	大型集會
9月21日	九龍及香港島區議會選舉，首次有民選議席。	
1983年		
2月	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使香港的1983年，除了是一個「抗加風」年份，民間組成「遏止加風保障民生民眾集會」外，還大力關注香港前途問題。	
10月15日	由於中英談判陷入僵局，香港前途難以估計，影響經濟民生、物價騰飛、股市樓市受影響，港元大跌。於是10月15日，港英政府決定把港元與美元掛勾，成為聯繫匯率。	
1984年		
1月11日	政府宣佈的士加價，但同時也增加的士牌費及首次登記稅，還要即時生效，引起大量的士司機不滿。	
1月13日	的士司機在全港進行罷駛遊行，令全港多處交通陷入癱瘓。後來更演變成騷亂，有人火燒垃圾桶、掟石、推倒街上汽車等，警方出動防暴警察鎮壓，發放催淚彈，拘捕150人。	癱瘓交通、群眾騷亂

日期	事件	性質
1月18日	政府撤回加稅加的士牌費措施，平息的士抗爭風波。	
4月20日	時任英國外相賀維宣佈放棄香港主權，而把管治香港的主權，在1997年交還中國政府。	
9月26日	《中英聯合聲明》誕生，香港前途問題定案。	
11月	政府公佈《代議政制白皮書》，開始討論在立法局引入民主選舉。	
1985年		
9月	立法局選舉，首次引入間選。	
12月10日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	
1986年		
5月3日	受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慘劇影響，香港的教育團體、工會、環保團體、民生團體成立「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反對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	團結抗爭力量
10月5日	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集會在摩士公園舉行。	大型集會
11月2日	民主派在高山劇場舉行「高山大會」，團結爭取民主政制力量。	團結抗爭力量
1987年		
5月21日	政府公佈《1988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帶動民間討論在立法局引入直選之風。	
9月	民主派在維園舉行「爭取八八直選」集會，要求在1989年的立法局選舉引入直選議席。	大型集會
11月	港英政府以民調「有七成市民反對」為由，擱置在1988年立法局選舉引入直選議席，被市民與民主派反對，力指政府在民調「選擇性」不採立支持直選的意見，包括大部份市民簽名支持八八直選，但政府卻宣佈簽名表態沒有參考價值。	

日期	事件	性質
1988年		
2月10日	政府公佈《代議政制往後發展白皮書》，宣佈1991年立法局選舉會引入直選議席。	
4月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佈第一份草案。	
12月2日	大專學生到明報報業集團焚燒《明報》，抗議《明報》創辦人查良鏞有份發起的「雙查方案」政制方案過份保守。	焚燒事物表態
12月4日	李柱銘與司徒華等人焚燒《基本法》，抗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佈第一份草案過份保守。	焚燒事物表態
1989年		
5月20日	在八號風球下，四萬名市民與民主派人士在維園舉行大集會，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其後更遊行至新華社抗議。	大型集會、遊行
5月21日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過百萬市民上街遊行。	團結抗爭力量、遊行
5月27日	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為北京學生籌款。	大型集會
6月4日	過百萬市民上街遊行，抗議中共政府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表達對屠殺行為不滿。	遊行抗議
1990年		
4月4日	《基本法》頒佈，將在九七回歸後代替《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成為香港的憲制性文件和法律。	
1991年		
9月12日	立法局選舉，首次引入直選。	
1994年		
6月29日	劉慧卿的「95立法局直選議案」被否決，香港首次錯過全面直選立法局的機會。	

日期	事件	性質
1996年		
12月10日	劉慧卿、李卓人等民主派人士，到會展抗議首屆特首以小圈子選舉產生，期間因前往會展門外時受警察阻撓，更一度躺在馬路抗議，最後警方抬人清場，而劉慧卿因而獲得「瞓街卿」之名。	堵路抗爭
1997年		
7月1日	香港回歸。民主派立法局議員因「直通車」取消，以及不參與臨立會（除了民協成員），在立法局大樓發表將會「凱旋歸來」宣言。	發言表態
1999年		
1月29日	「吳嘉玲案」宣判，所有香港人在中國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婚生或非婚生、出世時父或母是否香港居民，也擁有居港權。	
5月18日	特首董建華與行政會議，就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有否居港權問題，提請人大釋法，民主派指責政府此舉違反程序公義，因繞過終審法院去提請釋法。	
6月26日	人大釋法，表明只有子女出生時已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才有居港權。	
2001年		
7月20日	莊豐源案判決，終審法院判政府敗訴，父母雙方沒有香港居留權的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俗稱雙非兒童）。	
2003年		
7月1日	50萬人上街，要求政府撤銷《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及控訴政府在經濟民生等方面表現強差人意。	遊行抗議

日期	事件	性質
2004年		
4月6日	人大第二次釋法，主動說明有關修改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表決程序，由三部曲變成五部曲。	
2005年		
4月27日	人大第三次釋法，回應時任特首曾蔭權對補選特首的任期，乃前任特首餘下任期，而非重新開始五年一任的計算方法。	
2009年		
6月4日	超過20萬人參與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大型集會
2012年		
6月4日	超過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大型集會
7月1日	民陣稱超過40萬人參與七一遊行，要求梁振英下台。	大型遊行
2014年		
2月23日	超過6,000人參與「反滅聲遊行」，認為由2003年的「名嘴封咪」事件到2014年商台解僱李慧玲事件，不斷出現反政府主持被解僱之事，是官商勾結下，既得利益階層企圖消滅反對聲音。	遊行
3月2日	數千人參與「反暴力遊行」，認為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斬，與有關方面打壓言論自由有關，與過往數次傳媒人被斬事件一樣。	遊行
4月	民主黨與工黨舉行「雞蛋抗高牆，絕食爭普選」活動，希望透過絕食來感召市民爭取普選，其中三人更絕食17天。	絕食抗議
5月	支聯會成功開辦「六四紀念館」，希望香港人毋忘六四，也希望內地人可透過紀念館去認識六四事件。	開設紀念館
6月4日	超過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大型集會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15-21日	「和平佔中」進行「毅行爭普選」，包括陳日君與佔中三子等人士，在七日內，步行到全港各區，呼籲市民參加「和平佔中」的「電子公投」。	遊行
6月27日	法律界人士罕有地出來遊行，共約1,800多位法律界人士，參與這個「黑衣遊行」，反對中共在六月公佈關於「一國兩制」的白皮書，認為當中有扭曲當年《中英聯合聲明》的地方，例如稱香港的權力有多少，是在於中共下放多少權力；被指與原本表明除外交與軍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聲明不符。另外，也指白皮書內說法官等司法人員需要「愛國」，也令「司法獨立」的超然地位受損，影響法治基礎。參與人數乃回歸後三次的法律界遊行中最高，頭兩次是反對兩次的人大釋法，每次共約600多位法律界人士參與。	遊行
6月20日-29日	「和平佔中」舉行「電子公投」，共78.7萬人參與，人數比預期約十萬人遠多，相信與市民不滿白皮書，以及網上投票曾大規模地受到黑客惡意攻擊有直接關係。而三個候選政改方案中，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以333,427票勝出，學界方案以302,567票居次，人民力量方案以81,588票排第三，而棄權票與沒有回答的分別有70,418與1,767票；即超過71萬票要求方案含有「公民直接提名」。而有691,972票認為，如果政府提出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立法會應予否決。	全民電子公投

第二章・第二波民主運動——保育浪潮

爭取民主乃破壞社會和諧？

為何香港會不停出現關於「普選」的爭拗？除了關心自己如何「當家作主」外，也因為中共政府違反了當年承諾香港人可以在07 / 08 年後，自行決定何時落實雙普選，而且中央政府不會作出干預，因為這是香港內部事務，情況就等同中共政府常常批評別國不要評論中國國情，因這屬中國「內政」，不應說三道四。

可惜事實卻是中共透過人大釋法、輿論攻勢，不斷拖延香港人可以自決落實雙普選的時間，那麼，在與原先承諾不符、香港人耐性與對中共信心因而受損下，雙方出現爭拗乃極之平常。所以常常有些言論，說甚麼經常爭拗民主進程、高舉爭取雙普選口號，是在破壞社會和諧、破壞社會氣氛。但不要忘記，只要中共信守承諾，這種爭拗自會大幅下降；而且社會講求「誠信」，要求有權者信守諾言，是一些應該做的事吧，何來破壞社會和諧？情況猶如一個工廠老闆，承諾了月頭出糧，但之後不斷運用各種藉口去拖延出糧時間。當員工們向老闆追債時，老闆身邊的擦鞋仔卻指責追討薪金的員工是在破壞公司和諧，天下間哪有這種道理？

當然，中共政府不是傻的，老闆也不會無緣無故地不斷拖糧，

事必有因。中共其中一個拖延香港人「自決」落實雙普選的原因，是「民心未回歸」，即香港人對中共政府以及其在香港的友好份子信任不足，如果一旦普選，選出來的可能不是中共喜歡的政客。選出一個中共不喜歡的政客，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只要有才能管治好香港，與周邊關係良好便可。但中共顧慮是，雙方關係不友好不緊要，但如果那些政客不斷宣揚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而在地理及資訊流通的因素下，對中國大陸有重大影響，那將動搖中共在大陸「一黨專政（多黨合作）」的根基，對中共希望政權千秋萬世的念頭帶來威脅。因此，一日中共認為香港未能真正「民心回歸」，即熱愛中共，一日容許香港有真正普選的機會也很微小。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錯估形勢，以為回歸十年便能民心回歸，這也是中共「被逼」破壞承諾的原因。

可是兩隻手掌才能拍得響。中共有中共拖延，香港有香港的「監督者」——民主派監督不力或盡了力也無甚成效。所謂無效則思變，當實行的一套方法無效，自然會思考運用其他方法，尤其當見到有其他方法可以嘗試時。當 03七一，即傳統民主派回歸後最高峰時期，卻暗埋下抗爭者思變的種子，這容後再提。

現在先說說，當民主回歸派的抗爭手法所爭取的實效不大時，社會與社運份子開始思變，而當 2005 年的韓農抗議世貿事件，一種香港人只是聽聞但從未親眼見過的抗爭手法，活生生出現在眼前時，新一波民主浪潮終於發酵，是為「保育浪潮」。

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傳統一批不是不會思變，但人總是這樣，當一套方法運行了三五十年，運行得越久，便越難發現當中的問題，更遑論要改變當中的弊端；即使知道要改，也絕非一時三刻能做到。

正如筆者認識一位中年男士，結婚二十多年，但他有個壞習慣，就是每次小便，不論事前事後，總不會拉起廁所板。由於這位朋友生了三個女兒，每次如廁後，總被老婆或女兒用高八度的聲調話他：「又唔記得拉番起個廁所板喇！」每次這位朋友總是死死氣地回答：「得喇得喇，下次會拉番。」可是不知是習性難改還是礙於面子，這位朋友多年來也改不掉那個不拉起廁所板的習慣。人總是奇怪的生物，很多時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而是礙於面子、沒有改變的逼切性或力不從心，總是改善不了問題。與其等他改，不如做好自己或不理會他罷了。

保育浪潮的思維

在傳統民主派光環開始減退時，於 2005 年韓農事件後，一批新的社運份子出現。對比上，他們的面孔比較青春，抗爭的手法更多元化。論溫柔，可以比傳統民主派更柔情；論激烈，可以比傳統民主派更激情；真可說是剛柔並重。而在關注的議題上，新浪潮的社運份子，可說是更深更闊。

保育浪潮社運主要關心的議題如下：

(1) 保育議題：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由輕工業到金融業與四大支柱，由二級生產到三級生產，香港以經濟發展作為主導，以 GDP 及經濟收益論成敗，以財富論成敗。香港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一樣，秉行「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規條。沒人會大力反對發展，但當為了發展而忽略身邊的人、事、物、環境，令到身邊事物因發展而不斷受傷，甚至得不償失，人們便會反思發展的步伐是否過急。當香港經濟發展到成為一個國際級繁榮大都會、世界三大金融市場之一，但同時，因發展而很多環境被侵擾、文物建築被破壞、文明文化被犧牲，人們便會反思香港的發展步伐是否出了問題。而保育浪潮的社運人士，大多認為香港的發展步伐與方式已出

了問題，令香港生病了。很多香港獨有的象徵、特色、天然環境被破壞，而這些都是形成香港與香港人「身份象徵」的事物。加上回歸後，在「當家作主」的氛圍下，一班土生土長的年青人，或以香港為家的人，便會希望香港不要只顧發展而破壞了自己的「身份象徵」。 所以他們會反對過度發展，會去保護一些因發展而被犧牲的文化事物，此乃「保育」，乃保衞香港人身份的抗爭，同時也在構建自我的身份認同。

反高鐵、保衞菜園村、保衞天星碼頭、保衞喜帖街、保衞皇后碼頭、保衞衙前圍村等運動，就是好例子。很多事情、特色、文物，他們未必親身經歷及接觸過，但卻從小耳濡目染，從長輩口中聽過，成為「集體回憶」。保育，也是保衞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保衞香港人的原有生活方法、生活環境、生活質素。根據法國社會學家 Maurice Halbwachs 的說法，即使沒有親身經歷過，但只要有「感覺」，認為屬於一份子的社會回憶便是集體回憶。

總括而言，就是構建身份想像、保衞身份象徵、確立身份認同。

⑵ 民主議題：八、九十年代關於「當家作主」、「港人治港」

QUEEN'S PIER
不告別

的討論，加上新一代大多是土生土長或以香港為家，自會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主人翁，對「當家作主」、「港人治港」充滿盼望。可是當成長後，不斷發現社會的「話語權」不在他們手中，而是在專權政府或其代言人手中，那班盼望着能當家作主的市民除了有感被騙，感到憤怒，也會出來爭取應該擁有的話語權。

由於專權政府是透過由港英時代已出現的制度缺陷、透過制度向既得利益者傾斜、透過拖延民主進程，而令香港市民無法真正當家作主，所以社運份子會出來爭取能真正讓「人民作主」的制度，摒棄舊有的不公制度。參與爭取「公民提名不可少」、五區公投運動、爭取雙普選便是例子。

跟民主回歸派的「為民作主」心態不同，新一波的社運份子缺少一種「精英心態」，不認為自己必定有能力做當權者，只是出於熱誠參與社運，因此對參選對加入建制未必有濃厚興趣，反而只是想確立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制度、確立一個能夠保障香港人權益、香港人能真正話事的制度。所以出發點，是先確保建立的制度能規限當權者不能出賣人民，要先確保人民的公民權，由下而上的改善，從制度根基改善，而非信任人，而是更信任制度。因為明白

到，沒有公平制度在先，縱使好人也可能被不公制度腐化。所以較少信服「策反論」與抱有「為民作主」心態，不多主張向專權政府「談判」、「妥協」為民運主線，反之主張不斷抗爭。透過不斷的街頭運動去給當權者壓力，增加其漠視訴求的成本，從而令當權者屈服或讓步，以建立真正屬於人民的制度。第二波民運浪潮主張以抗爭為主、談判為輔，「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爭取的受眾，以人民為主；相反，第一波民運浪潮主張以談判為主，抗爭為輔，「沒有談判，哪有改變」，爭取的受眾，以政府為主。所以兩者間縱能合作，但常常出現路線分歧。

而且，只要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論是中共政府、特區政府、不想改變現行制度的大商家及其爪牙，也是社運份子的抗爭對象。

在不是真正「港人治港、當家作主」，主權與實權也在「宗主國」身上之下，其實，這與殖民時代的情況所差無幾，只不過「主人」由白種人換成黃種人，或「關係親密」的人而已，所以，也稱回歸後未能由香港人作主的香港，是處於「再殖民」時代，一日沒有真正民主，一日也處於「被殖民」狀態。因此，像捷古華拉，

甚至聖馬丁、波利瓦爾等反封建反殖民的傳奇人物，多成為他們偶像。

在世界的普世價值潮流下，即由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英國君主立憲，到法國浪漫主義蔓延，都令「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令維護普世價值的「人權、法治」制度得到追捧。香港乃中西交流地方，普世價值，即一種普遍國度認同的價值，自然在香港旺盛起來，加上互聯網時代，世界一體化，追求民主與法治的聲音只會越來越大。所以當政府越拖延民主，爭拗便越多越激。

(3) 規劃議題：保育浪潮的社運份子，多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多思考人、事、物、環境四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因此他們關心城市規劃議題、關心香港朝着甚麼方針發展。與其說是城市規劃，更準確說是香港規劃，因在他們心中，香港整體未必只是一個城市，而是由不同環境組合而成。他們認為香港人乃香港土地的主人翁，而土地怎被運用、有沒有重視土地本身的功能，與生活質素息息相關。香港的土地用途應該由香港人話事，而非他們眼中的港共政權或權貴集團去話事，為了權貴利益而只顧發展經濟，犧牲環境

與漠視土地本質。保育浪潮的社運份子關心如何爭取回土地用途主導權。

當香港人連食水、糧食也要過份依賴別人才能生存，連自給自足等基本生存條件也假手他人，自然引起欲「當家作主」的年輕人反思，反思自己住的地方應如何發展，反思香港過去到現在，是否過份單一發展經濟，而忽略環境、自給自足，甚至文化等問題；反思目前發展是否太資本化，太利益化，太着重金錢收入，太商業化，而忽略了「人性」與自然（負有老子「自然之道」萬無作焉而不辭的思想），於是希望從權貴手中，奪回自己土地發展的話事權。

(4) 中國民主議題：或受民主回歸派影響，或受上一代影響，或家中有些長輩來自大陸，保育浪潮的社運份子不多不少也有一種民族情意結，認為血緣的根在中華、在華夏、在中國。認為縱使以香港為家，但家鄉在中國內地。加上，可能基於小時受「八九民運」與移民潮影響，感覺到香港的命運受中國與中共政府牽連，難以分隔。所以要在香港建立一套屬於人民的制度，必定遇到來自專制中共的阻力。意識到香港就像昨日的西藏和新疆，如果想發展屬於自

己的制度，必定要逃離專制統治，或去脱離專制，或去改變專制，使其更民主。

所以基於民族情意結、同理心和前途受牽制，也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希望中國有一定民主後，對阻撓香港民主進程的行為會較少。參與悼念「八九民運」，聲援劉曉波、艾未未、李旺陽等內地維權份子與異見份子，抗議中共打壓異見，也是保育浪潮社運份子所關心的議題。

(5) 國際議題：保育浪潮社運份子的思想多是左傾的，多是左翼份子。這是因為港英時代末期，與特區政府初期，都是行「右傾發展路線」。而他們認為社會在此路線下，出現很多問題，於是乎很自然地尋找新的路線。既然靠右行不通，便靠左吧，所以第二波民運多是左傾份子主導。而左翼人士，不少視自己為「世界公民」，縱使「家在香港，根在中國，但心繫世界」，好一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像馬克思一樣，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應該世界通行，而左翼思維也是這樣。像基督精神要在世上建立國度、佛教要普渡眾生、伊斯蘭教要建立神權社會的世界、希臘文明有宣揚開去的決心，每種認為自己是對世界好的信念或信仰，都有

着要弘揚世界的觀念。所以第二波民運浪潮的左傾份子，除了反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專制獨裁，也有反全世界的專制獨裁，聲援世界的民主發展。例如支持茉莉花革命、支持台灣學生反服貿運動、聲援斯諾登、聲援巴基斯坦女權份子馬拉拉等。

⑹ 反剝削、反資本壟斷：左傾份子追求物質上的公平，追求社會資源與財富有公平分配。因為他們認為職業無分貴賤，更認為社會應是輪班工作，人人都有機會到不同崗位工作，才算公平。認為人不是機器，不應被「異化」（註1），應可參與社會上不同的生產程序，大家一起決定生產甚麼。所以，人人應是平等，所分配的成果與財富也應平等。但現實是，因人的才能、慾望、喜好、勤奮度、IQ、EQ、AQ、需求各有不同，每人希望或有能力得到的資源也不同，那種「理想世界」會出現的機會近乎零。所以左傾份子退而求其次，在資本主義國度實行較「公平」的財富再分配，即透過稅項與福利去再進行資源二次分配，免得社會過份「貧富懸殊」，資源被小部份人所控制壟斷，要打破制度向既得利益階層傾斜的情況。（註2）

所以當見到香港的各行各業、各大領域被大資本家、大財團、

官商集團所壟斷，便認為這樣是剝削勞動人民與普遍香港人利益，乃「地產霸權」（因香港的跨行業大集團多是地產起家和致富，這和政府收入大部份靠賣地與地產相關項目而得來有關）、「官商勾結」（制度保障原有利益者）的惡果，所以也多參與反壟斷、反剝削的運動，例如爭取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反對領匯惡行、反對「無良僱主」等等。

他們認為，作為社會上的持份者，應該有權自主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應被大資本家與維繫大資本家利益的政府所支配，那些「青年重奪未來」、「青年拒當樓奴」等組織，便是爭取生活自主，反抗生活方式被社會制度、經濟環境、政治氣候所限制。

再舉例，他們會認為公務員、政府、警察的服務對象是以人民為本，而非權貴階層，如果政府向權貴傾斜，公務員、警察等公僕，應該選擇服務人民，拒絕政府的無理指令。這也解釋了為何社運人士與警察在遊行示威時特別多衝突，因為社運人士認為警察職責是應該確保他們的表達權利能在安全環境下充份發揮，而非協助政府清場，去剝削他們的表達權利。這種思維也有着中華儒家「社稷江山，以民為本」的思想。「社」即土地，「稷」即五穀。

(7) 支援弱勢議題：左傾份子認為弱勢群體是霸權社會下的受害者，不斷被既得利益一群剝削與搾取勞動成果，所以常常聲援與照顧他們眼中的弱勢社群，例如露宿者、基層人士、貧苦勞工、低收入人士、三無人士（無退稅、無綜援、無收入）等等。由於左翼思想認為，弱勢缺乏照顧與被剝削，很大程度是制度、政府政策失誤、市場缺乏相應監管等問題造成，令生在非既得利益階層者缺乏公平競爭機會與成果被無理剝削，而社會上，大部份人也是受害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別，所以要團結被壓逼人民去反抗不公。

(8) 平權運動：受壓逼的人因自身受害關係，較多出來抗爭。在華洋混雜，在父權主義、陽具主義（擁有陽具者等於較英勇聰明與應該有較大權力與慾望）（註3）與傳統宗教道德觀思想盛行的香港，婦女爭取女權；同性戀人士、跨性別人士爭取權利平等；性工作者爭取平等待遇是常見的，因為他們的權利在父權主義與宗教主義盛行的香港受到一定程度壓逼，因此多對現有制度反思甚至爭取改變去令自己地位權利不受損，因而也被視為弱勢。在世界大同的左翼份子，援助弱勢是他們基本思維之一，所以也多參與爭取女權、不同性取向人士平權等運動，希望在制度與法律上保障他們，

讓他們和其他弱勢群體一樣，有能力去自主自己的命運，不受壓逼；有些有信仰的左翼人士，稱之為「宗教社會主義」，即把宗教價值觀與社會主義觀點結合。相反，由於怕得失選民，傳統民主派在這些敏感話題上多較保守或少發言，或即使支持，其投入程度也相對較低。

總結

(1) 第二波抗爭運動的本土意識，在天星、皇后保衛戰開始蔓延；

(2) 抗爭手法受 2005 年韓農事件啟蒙；

(3) 再因長毛梁國雄在 2004 年當選立法會議員，而令到街頭抗爭那一套，終被認可是可以被大眾接納、可以上大場面，而鼓勵了不少年青社運份子採用街頭抗爭手法，尤其較斯文的民主抗爭手法逐漸失效時，人們自然會思變；

(4) 而爭取民主思維，則是網台中的名嘴，例如黃毓民、蕭若元等有着啟蒙作用；

(5) 左翼思維，則在社民連於 2006 年成立後，配合網台與街頭宣傳攻勢，開始廣為在社運圈子蔓延。

保育浪潮的抗爭手法

激進手法

和回歸浪潮民運相比，新的社運浪潮採用更多更激進的手法：

(1) 包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抗爭運動，包圍政府建築物的情況時常發生。例如天星碼頭事件、艇戶事件，但自從港英政府對民主運動採取開放態度後，類似的手法甚為少用，不論遊行或集會也都是完畢就散場，被較推舉街頭抗爭方式的新一代的社運譏諷為「行完就散、散水遊行」，對政府施加不到任何壓力。自從 2009 年的七一大遊行，社民連和八十後社運份子帶頭留守、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又再發熱起來。之後大型遊行或集會，總有人留守到被清場為止。例如元旦遊行後留守政總、十一遊行後包圍中聯辦。

(2) 持續的大型集會：不同於九十年代的「一日鮮」集會，對於態度強硬的特區政府，表達訴求的強硬程度，不能再停留在港英時代最後時期那樣，否則難得到政府切實回應。於是，新一代社運份子主張模仿外國廣場革命，在政總等地方留守，每天號召群眾來集會，希望憑着持續的群眾壓力，令到政府退讓。例如用絕食等道德

爭取DBC復播
反對滅聲 還聲於民
開放大氣電波
捍衛言論自由

感召的手法，或者用講座和表演去吸引群眾參加集會。DBC 事件、反國教運動、聲援 HKTV 事件，便是連續多天號召群眾參加集會以給予政府壓力。

⑶ 街頭衝擊：八十後社運份子和進步民主派也會採用一些街頭抗爭，甚至肢體碰撞的衝擊，認為要有一定激烈程度，政府才會回應訴求、社會才關注他們的聲音，才能呼喚更多人一起參與對抗不公。有時有些所謂激烈鏡頭，則是突發的，例如當他們在前往目的地途中，被警方阻撓，他們便用上拉鐵馬、衝出馬路等行為，企圖突破警方的防線，令到遊行隊伍得以前進，以及提升抗爭的程度去抗議他們的遊行權利被阻撓。當政府和警方因為不同的原因去阻撓遊行隊伍和示威人士，以及進行清場行為阻止他們企圖到政總或中聯辦等地留守時，警方同示威者的衝突便會越來越多、衝擊和肢體碰撞也會越來越頻密。因此社會普遍認為示威越趨激烈，而社會人士則抗議警權過大，認為政府不應無理限制他們遊行集會的自由。

⑷ 公民抗命：不論是公民社會或是伊斯蘭的宗族社會，不論是神權社會或民權社會，擬定法律時，也是建基於道德之上。如果法律的條例是違反道德，而政府又不肯修改有關法例時，人們便有權

HSBC
Paul Casey
Lee Westwood
打倒金融霸權
佔領中環
為你做數
WE ARE AL
MIGRANTS

以身試法、公民抗命去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逼令政府修改違反道德的法例（註4）。例如民間電台的抗爭行動、佔領中環、佔領匯豐（聲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等都是近年公民抗命的好例子。而佔領行動在左翼盛行，可追源至 1968 年的法國學生運動與日本的反安保運動等。

⑸ 議會內的衝擊行為：自從長毛梁國雄選入立法會後，把街頭抗爭的思維帶入議會，用不合作的態度去抗議制度的不公平及不公的條例。例如在宣誓時修改誓詞、掟蕉、衝出座位向高官示威，都是被視為議會內較激進的抗議行為，透過激烈的鏡頭吸引人們的關注，甚至反思不公平的條例和制度應否被取締。

創新手法

⑴ 創新議會內外抗爭：由於不甘不斷重複成效不大的舊有抗爭手法，為了試圖增加抗爭的效率，新的社運浪潮不斷構思新抗爭手法，以吸引注意和號召群眾。例如由議員總辭，演變成變相五區公投、議會內拉布，都是一些合符法例，吸引群眾的抗爭手法。

⑵ 快樂抗爭：除了透過激烈的手法去增加政府壓力以令對方讓

步外，新浪潮社運會構思如何吸引更多群眾的支持，務求抗爭更多元化，透過眾多的人數向政府施壓。吸引的目標除了熱心參與政治的一群外，也包括平常較少參加社運的男女老幼，於是會舉行一些趣味性高的活動去吸引他們參加集會。例如反高鐵、反國教、聲援 HKTV 集會時的嘉年華、表演劇、音樂會、攤位遊戲、名人演說等活動。

(3) 理念的宣傳：新浪潮的社運，採用不同的方式去把理念向群眾宣傳。除了舊有的派傳單、擺街站的方式外，也會透過開設網台（例如香港人網、謎米香港、MyRadio）、舉辦座談會、開設展覽館（例如菜園村生活館展示何謂本土農業；油麻地活化廳展示如何把藝術展現本土文化）、開辦導賞團（例如馬屎埔導賞團讓人認識香港農村生態；觀塘物華街導賞團讓人認識市區的市集文化）、創立網上文宣媒體，透過文章、漫畫和圖片宣傳理念（例如獨立媒體、輔仁媒體、熱血時報、主場新聞、852 郵報）。由於講座、座談會、網上媒體多可跟參與者互動，互相討論，所以與舊一代的單向宣傳相比，新一代較多參與者間的思維雙向性互動。

要令抗爭成功，有兩個關鍵。

一、是吸引足夠的民意基礎、授權與支持，以逼令政府讓步，例如 03 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有龐大民意授權支持，政府便讓步；也因此，新浪潮社運不斷做教育與文宣宣傳，不像從前，有社會議題才宣傳，是希望一直累積民意基礎與民眾支持。由於舊有民運人士在「出事」時才宣傳，平時則只是為選舉拉票，市民認為太市儈，故當社運由不參選的社運年輕人或學生，例如學民思潮主導，對普遍市民的吸引力較大，道德感召力也較高。

二、是在人不多時，透過有效的方法令政府讓步，就是之前提及的激烈和創新手法。

新社運浪潮會用舊有的手法，吸引民眾支持，只要手法有成效便可，也會用上絕食、遊行、示威、集會、簽名行動等手法。和舊有民運人士相比，新社運浪潮勇於嘗試新手法，或新舊手法混合。但舊有民運人士，可能基於害怕得失選民關係，怕激烈手法嚇怕市民，因而失去選票或無助得到更多選票，以及思維難大改關係，不太習慣使用新手法，因此常被批評為保守。所以我們見到民主黨當年不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主流泛民不參與立法會拉布、傳統溫和泛民政黨不參與留守與堵路、溫和泛民不會在議會內有激烈抗

爭，但社運出現激烈抗爭，主流泛民會加入譴責行列或劃清界線，以上種種，也令新浪潮社運人士與傳統主流溫和民主派不斷結下芥蒂。

但當舊有民運人士，發現因手法和思維脱節，在選票上有損失時，黨內的新一輩便會推動嘗試新的手法，以贏回民心和選票。例如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峰，以被社會視為較激烈的留守手法，抗議區議會內黑箱作業、批撥款程序兒戲。當然，要支持較激烈手法的市民接納，除了手法改變外，思維也要改變，否則手法創新而思維不變，也只是換湯不換藥。

這就像亞視 ATV 一樣，偶爾會有《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尋找他鄉的故事》、《百萬富翁》、《縱橫四海》、《情陷夜中環》等佳作，但整體運作與創作思維不變，也無補於事，與長年廣播《魚樂無窮》無甚分別。

新舊抗爭的分水嶺

2005 年 12 月，數以百計的韓國農民來港，抗議當時在香港舉辦的世貿會議（WTO），抗議資本集團剝削農民利益。當時，不少關心社運的年輕人，受到韓農的感召，也到灣仔會展一帶聲援與觀察。這次 WTO 抗爭，香港社運人士年青一代，尤其沒有親眼目睹過六十年代天星事件、八十年代的士事件，從未見過較激烈的抗爭，一見到韓農有組織、有訓練、有秩序的抗爭手法，真如《紅樓夢》入面的劉姥姥進入大觀園般詫異，說得俗一點是「未見過大蛇屙屎」，所受到的震撼非同小可。韓農數百人竟然足夠令以千計的警方使用胡椒噴霧與較強硬的手法清場，以及數百人威力足以登上各大頭條與令國際關注，簡直成為了年輕社運對何謂「有效」的抗爭手法的啟蒙。社運人士開始明白，手法要有一定激烈程度與長久訓練，才算真正有效，故此，自此後的天星、皇后、反高鐵等運動，也參考了韓農抗議 WTO 的手法。

這次事件，使年輕一代社運人士，不再迷思或模仿舊一代手法，開始思考如何建構屬於他們的抗爭手法與思維；開始從舊有抗爭規條，過渡到釋放年輕一代的潛意識，開始釋放他們的本能與創

共行反高

新力，靠創意去釋放被壓抑的本能，令社運得以進步。這也說明為何社會需要「叛逆」心態，因為缺乏反叛思維，是不會有創新思維，社會不會有進步，所以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容異見的單一管治或獨裁統治，有關機構和社會較快步向衰落。

當然，事後不論左中右傳媒，以「癱瘓」等字詞形容韓農事件，被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是資本家控制的傳媒在抹黑左翼基層抗爭運動，此乃別話。

相反，主流的傳統民主派，經過 03 七一的五十萬人大遊行，認為「和平、理性、有秩序」的「一日鮮」遊行，只要人多便能逼令政府低頭，從而迷信或依賴這種思維手法，令到以後傳統民運人士的抗爭都趨向這種手法，成為與新社運浪潮的兩個不同發展方向，促成在手法上的「新舊之別」。

不過，2003 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民黨前身的「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在網上成立網台，也開了網台盛行之風，加上當年名嘴封咪事件，王岸然、蕭若元、黎則奮、梁錦祥等人組織「人民台」，進一步推起網台之風。所以 2003 年反廿三條，也對新浪潮社運推動帶來了背景條件。

新舊合作

雖然思維與抗爭手法有別，但新舊社運人士也以爭取民主為己任，所以有很多合作空間，也樂於合作以加大抗爭力量。每年七一大遊行的主辦團體「民間人權陣線」入面，包含新舊兩代社運人士便可知。

例如在勞工議題，保育浪潮社運人士與社民連、職工盟、街工等政團多有合作；在規劃議題，與公民黨、公共專業聯盟多合作；在爭取民主制度，與人民力量、社民連、公民黨、新民主同盟等也合作；在環保議題，與長春社、地球之友等合作；在市區重建議題，與民協合作等。

和一波民運浪潮相比，二波民運浪潮也有其他共通點，例如運動的領導也是由上而下，由領袖領導，但分別的是，二波民運浪潮，由於多是左傾份子，較着重「商討」過程，即參與者或核心參與者，會先一起商討，建立共識，確立運動的目標與手法，然後成立「大聯盟」去號召與領導群眾。例如何時集合、解散，是次運動是成功或失敗，是抗爭勝利或只是「階段性勝利」，多由領導在台

上宣佈，而台下民眾是否同意，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一波與二波民運，領袖和群眾間，也有着不少的隔膜。

二波民運轉弱

當抗爭成效不大，或得不到足夠民意基礎，運行中的抗爭便會開始式微，或群眾開始思變。到了抗爭力量未能壯大或處於發展停頓期，未能使人民有持續抗爭信念，還是「鋪鋪清」的參與社運，當牽涉自己利益才參與，即醒覺人民不多時，運行中的抗爭模式自然出現求變聲音。當近年的反國教、聲援 DBC、聲援 HKTV 抗爭，相繼出現領導領袖意見與群眾有較大落差，或社運核心份子思維與社會受壓逼人士出現較大差別時，自然會有群眾自組新的社運模式，企圖取而代之。

當然，在良性競爭下，也有助舊有與運行中的模式去自我完善，甚至也可以互相並行。一波與二波浪潮交替便是這樣，舊有的模式就像一面鏡子，能使參與者知道當中的不足和如何改善。而更新的社運模式此時便出現了，也就是第三波民主運動的「本土浪

潮」。尤其是，大眾開始對環境、生活質素、發展多元化傳統、衞生、文明、法治等方面不斷受衝擊，而二波社運的思維與手法無法配合上時，本土浪潮出現了。

註釋：

(1) 可參考馬克思在 1845 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

(2) 可參考哲學家 John Rawls 著作《正義論》。

(3) 可參考女權學者 Laura Mulvey 在 1975 寫的文獻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4) 可參考哲學家 John Rawls 在 1969 年寫的文獻 *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第二波民主運動大事列表

日期	事件	性質
2005年		
12月	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約千名韓國農民遠赴香港示威，反對資本壟斷主義全球化，香港也有人士聲援。在大約一個星期的示威，到了後期，因發生大型衝突，港鐵灣仔站、紅隧往香港方向線路封閉，整個灣仔區不准車輛駛入。警方出動防暴部隊、催淚彈與胡椒噴霧。最後54名韓農、74名香港市民、61名警員受傷。	大型衝突
2006年		
10月1日	社民連成立，聚集了黃毓民、梁國雄、陶君行、曾健成等激進抗爭份子。	團結抗爭力量
11月-12月	中區第三期填海工程，使擁有48年歷史的天星碼頭及其鐘樓需要拆毀，一些市民在天星碼頭留守靜坐、寫大字報、舉行燭光晚會，甚至企圖闖入施工地盤，抗議碼頭與鐘樓要被拆毀。其後，何來、朱凱迪、司徒薇、陳景輝、林輝等人，組成「本土行動」社運組織。	包圍留守、多元化抗爭
2007年		
3月18日	民陣舉行「爭取普選，改善民生」遊行，期間發生社民連成員麥國風搶奪民協主席馮檢基手中的廣播咪事件。麥國風稱，是抗議馮檢基在支持梁家傑參與第三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時，曾說「由於梁家傑參加小圈子選舉，令扶貧計劃因而有所推進」，而出於義憤才搶咪。事後，民主黨何俊仁與司徒華等人譴責麥國風做法粗暴。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3日	長毛梁國雄和五名「關注公屋租金機制」成員，到時任房屋及規劃局局長孫明揚官邸外示威，抗議政府取消公屋租金以住戶人息中位數10%為上限的條例。最後長毛等人被控非法集會。	包圍
7月-8月	中區第三期填海工程，皇后碼頭需要被拆毀，社運人士舉行演講、靜坐、絕食、音樂會、收集簽名等行動，要求原地保留皇后碼頭。長春社、學聯、香港建築學會推出民間方案。最後逼使政府再諮詢公眾，改為原址修復皇后碼頭。	多元化抗爭
12月	政府計劃把俗稱喜帖街的利東街拆毀重建。社運人士再次反對，以及提出民間保育方案，而居民葉美容女士則絕食抗議。最後政府以新的「姻園」方案取代原有方案。	多元化抗爭
12月29日	時任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來港，社民連梁國雄與陶君行等人在禮賓府外燒車胎抗議人大常委會否定2012年雙普選的可能性。	焚燒雜物抗議
2008年		
10月15日	黃毓民在立法會內掟蕉，抗議生果金加到1,000元後，對70歲或以上的新申請長者設立資產審查。	議會抗爭
2009年		
2月25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立法會發表財政預算案，社民連三子（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掟道具蕉、掃櫈抗議政府對基層市民缺乏援助。	議會抗爭
3月3日	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陳偉業譴責時任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沒有到中國內地探望被公安扣留的香港人時，黃毓民在旁叫林瑞麟「快仆街！」	立法會用語爭論
3月27日	梁國雄在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直呼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為「仆街」。	立法會用語爭論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4日	二十萬人在維園悼念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大會以「薪火相傳」為其中一個口號。	集會
7月1日	十萬人參與當年的七一遊行，發現眾多年青人面孔，更有人投訴TVB因刻意淡化有關六四事件的新聞報道而抗議，戲稱TVB為CCTVB，即諷刺TVB染上大陸中央電視台被視為在政治問題上「報喜不報憂」的惡習。當年出現較多「新潮」口號，包括諷刺洋名Donald的特首曾蔭權為「勿當奴」等。該年，周諾恆等三名社運人士絕食71小時去呼籲市民參與遊行。而該年是第一次有社運份子遊行完畢後，留守政府總部，希望有官員出來對話、聆聽訴求。而警方在大約凌晨二時清場。	遊行示威、留守
12月27日	十多名社運人士喬裝成古代死囚，聲言聲援被「以言入罪」的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	示威抗議
2010年		
1月1日	元旦大遊行，遊行完畢後，數百名社民連支持者與社運人士，包圍中聯辦門口抗議。	留守包圍
1月5日	繼在2009年11與12月兩次數千人的「反高鐵、停撥款」集會後，五位八十後社運青年，發起「五區苦行」，即每行26步便停一停，然後在地上撒下大米，再只用腰力、不用手力的站起來再行。有數十名市民與菜園村居民參與，抗議政府用600多億興建港深高鐵，卻要拆毀非原居民村落的菜園村，及要求政府反思600多億是否物有所值與控訴對基層照顧不足。	苦行
1月8日	在立法會外舉行就高鐵事件的立法會撥款會議直播，以及在立法會外舉行嘉年華、音樂會等吸引市民參與。此次事件，主要靠在網上吹雞動員。	多元化快樂抗爭

日期	事件	性質
1月12日	6名社運青年，發起連續120小時的「斷食」，即只喝清水，不進食，以感召市民參與包圍立法會行動，要求「反高鐵，停撥款」。	斷食抗議
1月14-15日	再次就反高鐵而舉行包圍立法會行動，期間舉行文化交流營、講座、電影導賞會、讀書會、直播立法會會議，更派發哨子與吹氣棒給參與市民，仿似嘉年華般。當高鐵撥款通過後，包圍立法會的過萬名市民發動苦行，但被警方阻止，改為留守立法會抗議。	多元化快樂抗爭、留守
1月16日	凌晨時份，部份包圍立法會市民突然走去禮賓府，約3,000人在禮賓府外高唱《菜園之光》、《海闊天空》等歌曲，抗議高鐵撥款通過；而其餘市民還在立法會外留守，要求鄭汝樺出來對話。最後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警方護送下離去。	包圍留守、多元化抗爭
1月27日	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梁家傑、陳淑莊等5位立法會議員集體請辭，啟動變相五區公投，爭取2012年雙普選。同時，民主黨、民協、湯家驊、公共專業聯盟、職工盟等溫和泛民則組成「終極普選聯盟」，爭取改善提名委員會的政改方案。民主派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爭取普選路線。	五區公投
5月16日	58萬人參與變相五區公投的立法會補選投票，約17.1%投票率。	五區公投
6月4日	15萬人參與該年六四維園悼念晚會。之後數千人到中文大學，護送民主女神像入中大。	集會
6月	政改方案獲通過，而民主黨經過在中聯辦與中共代表談判後，獲對方承諾在功能組別的新增五席是由其餘沒有功能組別的選民投票選出後，支持政改方案，引起民主派中反對政改的人十分不滿。而民主派從此進入傳統溫和派與新興激進派的冰河時期，雙方關係惡劣。	

日期	事件	性質
7月1日	約5萬人參與七一遊行，主張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而支持政改的民主黨，成為部份遊行人士狙擊對象，期間出現爭拗，而司徒華更被人撒陰司紙抗議。遊行後，約200名社運份子留守，直到警方在凌晨時段清場。	遊行、留守
2011年		
2月28日	社民連遊行到中聯辦，聲援中國內地的茉莉花革命行動。	遊行
3月1日	時任特首曾蔭權到尖沙嘴歷史博物館，出席「辛亥革命百週年展」，社民連成員黃浩銘上前抗議，期間更掟出粟米斑腩飯，諷刺高官不懂民間疾苦。而曾蔭權則聲稱被另一社民連成員碰撞時弄傷。	衝擊示威
3月4日	美孚反對興建屏風樓抗爭白熱化，有居民衝入地盤，企圖阻止工程車入內施工。	衝擊示威
3月6日	過萬名市民遊行，抗議該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以及要求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下台。遊行完畢後，有數百名示威者留守在政府總部與皇后大道中、德輔道中、雪廠街一帶。當遇到警方企圖清場時，有人更企圖堵塞馬路。最後警方清場後，拘捕113名示威者。在清場期間，警方使用胡椒噴霧時，曾噴中一名八歲小孩。	遊行、留守堵路
7月1日	七一大遊行，民陣宣佈有約22萬人參與，而警方與學者則推算約8萬人參與。示威者要求曾蔭權、唐英年、曾俊華、林瑞麟等高官下台。遊行後，人民力量約千名支持者與數百名社運人士，分別繼續在中環徘徊，企圖包圍禮賓府，在警方阻止前進後，於干諾道中停下，警方清場，拘捕約200人。	遊行、留守堵路
7月13-15日	過千人包圍立法會，反對政府替補機制議案，認為剝削了市民在補選的選擇權。最後政府押後議案二讀，再就議案諮詢公眾兩個月。	包圍立法會

日期	事件	性質
8月16日	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在巡視麗港城時，有身穿六四標語衣服的麗港城居民，在附近時，被身份不明的「黑衣人」帶走，而有記者企圖拍攝時被阻撓，即著名的「黑影事件」（因時任警務處處長其後在立法會會議上解釋，當時有警員見到有「黑影」掠過，才會出手阻撓記者拍攝）。	
8月18日	李克強到香港大學出席港大百週年慶典，三位身穿六四標語衣服的學聯成員，在港大被警方阻止前進，更發生懷疑被「禁錮」在後樓梯事件。	
8月21日	學生組成反國教遊行，有數百人參與。	遊行
9月1日	政府在科學館舉行替補機制議案諮詢會，有市民對諮詢會公眾席在不足一小時便差不多爆滿抱懷疑態度，認為是建制派動員所致。而當天到科學館外輪候入場，發現不少位置有空缺，但仍被拒絕進場。於是有示威者衝入科學館，令會議一度中斷。事後警方拘捕了梁國雄在內的六名人士。而民主黨事後出聲明譴責示威者行為，令民主黨與社運人士出現更大隔膜。	衝擊示威
2012年		
3月25日	梁振英當選特首，2,000多名市民在會展外抗議小圈子選舉。人民力量更帶隊包圍中聯辦。	包圍、示威
3月-5月	葵涌貨櫃碼頭爆發工潮，貨櫃工人要求外判商改善工作待遇。持續數月抗爭，包括遊行、長期罷工、集會、包圍與留守於長江中心，抗議李嘉誠旗下的和黃集團在把工作外判後，沒有好好監察外判商。	長期罷工、留守包圍、遊行集會
5月	人民力量與社民連三位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拉布，抗議政府替補機制安排。場外則直播議會情況，有過千人參與。	拉布、集會
6月10日	學聯、民陣、華人民主書院舉辦悼念懷疑「被自殺」的中國民運人士李旺陽，更在中聯辦外設置靈堂悼念。約25,000人參與，遊行後，有市民包圍中聯辦，要求有關人員出來對話，更企圖衝入中聯辦。	遊行、包圍

日期	事件	性質
7月1日	七一遊行，民陣宣佈40萬人參與，學者推算9.8萬人到11.2萬人之間，而警方推算約6.3萬人。遊行人士抗議，懷疑中聯辦為梁振英在特首選舉中拉票，干預香港內務。遊行後，若2,000多名市民，跟隨學民思潮或人民力量，分別包圍中聯辦的前後門。而遊行時，首次出現示威者手持大量龍獅旗、香港旗示威。	遊行、包圍
7月2日	梁振英與吳克儉到屯門社區會堂的諮詢會，在會上，學民思潮成員認為缺乏發言機會，便站起來抗議和叫口號。當局便以秩序混亂為由，腰斬諮詢會。	示威抗議
7月8日	梁振英到黃大仙社區會堂的諮詢會，場外遇到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數百人抗議。	示威抗議
7月15日	梁振英到荔枝角社區會堂的諮詢會，除了場外示威，場內也遇上梁國雄帶着小木偶示威道具抗議，抗議政府沒有推動全民退休保障。	示威抗議
7月29日	約9萬人參與由學民思潮主辦的反國教遊行。	遊行
8月30日	3名學民思潮成員發起絕食，呼籲市民到政總集會，要求政府撤回國教政策。	絕食、集會
9月1-8日	學民思潮、家長關注組等組織在政總外每晚持續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撤回國教政策。有市民及家長更絕食，希望感召更多市民支持。最後政府宣佈擱置國教政策，但沒有承諾以後不再推出國教政策。而反國教大聯盟在9月9日凌晨，也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宣佈集會解散。事後有些社運份子認為解散決定過份草率。	絕食、集會
9月	由2011年10月開始，一班左翼社運人士佔領匯豐銀行總部地下，聲援美國「佔領華爾街」行動，抗議大財團壟斷民間財富，導致貧富懸殊，有1%人口控制99%財富之口號。最後在2012年9月，警方清場。	佔領行動

日期	事件	性質
9月22日	約6,000人參與新界東北諮詢會，反對政府發展新界東北，認為破壞鄉郊環境，以及有關發展計劃，公屋比例過低，質疑只是發展成迎合大陸旅客的商業市鎮而已。	集會
10月	社民連與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進行拉布，要求政府就「全民退休保障」政策進行開展工作，或全民「回水一萬元」，要求政府反思在7,000多億財政儲備下，應該「還富於民」，把過份多餘財富交還民間自決怎去運用。而會議期間，市民在立法會外集會聲援。	拉布、集會
10月-12月	出現懷疑政府打壓數碼電台DBC事件。在10月，市民多天晚上在政總外集會抗議，樓南光等人士更進行絕食。	持續集會、絕食
2013年		
1月1日	民陣宣佈約13萬人參與元旦遊行，要求梁振英下台，有示威者手持大量龍獅旗、香港旗示威。遊行完畢後，有示威者，包括戴上象徵反暴政的V煞面具人士，堵路抗議。而社民連與人民力量支持者也曾堵路抗議，希望透過阻礙交通而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從而令政府讓步。	遊行、堵路
5月14日	學民思潮與社運人士到灣仔政府總部「自首」，抗議警方突然拘捕被「低調通緝」的佔中義務秘書陳玉峰。陳玉峰在2011年7月1日被指曾「非法集會」，但警方卻在近兩年後才拘捕她，令市民質疑是否陳玉峰因為當了佔中義務秘書才「突然」被捕。而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解釋，其實警方早在2012年1月已經「低調通緝」她，只不過為怕滋擾到陳玉峰的同事，才遲遲不拘捕她。由於說法較為牽強，引起社運人士此次行動抗議，諷刺警方進行「白色恐怖」，企圖打壓佔中。	抗議

日期	事件	性質
5月16日	梁振英到將軍澳白英奇專業學校出席活動，學聯與社民連在校外示威，要求爭取真普選與全民退休保障。而梁振英離開時，由於沒有接見示威者，約20多名示威者企圖上前阻截梁振英座駕，與警方發生衝突，有部份人臥在馬路嘗試阻止梁振英座駕離開，而大約20分鐘後，警方成功清場。期間學聯成員何潔泓更被男性警員從後「熊抱」，觸及胸部；社運人士批評警方運用過份武力。	示威抗議
7月1日	七一遊行，民陣宣佈約43萬人參與，而港大葉兆輝教授推算約10萬多人。	遊行
8月11日	梁振英到天水圍北出席社區論壇，場外遇到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市民等數百人示威。期間也有一批戴有口罩、自稱「元朗人」的百多名人士到場聲援梁振英。期間雙方發生衝突，有社民連成員更被圍毆。事後泛民政團譴責暴力行為，而4名聲援梁振英人士事後被捕，懷疑毆打示威者。	示威抗議
8月18日	梁振英到觀塘出席社區論壇，警方為防再出現衝突，出動過千名警員。泛民與社民連舉行「默站」示威，控訴親建制團體懷疑聘用「黑社會」去阻嚇示威人士；而人民力量、熱血公民、本土派支持者也到場抗議，期間與親建制的「愛港之聲」成員口角。場內梁振英被菲律賓人質事件家屬質疑政府在討回公道上，三年來辦事不力。	示威抗議
9月15日	梁振英到灣仔出席社區論壇，場外遇到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團體示威，而示威者與親建制的「愛港之聲」成員口角。	示威抗議

日期	事件	性質
10月20日	香港電視（HKTV）網絡職工會以「民間開放電視行動」發起遊行與集會，要求政府解釋為何不發免費電視牌照給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尤其在四個報告總結，香港電視在三間申請牌照機構中排行第二，以及政府有權發放全部三個牌照，為何最後突然只是發出兩個。而社運人士則發起「我要公仔箱，不要黑箱作業」遊行與集會，要求開放大氣電波、爭取公平發放電視牌照制度與對抗一台獨大。遊行前，在Facebook一個叫「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的專頁，獲多達49萬個like，而事後發現專頁發起人同時是遊行搞手。但集會期間，當社運份子宣佈讓十多萬群眾一起商討以後行動去向時，曾發生參加者上台搶咪事件，聲稱不滿集會被部份社運常客「騎劫」。也發生社運份子與香港電視員工溝通不足事件，導致出現香港電視員工根本冇授權進行商討及收集捐款的爭拗。事後也有個別香港電視員工對社運份子安排的集會表示有所不滿。	遊行、集會
10月20-25日	香港電視（HKTV）網絡職工會連續六天在政總外舉行大型集會與留守，期間演出廣播劇、舉辦講座、播放香港電視製作節目以吸引民眾，包括令人拍案叫絕的《半澤直樹》話劇。10月25日，由莫乃光議員提出運用特權法，命令港府在下月8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討論發牌一事前，提交有關審批牌照的文件。結果遭建制派反對，以27票贊成、33票反對及1票棄權否決。	持續集會、留守
10月30日	網民發起「全港熄電視日」，在當日晚上七時黃金時間開始熄電視到夜晚十一點作為抗議。而該時段的TVB節目較上週跌1至4點收視。	集體行動抗議
11月6日	群眾再次返回政總集會，聲援香港電視員工，約5萬人參與集會以及看立法會會議直播。當晚立法會未能就有關議案投票。	集會

日期	事件	性質
11月7日	立法會辯論及表決是否引用特權法徹查港視死因，可惜議案被否決。事後曾出現爭拗，就是在演講時獲得眾多掌聲的進步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投了棄權票。不過他解釋是因經修訂的議案已成「無牙老虎」，因此投棄權票。	集會
11月19日	網民發起第二次「全港熄電視日」，而該晚是TVB台慶日子，更有網民在TVB外示威抗議一台獨大，指出「今日新牌歸故土，他朝霸權也相同」。藝人陳百祥亦向網民「挑機」指如當日可以令TVB只有兩、三點收視，就「跪到返屋企」。而TVB則稱，台慶收視達30點以上，就會捐出300萬元予社福機構。最後該晚台慶只得29點收視，比以往台慶的33到34點收視為少。	集體行動抗議
12月7日	梁振英到沙田出席社區論壇，場外遇到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團體示威，而示威者與親建制的「愛港之聲」成員口角。場內，社民連成員曾浚瑛向梁振英投擲示威公仔「路姆西」，而陳德章則投擲雞蛋，但誤中梁振英身旁的曾俊華。此事後，「路姆西」成為社運「聖物」。	示威抗議
2014年		
5月4日	過千人參與「毋忘高鐵、誓反大白象」遊行，抗議高鐵不斷超支，由預計的六百多億造價升至過千億，以及不滿高鐵延期，認為政府濫建「大白象」的「面子工程」，浪費公帑。	遊行
5月16日	學民思潮成員就時任教育局長吳克儉出席公開活動時，抗議吳克儉有關企圖打壓學生參與「佔中」的言論。	示威抗議
6月2日	學聯成員在地鐵舉行「扮睇報紙快閃行動」，派發1989年6月5日《文匯報》就譴責中共血腥鎮壓的頭版報道，希望市民毋忘六四。	快閃示威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6日	立法會舉行就新界東北發展的財委會，期間新界東北村民與左翼人士等數十人在立法會大樓大堂內示威與靜坐，要求政府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認為計劃乃迎合內地人消費與破壞村民家園的「大白象」工程。晚上八時多，社民連、熱血公民、調理農務蘭花系、人民力量與本土派支持者等數百人到立法會大樓聲援，在約九時多發現警方企圖關閉門口，便阻止警方，引發雙方推撞，最後聲援示威人士成功「守住」門口。但小插曲是，當新到場的示威人士進入大樓時，與原本大樓內的示威人士口角；新加入者認為原本一批示威者過於「和平」，應考慮衝入議會廳去阻止會議進行或最少不應當晚離開大樓，認為成功「佔領」立法會大樓的機會可一不可再，故不要撤離；原本一批認為新加入者「不尊重」他們原訂的示威方式，雙方口角；期間，有左翼人士指新加入者「冇入過東北，冇入過村，冇資格到來抽水」後，雙方口角更激烈；左翼人士控訴有村民被鬧，而新加入示威者則指有份指罵的人只是責罵帶領村民的左翼人士；而新加入示威者中，參與口角者為獨立本土派人士與個別調理農務蘭花系成員，但左翼社運份子卻普遍錯認是熱血公民成員所為。左翼人士認為被本土派人士「抽水」、「騎劫」，因他們沒有跟隨村民的抗議方式，以及企圖改變他們的抗議方式；本土派則指他們也入過新界東北了解，由指責左翼人士亂屈熱血公民，以及把「聲援」當作「抽水與騎劫」，當離開又被左翼人士諷刺為「散水」，當守住門口，不被領情，更被部份左翼人士指為「不和平行為」，更反指左翼人士不留守和只懂大合照後便散場；左翼人士反駁，指如不喜歡他們抗議方式以及當晚不留守，可自組行動與自行留守，而非勉強他們跟隨，又指大合照只為讓媒體報道參與抗議的團體而已。此事乃HKTV集會後，第二次大型左翼與右翼的公開對罵。	佔領行動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13日	立法會舉行就新界東北發展的財委會，事前警方以「非法集結」和「企圖阻止立法會職員辦公」等罪名，拘捕張漢賢、黃洋達、葉寶琳等社運人士。當日有過千名示威者與村民到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區抗議。到晚上，當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加緊限制議員發言時間以及加緊限制議員提案次數，被認為處理手法欠公平，乃繞過正常議事規則而自立不合理規則，而黃毓民、陳偉業、陳志全、范國威、張超雄更衝到吳亮星面前抗議；場外示威區出現哄動，有示威者企圖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由於在場警方一早佈以近千名警員，加上立法會大樓門內有過百名警員穿着防暴裝備把守，故出現「攻防戰」；有示威者用粗木條企圖撬門，更有人用鐵馬撞門，有外牆因而毀壞。結果財委會宣佈押後表決。會後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被指在停車場用座駕阻止建制派議員離開立法會大樓。到深夜，警方呼籲示威者離開示威區後，還有約200名示威者留低。其後警方清場，拘捕21名示威者；包括張超雄議員助理周振宇等事後投訴，在警車內被警員毆打。	衝擊示威
6月20日	立法會舉行就新界東北發展的財委會，事前有林朗彥與朱偉聰兩位曾參與6月13日示威的社運人士被捕，加上在湯家驊、劉慧卿、莫乃光、何秀蘭等議員贊成下，在當天下午兩點半後，不開放平常的示威區，只容許公眾在添美道示威；更不容許立法會議員助理以及任何訪客進入立法會大樓範圍。但這無阻市民到場示威，而多個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團體，事前聲稱，如果再有激烈衝擊，在知情下，不反對也不譴責，會在道義上支持。當日大會聲稱有過5,000人參與示威，而警方表示高峰期達1,300人。在議會內，財委會主席曾想把議員發言的時間限制在一分鐘內，但當時不夠建制派議員在場，吳亮星被指故意拖延表決時間一倍多，因早前曾限制議案要在一分鐘內表決。最後吳亮星動議被否決，但其後他被指執行程序混亂，多名泛民主派議員上前抗議，工黨何秀蘭被指壓低吳亮星的咪高峰、民主黨黃碧雲更被指三次飛掟草帽。最後議會再次無法就新界東北前期撥款表決。當晚，社運人士何潔泓和周豁然雖然全晚只在示威區內示威，但被警方以「非法集會」為由拘捕；另外有兩名16歲以下少年因「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集會示威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27日	立法會舉行就新界東北發展的財委會，最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前期撥款，最終以29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但議事與表決過程令人質疑。包括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被指無理剝削議員向官員發問的次數與提案次數，被指違反議事規則第47條。而表決時刻，吳亮星被指無視絕大部份民主派議員離開座位、走到主席台前抗議其處理議事程序不公，而強行表決議案；但建制派則指反對派議員根本無意回座位投票，因此強行表決乃合理。會議期間，吳亮星曾意圖把梁耀忠與陳志全趕離場，理由是他們口頭質疑吳執行議事程序不公，而泛民主派議員們兩度保護兩位議員免被趕走，被譽為民主派少有的團結行為；而黃毓民議員因曾走到主席台前抗議吳亮星不接受其過了時限提出的3,000多項修訂案，而被趕離第一節會議，只能在其後會議節數回來。而場外有達4,500人示威，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集會示威
7月1日	2014年的七一遊行，主辦單位民陣表示約51萬人參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估計遊行人數約15萬多到17萬多，而警方則指高峰期約9.8萬人從維園出發。有意見質疑，同年的六四集會「坐爆」維園，警方指約9.8萬，但七一遊行「企爆」維園，為何也是9.8萬？而遊行後，學聯與學民思潮分別發起在遮打花園一帶與特首辦外「靜坐」抗議的「預演佔中」公民抗命，目標是抗議到7月2日的早上八時，而最後兩邊都成功在7月2日早上八時「佔領」所屬目標地方。學聯在遮打花園一帶的行動，前後共約3,000人參與，有511人在馬路靜坐抗議時被捕，包括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梁耀忠與李卓人。而學民思潮舉行的包圍特首辦，高峰期有過千人參與，但最後在7月2日早上，特首梁振英座駕並沒有停下接信與對話，令在場示威人士不滿。七一遊行的一些插曲，包括遊行人士與警方爭取開放多一條、即共四條行車線供遊行所用而被警方拒絕時，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指，被一名「白衣警官」推倒在地上，而警方則指一名警員在民眾與警員理論時，曾被推倒。	大型遊行、靜坐抗議

第三章・第三波民主運動——本土浪潮

世事如棋局局新。民眾才是社會運動的主體，領袖只是運動的帶領人，而不是支撐運動的主體。當保育浪潮的抗爭思維與手法與群眾或部份群眾出現隔膜時，群眾自然會尋找新的社會路線與抗爭手法。而回歸後，除了在身份構建與身份保護問題，產生了保育浪潮，近年還因中港兩地的（強逼 / 不可避免的）「融合」、「磨擦」、「矛盾」，出現了身份反思與身份保護問題。中港兩個不同文化體（一個受中共政策把原有中華文化扭曲，另一個則中西合璧），為了利益和生存而互相爭鬥。而這種自我保護、身份反思、對抗入侵文化體的思維，很自然滲入到日常的抗爭思維與運動內，於是便產生了「本土浪潮」社運，可稱之為第三波民主運動。

本土浪潮的成因

首先我們必須探討本土思維的成因。

香港的本土問題其實就是民生問題，雖然 2003 年因為沙士，而使香港經濟進入低潮，而自由行等相關經濟刺激政策，的確帶動本港經濟復甦，可是，制定政策時必須要有長遠規劃，學中共的說法，要「循序漸進」，否則推行操之過急，脫離實際情況，

便會適得其反。簡單點說，一套套路不可能永恆不變都會有效。就好似潮流般，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近藤真彥的「媽池」頭髮型，九十年代興郭富城的「中間分界」髮型，零零年代興中間留長但側面剷青的髮型，一零年代興「韓流」髮型；說明時代不斷演變，用死一招半式，如何在江湖上行走？難道個個都是程咬金，成世靠死「三板斧」就能號令天下？可惜特區政府在民主進程，懂得用「循序漸進」來作為拖延藉口；但在民生政策卻又不懂得如何「循序漸進」。

自由行政策的推行，欠缺審視，沒有理會香港的承托力；政府只懂爭取「便宜利益」，只懂惰性地不斷依靠增加自由行來刺激經濟，卻沒有評估香港對突然兼且不斷大幅增加旅客的承托力，導致自由行政策由福變禍；由原本刺激經濟復甦的措施，變成加重香港人生活成本的禍根。不斷增加同類型旅客，一班只購買「正貨」、「名牌正版貨」為主的旅客，使到香港的商鋪格局與零售模式，也轉向賣「正貨」、「名牌正版貨」；這也解釋了，為何 2004 到 2013 年間，香港的藥房多了四倍，而正版的日用品與名牌貨價格狂升。有新的，就必然有舊的被取替。多了藥房、名牌店與電器鋪，

自然會少了其他「賺錢較少」，不太受大陸旅客青睞的店鋪。可是，那些店鋪卻是原本香港店鋪百花齊放的組成體，現在卻因政府政策而消失。當旅客增加，店鋪東主自然多賺了，而地產主導的香港，業主自然加租。這則說明為何 2004 到 2013 年間，香港的鋪租上升了兩至三倍，但平均薪酬與收入卻沒有怎麼上升。因為自由行等旅遊政策帶來的收益，縱使以金錢衡量，是很巨大，卻大部份流入地產商、大業主、大連鎖店老闆袋中而已，而非香港市民手中；反之，香港人卻要承受鋪租大升帶來的種種副作用。

政府懶惰，自從沙士後，只懂單一地依賴自由行等相關旅遊政策，不懂應變與開拓其他刺激經濟方法，最後，香港人要為政府的懶惰與失誤埋單，這些皆在民怨與抗爭更激烈上反映。相信好賭之徒或有投資習慣的香港人，也明白「分散投資」的重要性；偏偏特區政府不懂，除了依賴舊有的金融、物流、專業服務，就不懂創新，只懂「食快餐」，靠自由行催谷 GDP。

政府就是忘記香港乃地少人多，我們細細個讀書時，小學教科書，不論從前的社會科或是近年的常識科，都必定提到香港乃「地少人多」。因此，物價和鋪租也承受不起自由行帶來的影響，因而

大幅度提升。市民對於日常用品、飲食、價格的飆升，以及見到獨立小商店因應付不了鋪租而被大財團連鎖店所取代，怨氣日增。

物價的問題是最直接影響基層與中層神經，現今日常用品和飲食的支出，和過去相比起大幅上升，但人工卻遠追不上。無論在任何社會，這種怨氣必然相當巨大。加上自從天星皇后事件，集體回憶懷念過去的生活與特色成為了風氣。自從領匯出現，趕走了屋邨商場的傳統老鋪，再加上大量自由行，街道上原本為港人服務的店鋪都相繼變成了專門服務遊客的店鋪，這自然觸動了老一輩與知識份子的神經。

所以「本土優先」四個大字突然興起，就是說政府政策，應該以保障香港人的生活質素、生活文化為優先；任何提倡政策應以「本土優先」的團體，都或多或少，被視為本土派。

本土優先

現在本土優先的主張是得到香港大部份中產與基層支持，這是因為自由行實施以後，香港人感到在生活上的質素正嚴重下降。大量的自由行令到物價、鋪價炒起，連日常生活用品供應也出現短

缺情況：例如奶粉、即食麵、食油食鹽，價錢甚至可以升到兩至三倍。與香港人薪金上升嚴重脫鈎，令到市民生活艱難，這是直接感受到的衝擊。

而鋪價的上升、租金的上升，令到香港很多獨立小店關門，也令香港人和年青人在地產主導的商鋪市場上，更難創業、更難脫貧、更難上流，令社會怨氣大增。香港由不同小店形成的多元文化正慢慢消失，各地區連鎖店與商場同化，香港人開始越來越懷念回歸前的特色與文化，而租金上升也令到香港人創業的機會越來越少，打工的薪金多數變相進貢給大地產商，香港人脫貧和上流的機會也越來越少，所以自由行政策是直接影響香港人的利益和生活質素，促使他們厭惡中共政府各種對港政策。

香港人管治香港人

當政府官僚每次誇讚自由行的貢獻，而沒有從源頭解決自由行過多的問題，香港人自然會越加對香港政府反感。當「大家都是中國人」等論調出現時，香港人會反問「為何大家都是中國人、自己人，利益卻被所謂『自己人』所剝奪，聲音被所謂『祖國政府』所

忽視？」這令香港人對「中國人」、「祖國」這些名詞更加反感，出現離心。說得不誇張，網絡世界更流行一句說話：「話自己係中國人，仲難聽過粗口」。

從前，中國大陸與香港是「左鄰右里」關係，會彼此關照，尤其在上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大陸發生大躍進、文革時，香港會運送物資往大陸，幫助同胞與鄰居。但現在，對於本土派，在自顧不暇與關係在大陸經濟改革後越趨陌生下，「左鄰右里」不再。市民喜歡「左麟右李」（歌星譚詠麟與李克勤）或「左倫右李」（球星歐偉倫與李健和）多於承認與中國大陸是「左鄰右里」關係。

由於利益不被照顧，加上自由行這些「中港融合」政策降低香港人生活質素，香港人自然希望與中國及祖國隔離以保障自己的利益與生活水準，於是便提倡「自治」，照顧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本土優先」。這也說明為何有人提倡香港獨立或香港城邦，這些近乎不可能實現的思想，也得到那麼多關心政治市民的支持。原因就是香港人早已對於中國對港政策出現離心，這就是「去大陸化」。

再說清楚一點，自身生活質素不被特區政府保護，而中共政府只重視大陸旅客受到的待遇，相反對香港人在香港受到的生活壓

遍理會不多，部份香港人便認為，這是由於現在特區政府，並非真正「港人治港」，乃中共的木偶代為治港而已，因而沒有深入理解香港人所需，沒有理解香港人面對的困境。於是便認為，只有政府真正由本土香港人授權、控制與管治，才會真正明白香港人所需，以及照顧香港人的利益。本土派，就是主張本土人授權、控制與管治本土政府，照顧本土人。所以本土派也會追求民主，爭取民主政制；有些為確保政府由本土人控制，更主張「香港自治」，甚至「香港獨立」，這些主張都是因應特區政府的政策方向上的缺失而形成。

「反蝗」出現

所以，出現甚麼「蝗蟲」、「反蝗」的概念，也是因為香港人認為利益是被中國政府政策所剝奪，轉而遷怒政策的得益者，即自由行旅客。因為本土派支持者認為，大陸旅客在香港得到奶粉、食品、日用品、名牌手袋等正貨，更是一些大陸貪官貪商洗黑錢的好機會，卻要香港人蒙受生活質素下降、生活環境大變的困局；有思維更認為是中共政府故意在近年要求香港單一加大發展大陸旅客

市場，令香港在零售市場上依賴大陸，進而可以威逼利誘香港人要聽話，從而減輕香港人反抗中共政治不民主的力度；所以本土派認為，特區政府奉自由行等有利大陸旅客的政策為至寶，實乃中共企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侵略」香港的舉動，面對如此龐大的政府、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一個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不斷上升的大國，香港實在難以抵擋，故必須與其切割才有出路。而「反蝗」，就是反侵略，反對成果被強大的「外來」勢力所入侵，乃一場家園保衛戰；「蝗蟲」就代表入侵者。

至於為何「蝗蟲」會成為了貶意，甚至被人批評為歧視大陸人，乃因中港兩地人的文化差異，甚至文化衝突所造成。部份香港人認為，在中共六十多年統治下，中國慢慢失去了中華傳統儒、釋、道的美德，甚至文明落後起來，當香港人遇見一次又一次有大陸人不排隊、不守公共秩序、隨處大小二便的情況，更覺得對方文化較低，卻在香港撒野，因而產生看不起對方品行之心。而特區政府和中共政府吹捧香港經濟是如何「依靠」自由行政策；大陸旅客乃香港經濟的新「恩客」，包括特區政府和一班建制寫手帶頭視他們為「恩主」（例如宋小莊之流撰文寫香港人對大陸旅客應該要

「頂禮膜拜」），「沒有中央照顧，香港就完蛋了！」，卻變相鼓勵了部份大陸人不用有「入鄉隨俗」心態，而是香港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遷就「恩主」，強國子民不用遵守前殖民地者的所謂文明規矩；只要有一部份大陸人有以上相想法，都導致族群衝突。部份香港人也因而遷怒大陸人，甚至歧視他們。這也說明為何從前香港人在大陸經濟改革初期，最多因對方文明較西方標準落後，而嘲笑對方為「大陸燦」，雖帶有歧視成份，但也會因當年的大陸人經濟較落後、生活環境悽慘，乃「弱勢社群」，所以相對上較包容他們，頂多嘲笑一下而已；而現在，大陸人已富足起來，富得足以令香港人要「依賴」他們與觀看他們面色，他們再不是從前的弱勢社群，而是「暴發戶」了；因此，心態也由嘲笑對方變為仇恨對方，這全是政府政策錯失所造成。可見，中港矛盾是「果」，政府失策是「因」！

雖然按道理說，部份大陸人品行不代表全部，不能以偏概全，但的確，近年香港人遇上這種情況有增無減，這就慢慢使兩地文化差異上不斷累積成衝突；更由於來港者以大陸旅客為主，文化衝突成為了族群衝突。而一些弱勢港人反抗「強勢」大陸族群的行動，

例如「驅蝗」，雖然帶有歧視成份，卻因不少港人感同身受，故雖未必完全認同也會帶點同情行動者。在這惡性循環下，中港兩地的族群衝突越來越深。而這也是其中一個保育浪潮社運份子與本土浪潮社運份子分裂的原因，這點容後再談。

政府無所為，中港矛盾無法解

所以如果想紓緩中港矛盾與族群衝突問題，必須從自由行過多與一簽多行的源頭上解決，讓香港人的物價、租金不會受外來市場所嚴重影響。當香港政府只懂不斷排斥本土派人士和斥責反蝗的行為，只會令香港的怨氣越來越大，連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如辱罵遊客，都會為一般生活受壓逼的香港人支持。

再加上早前雙非問題、產房不足問題，令到一般家庭也反思大陸人來香港是否過多；水貨客的問題近年日益嚴重，也令到北區的基層市民大為不滿。再者非過夜的自由行佔遊客的比例超過一半，他們通常是乘搭火車和港鐵，令到原本已十分擠擁的交通工具迫上加迫，這就是之前有拖篋示威出現的源頭：不單止乘客的數量增加了，拖篋令他們佔用的空間也大為增加，令道路、商場、車廂都嚴

重擠擁。再加上個別自由行霸位不排隊的行為，令到向來遵守規則的本地乘客非常生氣。

可是特區政府對於物價飆升、店鋪與街道特色消失、擠擁的交通工具、在茶餐廳吃飯也要等位排長龍等等最貼心的民生問題，全無解決的方法，也從不對症下藥，甚至只懂叫香港人包容和忍耐，令到香港人認為政府是偏袒自由行，只顧旅遊業的收益，而不是服務香港市民、漠視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怨氣自然會發洩在自由行得益者和政府身上。而即使有政團提出一些可以紓援問題的建議，例如取回單程證審批權、設立陸路入境稅、取消一簽多行，政府都嗤之以鼻，甚至反唇譏諷，說甚麼「未富先驕」言論，不肯着手研究建議，錯失改善矛盾的機會。永遠只是當問題被鬧大、民怨日深，政府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例如本港媽媽連生仔牀位也難求，才「零雙非」、本港家長買不到奶粉，才「限奶令」、本港學生找不到學位，才「人學原區優先」；這種後知後覺心態，不是防範於未然的心態，當然令中港矛盾問題惡化啦！環保人士都識講「源頭減廢」，但由一班「社會精英」組成的政府卻不懂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當然「大檸樂」！

打波就話「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般的隊友」；而香港現時問題，甚麼已被新加坡超越，被其他亞洲三小龍拋離等等，則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般的政府」。當政府出錯令到社會問題叢生，又不知如何解決問題，此時有人建議解決方法，又不去聽，正宗「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明，明又要唔做，做又要做得一半」！

因此，不論左中右派，也把矛頭指向政府，而行動較激進的本土派也應運而生。除非政府能解決以上的民生問題，否則本土派只會越來越壯大，行動形式也會越來越五花八門和激烈。由於香港人認為香港政府是怕了中央，才偏袒自由行，因此不願意承認中央政府，甚至否認傳統上自己乃中國人的身份。因為如果大家都是同一種族的話，沒有理由自己的利益被嚴重忽視，而所謂的「同族人」卻能夠侵佔本屬於自己的大量利益。

區隔 / 切割才是出路

本土派堅持本土優先，先照顧好香港人利益才考慮其他族群的利益分配；主張香港政府的服務對象應只限於香港人，而不是中

央政府或大陸人，除非香港財力大得可以兼顧其他族群。這個怨氣和概念現在也發展到政改方面，認為香港政府不論在民生或政治問題、政改的取態，都是偏袒中央政府，只向「阿爺」服務，完全忽視香港人的聲音。

而本土派精神領袖之一的陳雲，其「城邦論」在 2011 年面世後，提供了香港人除了效忠中國以外的出路想法，會思考怎樣才能脫離中央政府的影響，令香港政府能擺脫中央。

這和從前的思想不同，以前香港人反對中國政府是因為它的獨裁性質以及在六四事件予人一個殘暴不仁的印象，因而反對中共的統治，希望能通過爭取民主而得到真正的獨立自主。在回歸後，由於初期的經濟狀況不差，香港人退而求其次，保留在中央名義底下的統治，但也希望真正的民主普選早日實現，令香港可以真正自治；與獨裁的統治性質切割；或是透過同一時間爭取中國的民主，縮減大家政治上的差距，最終接軌。

但現在反對中央的心態卻不再是政治主張的問題，本土人根本不再理會中央是否獨裁，而是希望透過與中央切割，令到香港的統治者能真正照顧起香港人的民生問題與利益。所以激進本土派的支

見間

持者也反對大中華思想，認為不應該也沒有能力干預中國的民主發展，認為一日在思想上不與中國大陸切割，一日在實際上也無法達成本土民主。

《辟邪劍譜》教人「欲練神功，必先自宮」；而本上派則深明「欲要成功，必先反中」的道理。

區隔 VS 切割

對於與中國大陸關係，溫和本土派則主張「區隔」，而非「切割」。認為要先處理好香港民生與香港人事務，有餘力才支持或援助鄰近地區；或在精力與資源上，多集中在處理香港問題，當鄰近地區或其他地區有需要，如遇上天災人禍，尤其一些能直接影響香港局勢、政治與經濟的地區，例如大陸、澳門、台灣，才去支持它們。這便是「本土優先」主張，即不論經濟、政治和人口政策，都必須先照顧好香港居民的利益；在政策上「區隔」本土居民與外來人和他者，次序是先本上後他者，有餘力才照顧其他地區的利益。例如在人口政策，先照顧好本地居民才招入新移民人口，除非新移民人口有照顧自己的經濟能力及願意以後以香港為家，貢獻香港。

而即使是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也應按香港的承受力與實際情況，之後「循序漸進」地讓他們移居香港。「區隔派」由於只提倡在政策上「本土優先」，而沒有明顯地主張透過「族群差別」意識，主張「族群切割」甚至「族群撕裂」來阻止強勢的大陸人「入侵」，所以被視為「溫和」的本土派。人民力量、范國威和毛孟靜的「香港本上」都是溫和本上派的例子。

激進本土派像溫和本上派那樣，同樣高舉「本土優先」旗幟，即政府政策以香港人利益優先外，還主張族群的區隔甚至切割。激進本土派認為人多勢眾且大國勃起的中國大陸人，對香港的文明、經濟和政治是一種威脅，因為在中港經濟融合、自由行政策、政治體制接軌等方面，相對人口與經濟實力遠較為弱的香港，是無法不被強勢大陸所合併。

激進本土派認為必須在思想上與大中華情意結完全切割，強調香港族群和中國族群的分別，香港人才會決心把利益資源集中照顧本身而不是分薄給中國大陸人，包括參與推動中國的政制和經濟發展。因此激進本上派除了主張政策上的區隔來保護香港民生質素，還有強烈主張「族群意識切割」來保護香港主體化，這就是激

進本土派與溫和本土派的分別，即「區隔本土派」與「切割本土派」的分別。激進本土派不是完全不同意去協助其他地方推動民主與經濟，但必須建基於香港人有穩定溫飽，加上政治穩定，例如已經「城邦自治」或「獨立」，才再在「外交」層面上協助鄰國與他國。激進本土派包括熱血公民、陳雲城邦派、自治城邦派、港獨派等。

族群仇恨的由來

有時候，切割本土派認為，從平常的品行來看（包括不排隊、隨處便溺），給人普遍印象是中國大陸人的文明程度不及香港人，而來香港時又不肯入鄉隨俗，反而以「恩主」的心態要求香港人無限遷就他們，這便產生了他們對大陸人的「族群歧視」。加上認為大陸人要香港在政治、經濟、民生上迎合大陸，是在侵略香港，而弱勢香港又無法阻擋入侵或改變現狀，便由對大陸人的族群歧視升級至「族群仇恨」。在文明水平、恩主心態與侵略行為三重影響下增加憤恨，因而稱他們為「蝗蟲」。

左翼社運人士認為那種建基於所謂的「普遍印象」而產生的

「族群歧視」與「族群仇恨」，是「一竹竿敲翻一船人」，是「以偏概全」。左翼社運人士也認為，是否「蝗蟲」，應以個人品行來界定，而非族群，因為每個族群中總有惡劣或優異的人，不能一概定論。而不少種族屠殺行為，乃因一些極端種族主義者，例如信奉「白人優越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認為有些種族「天生」便比某些「低等」種族優勝，優等種族有權教訓、管治甚至屠殺低等種族。

雖然香港的本土切割派未有迹象顯示有為數不少的人深信那些主義，但左翼人士甚至一些本土派人士也擔憂，如果只是「非人化」、「妖魔化」其他族群，而「其他族群」在權勢上有壓倒性優勢時，那種仇恨情緒有可能演變成「報仇」的肢體衝突。例如本土派的調理農務蘭花系主席啤梨曾說：「我們的底線是不用『蝗蟲』等字眼，所以我們不參與『驅蝗行動』。」左翼社運人士也認為，如果「族群仇恨」沒有紓緩，會容易導致族群間的暴力衝突，而政府有責任透過改善政策去紓緩族群矛盾。

本土派分類

按長遠主張，本土派可分為本土優先派、港獨派、城邦自治派、大粵派四類：

本土優先派：認為政府處理問題時，照顧好香港人便可，除非特別情況，例如別的地方出現天災，資源應先照顧香港人。但沒有長遠領土主張。

港獨派：認為香港乃特殊地方，應該獨立。

城邦自治派：認為香港不必獨立，但最少是一個自治與自給自足的城邦。

大粵派：認為應與廣東等嶺南地區自組一個國家。

按身份認同而言，本土派可分為區隔派、切割派、獨立派三類：

區隔派：主張本土優先，但也主張「本土不否定中國」。認為自己乃香港人，但不反對自己也是中國人，或最少認為中國大陸人乃近親。不反對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與經濟等事情，但大前提是要照顧好香港人情況，才去支援別人與鼓勵別人。不反對中華文化，但不主張族群仇恨或完全切割，因感覺中國大陸人是近親，所以避

免用「蝗蟲」等字眼去形容整個民族，就算認為要用「蝗蟲」字眼，也應以個人的行為是否文明為標準，而非血緣為標準。

切割派：主張本土優先，但認為未能自保前，不應分薄力量去幫助別的地方，也主張「本土不否定中華」，即認為香港也是中華文化一份子，甚至是保留中華文化較完整的地方。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是中華人，但不是中國人；因為認為「中國人」三字已被中共的「黨國一家」、「黨國不分」、「愛國（黨）主義」所污染，所以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就等同支持中共。因此要透過「族群意識」，讓香港人知道自己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之分別，才懂得向「侵略」香港的「強勢中國人」自衛。這有點像 Marcus Garvey 提倡的「黑人民族主義」與「泛非主義」，主張非洲黑人透過族群意識去自衛與抵抗強勢的白人殖民勢力（可參考 Amy Jacques Garvey 著作 *The Philosophy & Opinions of Marcus Garvey*）。但由於也認為香港人是中華文化承繼者，所以主張在成功自保後，例如城邦自治後，去幫助中華文化在中華大地（包括大陸）內復興。例如陳雲的「中華邦聯論」與大粵派便有此思維。

獨立派：主張本土優先，但主張「本土否定中國與中華」。

認為香港與華夏文明與中華文化無關，香港人與中國人再無血緣關係。所以不論從文化與身份認同角度來看，香港也應民族自決，應獨立起來。

悼念六四，分道揚鑣

由於思維上與傳統回歸浪潮民運份子，甚至與保育浪潮份子也有分別，就着應否和應該怎樣悼念六四事件，本土浪潮社運份子與其他社運份子也有南轅北轍的想法。

六四事件，令人民認清中共殘酷一面，認清中共抗拒民主，依賴獨裁專制一面，令人民對中共失去信心。香港的傳統民主派認為，基於民族情意結，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所以中國人的事，香港人也有責任聲援，故在六四悼念，除了譴責中共冷血屠殺，也主張建立民主中國。這當然因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在現實上受到中國直接影響，所以一日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難有真正的民主。協助內地爭取民主，對香港也有幫助。

相反，香港的本土派認為，六四要悼念，除了譴責中共血腥屠殺，也是對香港受到獨裁中共政府統治的不滿，認為香港要脫離中

共獨裁統治才有出路。而香港勢孤力弱，故應先集中精力爭取香港民主，故對應否同時協助建立民主中國有保留。這分歧也反映在雙方如何悼念六四事件的取態上。

2013 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定下的主題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就是這個主題，引起了極大爭議，尤其是主張香港城邦自治、全民制憲，甚至香港獨立的本土派所質疑，認為一個不脫離「大中華思維」、不脫離「愛中國思想」、不脫離「推動中國民主，香港有責」的思維，只會使到香港民主運動進入死胡同，脫離不了中共政府的魔爪。本土派還另起爐灶，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外，搞一個脫離「大中華思維」六四悼念晚會。縱使 2014 的六四廿五週年，支聯會在上次的教訓下，定立主題時已經非常小心，把主題定為「平反六四　戰爭到底」，用上一個較為「中性」的標題，但悼念六四應否脫離大中華思維與中華民族情意結的爭議，仍延續不斷。

當然，甚麼「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只是支聯會的包裝和手法，支聯會的真正主題仍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支聯會用「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去包裝，就是希望能吸引一般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身份為先的中年人能參與六四活動，同時又以「香港精神」去吸引那些以香港人身份認同優先的年青人和「本土派」支持者參與。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新的主題去包裝，單靠「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幾句口號，過往已經被批評為較難吸引新血，還會給人活動老化感覺。從過往支聯會的宣傳策略已經證明，當支聯會的宣傳轉向年輕化時，的而且確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維園的悼念晚會。

自從支聯會在 2009 年，六四二十週年起，在六四宣傳上打着「薪火相傳」的宣傳牌，吸引了很多八十後和九十後參與；因為類似宣傳成功把當年事件與年輕人的身份認同與前途扣上緊密關連，讓年輕人明白到，香港今日的民主進程不斷被打壓、社會不是實行較公義的制度、制度傾向權貴而忽略青年與普羅大眾，是因為中央政府多年來的抗拒民主思維不變，令到香港也受直接影響，所以必須向中央政府發聲，而六四晚會，是其中一個最龐大的發聲場合。支聯會明白到自從六四二十週年開始，每年能有這麼多人逼爆維

薪火相傳
六四廿年

園，年青人的參與是首要條件。由於「薪火相傳」牌已用了幾回，以及本土論興起，為確保人數能保持這幾年的數目，便迎合時宜地打「香港精神」宣傳牌。當然這只是換湯不換藥，六四晚會的真正主題和形式不變，但這種宣傳手法確會令人有點耳目一新感覺，會吸引不少年青人第一次去參加晚會。

另外，打出「愛國愛民」口號，是回應中央希望普選出來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支聯會借力打力，表明要求「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也是愛國愛港表現，希望在大眾心目中建立一套思想，就是愛國愛港的標準便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而不是建制派那套標準（不能與中央對抗）；相反，如果信念和支聯會不一樣，不紀念六四，就是「假愛國」，令很多自命愛國的民主派支持者，為了表示愛國，便去六四晚會。這是一石二鳥的做法，除了把愛國愛港的標準定下來，爭取話語權，他日泛民主派參選特首，即使高舉「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主張，甚至乎會參與六四晚會和與支聯會有合作及良好關係，也是愛

國愛港行為，務求建制派沒有藉口把有着爭取中國民主主張，以及與支聯會有關係的人，排拒於特首候選人門外。雖然支聯會2013年以「愛國愛港 香港精神」為主題，能吸引一些新年青人參與和保留一班堅實支持者，但同一時間，卻惹起一些相信「自治論」、「城邦論」的激進本土派支持者反感，發起杯葛參與支聯會在維園主辦的悼念六四燭光晚會。香港的本土派分溫和及激進兩種，但彼此也主張本土利益優先、維護本土核心價值。溫和本土派認為中港兩地應該通商和有文化交流，只是政治上要有大區隔；激進本土派卻主張完全與大陸切割，堅拒有政治交流與合作，甚至經濟文化交流也可免則免；有些甚至認為只要不影響香港，大陸怎發展也不關心。

但是，這也不代表本土派不悼念六四事件，他們主張以「人道立場」悼念。縱使本土派主張與中國內地區隔與切割，而認為六四事件是中國內地事務，但屠殺示威者與平民的行為，在任何國度也不應被容許，所以主張以「反人道、反暴政」立場來悼念六四。2013 年，本土派組織「藍色起義，港人自決」，在尖沙嘴碼頭另行舉辦悼念燭光晚會，有約五百人參與。主辦人陳梓進認為另辦悼念六四晚會，不是不團結抗共力量，而是給不喜歡或對支聯會多年來

未能成功達標，甚至可說是進度「無甚寸進」而失望的人，提供另外一個選擇。

而 2014 年，由激進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領導的組織「普羅政治學苑」以及「熱血公民」，也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外，另行舉辦悼念燭光晚會，主題為「本土、六四、反共」，主張要與中國大陸切割、建立香港本土自主思識、反對中共政府的不人道行為從而令香港脫離中共管治，再建立屬於香港的體制。這和支聯會那種，香港人由於也是中華民族，為了自己，為了同胞，應該一起建設民主中國的思維大為不同。因此2014年六四悼念，出現了兩種思維不同的「競爭」。

更直接的說，在激進本土派心中，從沒「愛國」二字，只有「愛港」；甚至對「愛國」二字反感，對大陸的不同文化不存好感。所以他們反對香港的大中華派——一個把中港命運捆綁的思想，認為必須推倒中共，繼而建立民主中國之後，香港才會有民主和才能真正自主——這些大中華派以支聯會為首。本土派批評他們把香港民主與中共民運捆綁在一起。

激進本土派反對愛國論，反對把中港命運捆綁，而支聯會的

WeChat
香港人的六四集會
今年 轉場
尖沙咀文化中心見
5月4日 時間:晚上8:00-10:00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 自由廣場

「愛國愛港 香港精神」刺激了那班激進本土派，認為支聯會騎劫了「香港精神」和本土派，於是發起杯葛六四集會的行動。

也有一些激進本土派人士，例如熱血公民的鄭松泰認為，甚至不應高叫「平反六四口號」，因不論要求獨裁、屠殺人民的政府去「平反」或「釋放」，都是間接承認此獨裁政府的合法性，以及透過「自我改善」去逃避人民審判，會像當年「承認文革當中有錯失」，但繼續延續不合法政權與獨裁制度的伎倆；甚至認為要求獨裁政府自己改過乃不切實際的空談，應該最直接地爭取「中共倒台」。而支聯會的李卓人認為，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是要獨裁政府認錯，也是對獨裁政府權威的挑戰；而且不只是停留於此地步，還會要求「追究屠城責任」的審判，以及之後推翻獨裁制度，再建立民主制度。

另外一些激進本土派人士，例如真愛聯的梁爽認為，不是不關心六四，首先香港連自己問題都未搞好，根本無暇理會其他地方事宜；再者，如果中國大陸十三億人也安於現狀，不反抗中共，香港人怎去「要求」他們自己出來反抗？甚至對方不但不感謝香港人的聲援，反而說香港人多管閒事與不感激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照顧。而

支聯會李卓人指出，很多希望追究與悼念六四的中國內地人民，一直被打壓，應該聲援被打壓的人。

悼念六四，另起爐灶

相對於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數，中共政府可能更關注尖沙嘴悼念晚會的人數。對比起維園六四晚會的參與者，支持尖沙嘴悼念晚會的人，很多只承認自己是香港人，但不承認自己的中國人。這種「反中華」情緒，相信會令中共政府更頭痛。

情況就像由反對大量自由行、反對一簽多行政策、反對不顧及香港承受力與配套設備，而單一地只是大量擴張內地旅客數目，只是單一地開拓內地旅客市場，而嚴重忽略了香港人的民生質素、生活環境與生活狀況時，所引起的不滿，再化成衝突與「中港矛盾」；從而演變，衍生成「驅蝗」行動、「唱紅打黑」等針對內地旅客的活動；都是起初由不滿政策，慢慢因政府不理會與不改善政策，反之在爭論下把自由行政策擴大，使到不滿情緒由反對政策發展成反對內地人的族群分裂情緒；如果內地與香港兩地政府，能及早在政策上，從根本上應對香港人訴求，不只是單一地發展內地旅

客市場而忽略香港社會情況，便不會出現如斯族群矛盾。

再加上人多了，兩地人民接觸多了，文化衝突機會隨即增加。而香港人因政府過份依賴旅遊政策，忽視民生狀況下，所產生的怨恨，很自然地導致一些「個別」的文化衝突事件，例如早前的內地家長讓小朋友在旺市大街便溺的爭論；在類似個案增加下，演變成「整體」族群衝突。這些完全會在香港社會反映，而這些族群衝突情緒，也會在香港的反共民主運動上反映出來。每次尖沙嘴悼念晚會的參與人數，將會是一個反映究竟如斯族群衝突情緒，在香港市民裏面，有多深入與多廣泛的指標。

除了在尖沙嘴，也有本土派人士（港人自決　藍色起義）於 6 月 4 日當晚，在上水港鐵站 C 出口外，即平時反水貨客擾民的「光復上水」行動的地方，舉行悼念六四集會，向大陸旅客直接解釋為何香港人會悼念六四事件。香港旗飄揚與網民則先後在添馬艦軍營舉行六四晚會，譴責解放軍當年的屠殺行為；本土派人士森麻與辛比則在九龍公園另辦悼念活動。

也有「切割本土派」認為，根本不應悼念六四，例如與陳雲分裂後的「香港自治運動」。認為在本土事務也沒有處理好下，不應

也無暇「干預」「他國」事務，而六四事件的受難者是「他國」的中國人，與香港人無關，在照顧香港人也成問題下，不應浪費精力去理會無力改變的「他國」事務。他們也反對「舉着紅旗反紅旗」的「唱紅」示威方法，認為是模糊了「本土」形象。所以這種「切割本土派」被視為在激進本土派中，族群思維最極端或鮮明的一群。

抵抗身份被消滅

本土派支持者認為，中共為了打破香港乃「反共基地」傳統，除了千方百計阻撓香港民主進程，以免波及中國內地人民爭取民主意識，借鑑香港的成功爭取經驗或激勵了中國內地民主人士的士氣，狠心的要同化香港（左翼說法：中港同城化），甚至「侵略」香港，以經濟與政治手段進行，稱為「經濟殖民」與「政治殖民」。

經濟手段包括令香港的就業市場與零售服務業，要依賴大陸旅客才能生存，使香港從食水、糧食，到消費者都要大陸供應。透過要求特區政府集中發展自由行政策以及官員宣傳，使香港人錯覺，

沒有了大陸旅客，香港經濟便會出現危機。實質上，如果香港進行海水化淡、發展本地農業、改買東南亞糧食，香港的食水與糧食根本不需要過份依賴大陸供應。而旅遊業方面，需要大陸旅客消費佔香港整體消費百分比，已由 2004 年的大約 20% 升到 2013 年大約 38%，但細心觀察，那些消費收入，多落入大業主與大財團袋中而已，普遍市民所得不多。而且旅遊業佔香港 GDP 大約 4% 多，大約八成旅客來自大陸，其對香港 GDP 貢獻雖大，但並未如官員或大陸傳媒所講「沒有自由行，香港就玩完」的「傳說」那麼誇張。就如《雙城記》名句「這是最好的時刻，也是最壞的時刻」。因不理會香港承受力與配套，過度發展自由行帶來的種種負面副作用還未計算，隨時得不償失。最大問題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過任何「雙贏」方案。

政治手段包括企圖拉近甚至統一兩地人民思維，因而推出國民教育；企圖消滅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令香港人認同「中港一家親」，由認同中國人身份，進而像中國內部「黨國不分 / 黨國一家」，也認同中國共產黨，出現「民心回歸」。

消滅一個族群的身份認同，由消滅其語言開始。所以甚麼以簡

體字取代繁體字、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稱「粵語只是方言」，企圖除去廣東話與繁體字的法定語言地位、教育局計劃推行中小學中文科以普通話授課，此等政策，都被視為由取代對方語言，進而取代對方身份認同的政治手段。新疆、西藏、廣州、上海也面對類似情況下，更令香港人不放心。因為「普教中」後，下一步可能是統一教學語言與法定語言，全用普通話取代廣東話，用簡體字取代繁體字。

尋找本土身份

和保育浪潮一樣，大陸政府種種「同城化」政策，令香港獨有文化受損，要「保衞」香港文化。但本土浪潮還走多另外一步，就是「反思」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究竟大家是同根同宗還是兩者不同；或即使從前同根同宗，但現在的中國內地不論在文化到體制的變化，又是否還是同根關係？

本土派反思，究竟香港的文化根源在哪？現在的香港身份構建，受甚麼影響？受中華文化影響？受英殖時代的白人西方文化影響？受香港漁村與新界農民文化影響？或是多者合併？是香港的獨

有歷史孕育出香港的獨有文化，所以香港乃獨特的「獨立」族群？不用依附任何族群？

比保育浪潮多一步是，本土浪潮除了在「保衞」自己身份認同，也因對過往「順理成章」的身份構建產生懷疑態度，多了一份「尋回」身份想像的構建。即是本土派不同保育派，對香港乃中國根源的支流身份產生懷疑，所以除了「保衞」身份象徵的事與物外，也在嘗試「尋回」身份根源。所以認同香港乃華夏文明根源與西方文明混雜的，會先支持「城邦自治」，然後再組「大中華邦聯」；認同香港乃嶺南文明根源的，會主張香港和廣東建立「大粵國」；認為香港身份絕無僅有，不屬任何根源的，主張「香港獨立」；認同香港國際大都會身份乃英國統治時所造成的，主張「回歸英殖」統治；或者最現實的，香港乃混雜文明，與中國大陸有明顯分別，因而支持真正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互不侵犯」。

本土派的身份認同，由以前香港人多數說自己乃「中國香港人」或「住在香港的中國人」，變成現在「獨一無二」的香港人。

本土浪潮抗爭手法

群眾才是抗爭運動的主體，當部份群眾對行之已久但實效不大的抗爭手法失去信心、失去耐性時，自然會「用腳投票」。或者群眾會自己創立自己的抗爭手法，然後嘗試。

在質疑大中華派的身份認同思維，以及反國教與支持香港電視的兩次抗爭中，運動領袖與部份群眾期望出現落差；再加上在「身份定義」上之不同，從而影響應該就哪些事件進行抗爭的抉擇標準也不同時，本土浪潮出現了。

這可以由陳雲「城邦論」在 2011 年面世，首次出現完整的新派本土論述，以及 2012 年的 D&G 事件與將軍澳 agnes b café 餐牌上只用簡體中文字事件，令本土思維開始白熱化。當然，中港兩地不斷的衝突，是令本土思維不斷茁壯成長的主因。

新思維自然也孕育出新的抗爭手法，從本土浪潮三個早期的抗爭運動：D&G 事件、將軍澳 agnes b café 事件、光復上水（抗議水貨客滋擾民生）；到後來的「驅蝗行動」、「自由行壓力測試」、「拖篋」行動、「唱紅打黑（真愛國愛黨行動）」，都反映了本土浪潮在手法上與組織上，與舊有社運有着截然不同之分別。

本土浪潮社運手法：

(1) 沒有領袖：不同於過往的社運，有人組織、有人帶領。本土浪潮的社運沒有人帶領，每個參與者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就像 2014 年 2 月 23 日第一次「拖篋」行動，就是有網民在 2 月 16 日的「驅蝗」行動後，在 Facebook 造了一張圖，圖上寫着「讓愛與拖拉篋佔領旺角」，呼籲不滿自由行過多而令旺角等鬧市街頭天天也過份擠擁的市民，自行拖着篋到旺角西洋菜街一帶扮遊客，表示對遊客過多的不滿。結果，雖然在網上不足一星期呼籲，但當天有過百名網民自發到旺角參與活動，而沒有組織也沒有領頭人，也不用申請（因不算正式的遊行示威），甚至演變成「呼籲」大陸遊客要「愛國」，應該留國消費與買國貨，不要來香港買洋貨，曲線「呼籲」大陸遊客減少來港，以紓援擠擁情況。之後有網民靈機一觸，在 Facebook 成立「真心愛國愛黨聯盟」（真愛聯）群組，呼籲網民仿傚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時期，叫人「愛國用國貨」口號，甚至打扮成紅衛兵那樣，「舉着紅旗反紅旗」，在旺角遊行，「呼籲」來港買洋貨的大陸旅客「迷途知返」。同樣地，也是沒有領袖。而當天，當「巡遊」隊伍被截停時，參與的網民更「自行解

买奶粉 买三鹿蒙牛
不做汉奸

散」，然後「化整為零」，由原本一條大「巡遊」隊，自行分成數十個由「三五知己」組成的小隊伍，繼續到店鋪和街上「呼籲」來港買洋貨的大陸旅客「愛國用國貨」。當天還有不少有趣「仿效」《毛語錄》的口號和標語，例如「買奶粉 買三鹿蒙牛 不做漢奸」、「爹親娘親不及三鹿親」、「寧做黃皮狗 不用白皮豬」、「喝三鹿身體好」；曲線反諷中國大陸的假貨、黑心貨、山寨貨。

⑵ 模式千變萬化：由「硬橋硬馬」的「驅蝗」，到「玩曲線」的「唱紅打黑」，甚至因為抗議有遊客隨地大小便的「街頭攝影大賽」（因為在 2014 年，有大陸旅客帶着女兒在旺角西洋菜街當眾大便，有香港人用手機拍低情況，引起爭執，事後更發展成兩地矛盾；大陸人與香港高官認為香港人缺乏「包容」心態與小事化大、和不應拍攝小童當眾便溺的行為；香港人則認為家長不應這樣帶頭容許小童隨處便溺，影響衞生與公德。有大陸網民發起「黃金週到香港隨處便溺」活動抗議；而香港網民則發動攝影比賽反擊，聲言見一個隨處便溺就拍低一個，希望透過拍攝當街便溺行為能起到阻嚇作用）等，都是沒有組織或聯盟去「指揮」參與者應該怎樣做，也沒有示威 rundown 和事前編排，當市民在網上看到有網民提議的

活動，便可自行參與，然後到場後怎樣表達意見和發揮，則自行決定，非常自在，令表達意見形式不再「公式化」、沒有事先安排後與綵排定的「既定套路」，反而是千變萬化、各適其適，十分機動。

⑶ 重質多於重量：在 2005 年的 WTO 事件後，社運人士再次明白，抗爭要「有效」，除了在人數上要多、獲得一定數量的民意支持外，也可以透過較激或創新方法去吸引市民注意與探討訴求；甚至如果能夠引起有關當局的回應，那也算是有點成效。因此有時不需要人多，運用甚麼手法也很重要。就像全球其中一家最大的遊戲機製造商，曾推出紅白機、PS、超級任天堂、Wii、《大金剛》街機、Game Boy 的「任天堂」公司，作為一間銷售額超過一兆日圓的超級大企業，員工卻只是約五百人，足證「貴精不貴多」、「重質不重量」的道理。

基於香港的活躍社運份子不多、本土浪潮社運才剛成形不久、本土浪潮社運予人較激烈印象，令部份政治熱情較低或怕參與示威「有危險」的市民卻步，所以參與行動的人不多。但由於手法創新，甚至能「刺到」專權政府的痛處，例如 2013 年底有個別主張「港獨」人士手拿「香港旗」到解放軍軍營示威、2014 年 2 月在廣東道發起的「驅蝗」行動出現與大陸旅客口角鏡頭、2014 年 3 月在

旺角的「唱紅」遊行、2014 年 5 月網民到時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宅外扮「屙屎」（實乃道具 / 玩具屎），以抗議有旅客帶着小童在香港鬧市當眾當街大便時，蘇錦樑說：「包容是最好的處理方法」、「我是基督徒，《聖經》教人包容」，於是也要求蘇錦樑包容他們在其家外和對面「屙假屎」；事後當然是蘇錦樑譴責他們（也因為蘇錦樑的家對面是教堂，認為這樣做「褻瀆」神靈）、其後更有市民寄上裝着糞便的信件給蘇錦樑，當然再次是蘇錦樑不包容而報警。

這幾次行動，參與人數不多，最多的兩次也大約二百人而已，但卻獲得被稱為中共黨報的《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以及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和一眾高官回應。除了譴責示威者行為，也出現一些要求檢討香港旅遊政策的回應，包括應否在旅客人數上像台灣那樣，設置配額？要求檢討「簽多行政策、應加建香港旅遊配套、應在全港增設景點等。這些不論譴責或回應訴求的官方反應，在本土派心中，視為行動上有「成果」。

不過，如何吸引更多市民關注與參與，如何使到更多市民明白他們行動背後的意義，例如「唱紅」遊行乃「舉着紅旗反紅旗」，不要誤會是支持毛澤東主義在香港實行，把抗爭行動從小圈子帶回

大眾層面，是本土浪潮社運人士要思考的事情。

相對於傳統社運，本土浪潮由於沒有領袖、沒有人拍板，行動由群眾自行提出，自行參與，沒有公式可跟，是較機動化，非公式化。所以不會像舊式社運，有公式可從，不會千遍一律，反而千變萬化、靈活多變。人人各適其適，不用按照任何人訂下的模式；參與者較主動，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不用像傳統社運般，要等待台上領袖發號施令，然後跟着訂立好的程序表行事。每個參與者也平等，不分台上台下。有說這樣可能較缺乏規律，因為行動變數較大，難以捉摸，加上沒有領袖，較難控制群眾秩序；但這卻正正容許了參與者的創意發揮空間。當然，行動有多大的靈活性與變化性，取決於群眾的創意度。

民運組織之間的磨擦與私怨

對於民主爭取，三個浪潮的社運人士也大同小異，對於民生議題，三個浪潮的社運人士也傾向扶助弱勢或受逼害的群眾；雖然就身份認同，回歸浪潮較為大中華主義與華人民族主義，保育浪潮則保衛本土身份但認同大中華的根，本土浪潮則尋找本土身份，主張本土優先，認為要脫離大中華主義。當然有些政團與社運組織及人

士，不能簡單地劃分做三種，有些含有超過一種浪潮的特質，有混合身份，這在下文再談。

對於民主與民生議題，由於理念相近，不論甚麼浪潮出身的社運人士和團體，本應有很大合作空間，但由於手法之別、路線之別，以及思維之別，當意見不合，往往因此而互有磨擦。尤其是彼此不同手法會妨礙對方行動，磨擦會更甚。有時，磨擦會成為遷怒於對方的怨氣，慢慢變成私怨，令彼此不但不能合作，還因怨氣導致互相批評與嘲笑對方。所以性格剛烈的社運人士，當手法、主張、路線、思維有別，甚至跟對方有「牙齒印」，不但不會合作，更會互相駁火。

2010 年的「五區公投」，當民主黨決定不參與後，與「公投派」已開始就路線手法問題而駁火，也就是「抗爭派」與「談判派」分歧；當民主黨與民協意外地「突然」與中共達成協議，支持政改方案，認為有少許進步，即多了五席「超級區議員」功能組別議席，已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同時，不少政團堅持推倒政改方案，因為在分組點票還存在、功能組別及直選議席比例不變、政府沒有承諾取消功能組別，立法會還是維持在不民主狀態；在此時，民主派出現大分裂。之後進步民主派，如人民力量在 2011 年區議會

選舉與 2012 年立法會選舉主張「票債票償」運動，主張追擊民主黨與民協，要它們為支持政改而補償，認為它們支持不義政改方案乃「投共」行為，分裂之勢更劇烈。個別民主黨高層，例如劉慧卿與單仲偕，在沒有實證下，多次公開表示人民力量等進步民主派是「收了共產黨錢」去攻擊它們，證明因立場理念手法之異而引起的分裂，已到對立景況。而就 2017 年特首選舉方案，堅持捍衞公民權的「公民提名」的進步民主派，與不需要「非公民提名不可」、只要泛民等異見有機會入閘做候選人、「無篩選」的保守民主派互相爭拗；2014 年 5 月 6 日，「和平佔中」支持者選舉三個方案入選 6 月 22 日「電子公投」，所有含有「公民提名」議案大勝後，公民提名派與非公民提名派爭拗更甚；應否參與「和平佔中」等等事件，也是民主派分裂標誌事件。

即使信念相近，但因路線和組織內部問題，周不時也會引起民主派內部分裂，例如社民連分裂事件、人民力量分裂事件、新民主同盟出走民主黨、民主黨多次成員大規模出走、民協就臨立會立場的出走潮等，足證明香港的民主運動組織「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環中
領佔

第三波民主運動大事表

日期	事件	性質
2012年		
1月	名店D&G被指不容許香港人在店外拍照，引起大眾嘩然。事發有香港人欲在D&G門外拍照，但被店內的保安阻止，並說：「內地人可以在此拍照，但香港人不能。」事件引發近萬人在1月8日，於D&G門外響應網上發起的「集體到D&G影相」行動，抗議D&G歧視香港人，指責D&G無權阻止任何人在公眾大街上拍照。D&G當天要暫停營業一天，隨後更為事件道歉。	網民自發示威
4月	將軍澳Pop Corn商場內的Agnes b café餐廳的餐牌，被發現只有英文與簡體字對照，並沒有香港日常使用的繁體字，被指不尊重香港文化與語言。網民發起杯葛行動，新民主同盟更抗議示威。最後Agnes b café要道歉和在餐牌上加回繁體字。	網民自發示威
9月15 - 16日	有網民在上水港鐵站外發起第一次「光復上水」行動，抗議水貨客成行成市，滋擾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對上水港鐵站一帶的衞生、環境安全構成威脅，約百多人參與。期間，有示威者舉起港英旗，引起水貨客與少數途人罵戰。事後，有左翼社運人士批評不應針對水貨客，應針對政府政策錯失，而參與「光復上水」的本土派社運人士反駁，認為從事非法走水貨行為的人也應受譴責；左右兩翼社運人士在網上展開罵戰與辯論。	網民自發示威

日期	事件	性質
2013年		
6月4日	本土派團體「藍色起義，港人自決」在尖沙嘴鐘樓外，另搞屬於「本土思維」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有約500人參與。有意見指，另搞六四悼念晚會，會影響了支聯會在維園燭光晚會的聲勢，不利向中共團結「平反六四」的力量；而本土派支持者認為，另搞悼念晚會是希望在悼念六四上有新思維，要脫離大中華思維，加入本土定位立場，又指，另搞六四晚會，可吸引厭倦支聯會悼念模式的市民，不應以「搶客」心態看待他們。	網民自發集會
7月1日	有網民發起到英國領使館，感謝英國當年管治香港時，把香港在百多年間，由一個小漁港發展成一個國際大都會，暗諷回歸後，中共政府企圖把香港由一個國際大都會，在十幾年間變成一個「普通大陸城市」；有數十人參與。也有本土派網民發起單車遊行，希望香港回歸英國統治。	網民自發示威
8月4日	近3,000市民在旺角參與「撐林老師集會」，抗議「家長聯會」李偲嫣等人在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舉辦大型活動去「聲討林老師」。除了市民，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調理農務蘭花系、保衛香港自由聯盟、普羅政治學苑等團體也聲援林老師，認為建制派小題大做，去壓逼一位普通教師。事緣親中團體「青年關愛協會」常在法輪功的攤位作出叫喊、打罵、用橫額與人鏈去包圍法輪功攤位等滋擾行為，已引起路過市民多次指責，以及指警方執法不力；而林老師路過時，除了指責青關愛的行為，也指罵警員處理不當，有偏袒青關愛之嫌，期間說了「what the fuck」；之後家長聯會等團體高調譴責林老師為人師表但說粗口以及不應責罵警員，甚至有人在街上掛上大量聲討林老師的橫額，有人更送喪事花圈到林老師家，有「恐嚇」意味；種種聲討與針對林老師的行為，激發一批市民聲援林老師，認為即使林老師一時說錯話，也不應這樣人身攻擊一位女子。	網民自發示威

日期	事件	性質
10月	「香港本土」的范國威、毛孟靜與譚凱邦發起登報行動，集合網民捐款，在報章自資登廣告，要求政府檢討單程證政策，減少單程證配額，以減少新移民數目，防止福利開支不斷加大；由於也在台灣親綠的《自由時報》刊登有關廣告，引起建制派批評為「勾結台獨勢力」。而孔玲瑜左翼人士認為他們把福利問題指向新移民是不公平、是排外，是表面溫和但內裏排外的「危險政客」，乃「披着羊皮的狼」；而譚凱邦認為左翼人士誇大與抹黑。	登報宣傳
12月	四名「香港人優先」成員，手持「香港旗」，要求中共解放軍撤離香港，以及反映香港應邁向獨立。事後除了多個親中傳媒指責，本土派的「城邦自治派」也指責不應闖解放軍營，不應挑釁解放軍，因認為解放軍是在保護香港人安全。	網民自發示威
2014年		
2月16日	本土派網民與反水貨客團體，例如「北區關注組」，在尖沙嘴發起「驅蝗」遊行，不滿自由行、一簽多行等政策影響香港民生，也不滿部份大陸旅客行為衝擊香港文明，例如指責部份旅客不排隊、隨地大小便、財大氣粗；期間更引發與大陸旅客和支持自由行政策團體間的罵戰。約200多人參與。	網民自發示威
2月23日	網民發起「讓愛與拖拉篋佔領旺角」行動，希望社會反思是否旅客政策出了問題，使旅客過多，多於香港承受力，令街道過份擠逼與物價大升等問題；但由於吸收了之前「驅蝗」行動被指不應指罵旅客教訓，開始以反諷方式表達對自由行政策不滿意見。約200人參與，期間親中團體「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出現，被指「挑機」，引發小混亂。	網民反諷行動
3月2日	網民發起「一億人一億篋沙田流量壓力測試」，有過百人參與，以扮「自由行旅客」的反諷行為，表達對自由行等政策的不滿。	網民反諷行動

日期	事件	性質
3月9日	網民發起「（真心）愛國愛黨大遊行」，以類似文革時期紅衞兵打扮，「舉着紅旗反紅旗」，諷刺大陸旅客來港「買洋貨、不用國貨」等行為「不愛國」，以反諷方式表達出對自由行與中共強逼香港人「愛國愛黨」的不滿，有數百人參與，也開了「舉着紅旗反紅旗」之風。	網民反諷行動
3月16日	網民發起在銅鑼灣Sogo門外「感謝」大陸旅客，感謝「沒有大陸照顧，香港完蛋了」的思維，以及再次「唱紅打黑」；再次以反諷方式表達不滿政府政策太依賴大陸配合，忽視香港真正需要與現況。	網民反諷行動
3月23日	網民發起在屯門市廣場「一億人一億篋屯門市廣場流量壓力測試」，以扮「自由行旅客」的反諷行為，表達對自由行等政策的不滿。	網民反諷行動
3月30日	網民發起「光復大埔」行動，以「唱紅打黑」反諷方式，呼籲大陸旅客「愛祖國，用國貨」，表達對政府人口政策、旅遊政策以及水貨客蔓延到大埔一帶的不滿。	網民反諷行動
4月6日	網民與調理農務蘭花系在銅鑼灣發起「唱紅打黑」行動。	網民反諷行動
4月13日	網民與北區關注組發起「上水購物日」，希望社會關注上水水貨客問題、呼籲旅客做個文明旅客，以及獨立小店（非藥房小店）因自由行與一簽多行政策帶來大量大陸消費者，敵不過租金加幅而結業；希望市民多光顧特色小店。	網民反諷行動
4月27日	網民發起「光復海港城」行動，再以「唱紅打黑」反諷形式諷刺自由行政策帶來的種種問題。	網民反諷行動

日期	事件	性質
5月1日	網民在尖沙嘴發起第二次大型「（真心）愛國愛黨大遊行」；也有網民與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行「留金歲月」影展，諷刺有旅客在香港旅遊時，隨處大小二便。	網民反諷行動
5月18日	網民發起「讓愛國激情散播北角」，在被視為民建聯與福建幫票倉的北角舉行「唱紅打黑」行動，諷刺支持建制派親中團體的人並非真正「愛國」而只是盲目「愛黨」，也表達對自由行政策不滿；在遊行完畢後，更有網民到銅鑼灣，聲援被「青關愛」集體欺負的法輪功人士，與青關愛互罵對方為「漢奸、賣國賊」。	網民反諷行動
5月25日	人民力量、公民黨與海怡居民，發起示威，抗議海怡商場業主企圖把海怡西商場變為「名牌特賣商場」（outlet），為了做自由行旅客生意而趕走服務居民的小商戶，期間，已有十年歷史、位於海怡東的名店Prada，因有意加入將會新建的名牌特賣商場，也成為示威目標，有示威者在門外貼貼紙，和進店「參觀」但不購物；他們希望業主收回成命，不興建名牌特賣商場，不想海怡變成第二個「廣東道」。示威者表示，有關行動會每週日也進行。	示威
6月1日	團體「香港本土」在旺角西洋菜街舉行模擬投票，讓市民表達對自由行過多的不滿。而團體「香港人優先」的數名成員，到落馬洲過關大樓外舉牌「香港太擠逼，負荷不到，大陸人不要來」，抗議自由行過多。	集會、示威

日期	事件	性質
6月4日	普羅政治學苑與熱血公民在尖沙嘴舉行主題為「本土、六四、反共」的悼念六四燭光晚會；有本土派支持者在上水舉行悼念六四活動；有「歸英派」本土派人士到金鐘英國領使館，要求英國政府宣佈《中英聯合聲明》失效，以及重新管治香港。	集會、示威
6月8日	有網民與本土派支持者約40人，在蕭若元於屯門有份開的藥房剪綵時，撒陰司紙與抗議蕭若元做自由行旅客生意，也抗議藥房過多。有蕭若元支持者認為抗議人士為何只針對蕭若元開的藥房，乃本身不喜歡蕭若元所致，而蕭若元支持開徵「陸路入境稅」去減少水貨客，不應被針對，以及其藥房又不像一些藥房為了「做自由行生意而高價囤貨，不做香港人生意」般無良，不應被針對；而蕭若元表示其有份投資的藥房雖然也做自由行生意，但不會做水貨客生意，以及會服務本地居民為主。	示威
6月10日	本土派支持者舉行「揸起占蹟，包圍工地，守護歷史，捍衛我城」活動，期間圍着工地頌詩、玩音樂，抗議政府興建高鐵時，沒有好好保護宋朝文物。	多元化集會、示威
7月1日	梁金成等個別本土派人士發起「反赤化、反殖民」遊行，要求捍衛本土利益、落實港人治港、一切港人優先；超過200人參與。遊行後，則響應學聯與學民思潮的「預演佔中」。而黃毓民與熱血公民則在七一遊行後，舉行「全民制憲集會」，超過1,000人參與，其後曾在中環堵路一段時間。	遊行集會

三波民運浪潮之間的分別

	第一波——回歸浪潮	第二波——保育浪潮	第三波——本土浪潮
思維	(1) 為民作主——擁有為民請命及精英心態，希望能帶領人民發聲，以及代表人民爭取權利，靠人民代表去進入制度內改變制度之不義。故着重選舉得失，着重民意，着重選票。也因為選票與民意顧忌，少有「破格」的行動，較墨守成規。 (2) 沒有談判，哪有改變——認為民間勢力與強權政府太懸殊，故此除了要遊行示威去發聲，也要有「政治藝術」，要懂得「談判」、懂得「妥協」，逐步逐步爭取想要的東西。認為抗爭要長久不斷才能成功，沒有可能立竿見影，故此需要談判。而談判的籌碼就是平時選舉時獲得的選票，以及能號召參與遊行示威的人數。	(1) 人民作主——認為社會體制應以民為本，從根本上確保制度反映民意，認為人會變，故主張由制度改變人，而非人去改變制度，擺脫「人治」思維。但認為在抗爭時，也需要由「先覺醒者」去引導人民與帶領人民。 (2)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認為需要透過抗爭才能爭取到社會公義與美好。認為抗爭最大本錢乃民意基礎與授權，當有民意授權去抗爭，強權政府才會認真對待，甚至當民意支持眾多，更能令強權政府讓步。不抗拒談判，但認為要先有民意授權的抗爭，令強權政府注視，才能令強權政府肯「平等」地談判，需要「抗爭為主，談判為輔」；	(1) 人民作主——認為社會體制應以民為本，從根本上確保制度反映民意，認為人會變，故主張由制度改變人，而非人去改變制度，擺脫「人治」思維。在信念上可以有精神領袖，但行動時則不必有領袖帶領。 (2) 沒有抗爭，哪有改變——與第二波思維一樣。

	第一波——回歸浪潮	第二波——保育浪潮	第三波——本土浪潮
思維 (續上)	由於不論選票上或遊行示威，目標為爭取中間大多數，行動偏向溫和，避免有激烈場面，也避面訴求過份「不現實」而嚇走談判對象，因此在市民心中，認為政黨較「市儈」，太過「選票主義」，以及訴求太「就住就住」。 (3) 人數為先，手法為後——認為抗爭手法要溫和，才能吸引大眾參與，故對留守、衝擊、拉布等認為較激烈行為保持距離。	因此會認為傳統回歸浪潮的民運人士的「談判為主、抗爭為輔」路線，因太顧忌談判對手，即強權政府，故在訴求上與抗爭手法上先行讓步，便缺乏道德高地去感召民意支持，更因缺乏民意基礎的抗爭便談判，乃「讓步、妥協、跪低」多於能從談判桌上取得理想成果。 (3) 人數與手法同樣重要。認為除非人數極多，像03七一有50萬人，否則，人數少的行動要靠手法上的創新與激烈去讓強權政府增加管治成本，從而讓步。會先用不同方法去吸引民眾參與，如人數多，不必太激烈；但若人數少，需要較激烈行動去抗衡強權政府與吸引民眾注意。	(3) 人數與手法皆重要，但手法之效率更重要——認為除非人數極多，像03七一有50萬人，否則，人數少的行動要靠手法上的創新與激烈去讓強權政府增加管治成本，從而讓步。認為人數少而過份溫和的示威乃「示弱」，會適得其反，讓強權政府嘲笑。也認為香港人普遍政治冷感，平常抗爭行動較難吸引太多人參與，故行動時注重手法多元化與效率，多於如何吸引中間溫和市民參與。

	第一波——回歸浪潮	第二波——保育浪潮	第三波——本土浪潮
宣傳	着重受眾人數——多與主流媒體保持良好關係，透過傳媒宣傳才能把信念與訴求有效的告訴給大多數市民，以能夠接收訊息的市民數目為評估有沒有效用的標準。平常也會派單張把理念向市民宣傳。也會因為希望吸引網民注意，而開始着重網上宣傳策略。	着重公民教育——希望人民能自發思考社會各種問題，希望能培養市民的公民意識；故多進行一些較深入的「面對面」式的「公民教育」，例如展覽、導賞團、商討、座談會等；以接收訊息的人能夠有多深入思考為衡量效果標準。當宣傳理念時，也會使用單張，通常字數也頗多，甚至會編寫小冊子。也着重在網上宣傳理念，例如網上文章，因為較方便，成本也低。	着重理念宣傳——多在網上宣傳理念，因成本較低；也着重透過網台或網上文章宣傳理念，務求用較低成本把理念傳達給更多人。也會開辦不同種類網台節目，先吸引不同人群注意，然後才灌輸理念。
手法	(1) 由上而下——由政治組織或領導擬定爭取目標，或協助群眾爭取權利，然後擬定行動計劃，再呼召人民參與，然後帶領群眾。	(1) 由上而下——先是社運人上或群眾集體商討，擬定爭取目標與議題，再成立大聯盟，去號召群眾參與大聯盟擬定的爭取行動。	(1) 由下而上——沒有領袖、沒有商討。由個別市民或網民在網上拋出爭取目標和行動計劃，然後網上有興趣的市民，七嘴八舌地各抒己見，集思廣益。到行動當天，參與者自行「蒲頭」；沒有計劃，沒有程序，參與者自行發揮。

	第一波——回歸浪潮	第二波——保育浪潮	第三波——本土浪潮
手法 (續上)	(2) 千遍一律——基本上按一定套路進行。個別政團或多個政團合作，擬定爭取目標與手法後，開記者會號召群眾。多是政團舉行遊行示威集會，當中或加入絕食等行動感召群眾，而後政黨在立法會內力陳己見，然後投票。由於立法會在分組點票機制以及建制派在功能組別議席佔大多數，民主派在立法會投票永遠是少數派。在投票輸了後，便再開記者會，譴責政府，甚或宣佈「今日是民主最黑暗一天」，然後承諾「永不放棄」、「繼續爭取」。被批評為手法「公式化」、「行禮如儀」，缺乏變化與創意。	(2) 千變萬化——既可激進，也可溫柔，更可剛柔並重。由於經過商討，經過集思廣益，不是由少數政治領袖壟斷討論，所以相比傳統民運，手法較多變化，公式變化較多。	(2) 靈活多變——由於不用商討，也不用任何人拍板，任何人可以隨時提出行動，也可以在行動中突然加插自己做法，所以說，沒有公式可跟，變化視乎民眾的創意度與靈活性。

第四章・左右互搏

左翼 VS 右翼　左膠 VS 右膠

保育浪潮與本土浪潮，由於樂於以積極態度，主動尋求創新與更激烈的抗爭手法，以改變不公平制度與專橫體制；摒棄過往傳統民主派，礙於選票考量，而被動地以較消極態度去抗爭；再加上兩者在民主理念上，皆主張「人民作主」，主張從制度改革去構建公平制度，以保障民意得以充份表達、保障民權得以平等地保護，故堅持純高的民主理念。因此保育浪潮與本土浪潮的社運份子，多被視為「進步民主派」、「進取民主派」或「激進民主派」。

但是兩者間，卻又常常互相批評、互相攻擊，因為兩者在經濟思維、身份構建思維上，有截然的不同。保育浪潮出現，是因為香港政府以「偏右」經濟思維治港，加上制度缺乏民主、政府沒有好好去監察市場運作使到有資本家獨大，所以令大眾利益被少數既得利益階層霸佔；故此，保育浪潮社運份子多是「左傾」思維的「左翼」份子。當然，香港政府在不公平制度下，缺乏應有的市場調節，令到有財團可以壟斷市場，阻礙市場自由競爭，這是右翼經濟思維也不容許的。

本土浪潮出現，就是認為被「左傾」思維主導的社會運動太理

想化、過份強調結果公平而導致部份人民的努力成果被「不公平」地奪去給別人補貼，從而忽略了在地人民，即本土人民的基本權益；認為連本土人民的基本權益也保障不了，如何使到大眾得到公平分配？因此在身份構建思維與政治思維上，傾向「右傾」思維，被視為「右翼」份子。由於香港的社運右翼是籠統地指政治思維與身份構建思維右傾的一群，故不少經濟思維左傾但政治思維右傾的社運份子，也被一律視為「右翼」或「右膠」。

由於兩者皆認為自己的一套才能構建美好社會，認為在抗爭上要運用自己那套思維才是正道，故左右雙方為了爭奪社運主導權而不時出現爭拗，在「光復上水」事件、香港電視事件、如何看待中國人與中國國情的態度等等，都是左右爭辯的好例子。由於認為對方思維一成不變，而且言不成理、缺乏邏輯、思想僵化，故互指對方是「硬膠」，即思想「膠化」。因此兩者在爭辯時，常稱對方為「膠」。左翼信念者被稱為「左膠」，右翼信念者被稱為「右膠」。

而香港社運的左翼與右翼有數個思維有明顯分別：

（一）經濟思維之別

左翼思維：左翼主張人人獲得平等待遇（物質上的）、成果平等分配，才叫公平；乃結果論，即以結果所得來定調人民是否獲得公平待遇，當每人所得分配是一樣的，才算公平。左翼認為社會是由大家構建而成，每人的付出也同樣重要，故每人也應該獲得相同的成果，否則，如果成果分配不均，就是勞動付出被剝削；也因為人人平等，不能因為有人才能較遜色而獲得較差待遇，因為左翼認為人不應有過份的高低之分；而如果分配嚴重不均，更會造成貧富懸殊，破壞社會穩定與和諧。但社會上難以實現「絕對公平」，只好退而求其次，主張透過福利制度來「財富再分配」，以收窄貧富差距。由於平等或相對平等分配，需要透過強大的行政手段才做到，因而左翼主張「大政府，小市場」。

故此，左翼主張公平，不應分彼此，所以在新移民問題，會認為既然大家都是「香港人」（縱使出身地或成長地不同，但移居後也願意在香港生根立業），便應視為「自己人」；加上認為新移民人口，尤其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是從經濟較貧窮或政治權利嚴重不公平的地方而來，乃受逼害的「弱勢人士」，基於大家同一民族

（都是中華民族）和人道之心，應好好援助與照顧弱勢人士，故主張新移民來港後應盡快甚或立即獲得公平待遇，例如社會福利。而右翼份子認為，應給予「考驗」，透過一段時間，例如七年，來驗證新移民人口是否願意對香港作出「貢獻」和立根，才能確定對方是自己人，才應在「自己人」的大前提下，有權享用由「自己人」（香港人）貢獻出來的福利。

右翼思維：認為左翼一套注重成果分配來定調是否公平，是某程度上的剝削，因為人人天資與才能也不同，如果人人的工作一樣（例如不分才能高低，大家輪流做相同工作），會埋沒了不同人士在不同方面的才能發揮，也是不公平。右翼認為左翼強調的平等分配，只能做到物質上平等分配，卻做不到精神上與才能上的公平分配。而且每人需求也不同，應該按每人不同需要去分配成果，否則只會造成錯配與浪費。故此，右翼主張透過市場來分配，讓人各取所需與各施所長。

有市場就有競爭，人民透過競爭來定調自己的才能應該獲得多少分配，也透過競爭來嘗試爭取自己希望得到的需要。右翼是重視過程，而非結果。所以右翼主張公平的機會，即人人有權透過進入

市場去競爭以獲得所需。而市場必須給予每人平等的機會去透過競爭獲利，才叫公平。因此右翼也不容許有人透過扭曲制度去造成市場被壟斷，去阻礙別人的機會。機會平等，即人人有權透過競爭去發揮才能以爭取所需。而競爭講求優勝劣敗與弱肉強食，所以會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成功者獲得較多成果，而失敗者獲得較少成果是正常的，所以貧富差距是必然的。但由於機會平等，所以失敗者也有權再投入競爭，透過發揮才能去嘗試脫離失敗行列與脫貧。

競爭機會即主導權在自己手上，自己的發揮如何決定成果多少。同一道理，右翼在政治上也主張主導權，主張自己和自己人（即同一族群）對自己的圈子與社會有主導權。所以香港右翼份子認為香港人應該有香港人自己的政治主導權，來進行經濟自主、民生自主、文化自主，由香港人決定香港人的道路。但在政治權力上，香港人的政治主導權實質在中共政府手上，即香港人的道路被外來的中共政府主導，故右翼社運份子主張與中共甚至中國切離（因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乃兩個不同族群，尤其是中共獨裁主政下的中國，族群間的差別更大），然後奪回政治主導權，讓香港人主導香港人的道路，避免因為主導權在外來人手上，令到香港人的經

濟、民生、文化的應有特色被入侵與破壞。因為右翼份子認為中共只視香港為一個讓國企營商奪利、讓大陸官商洗黑錢、讓大陸人民享樂的地方，以這種心態來主導香港的管治模式，必令香港的經濟、民生、文化的應有特色受到損害。

（二）看待中國人態度

左翼：中國人是弱勢。

不難發現，從對新移民與大陸遊客，甚至水貨客的態度，左右兩翼的態度真是南轅北轍。左翼的態度會相對友善，當見到部份內地人有被視為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行為，例如隨街便溺、插隊打尖、在公共交通上飲食等，會講求「包容」，會「體諒」對方；右翼對大陸人的態度則相對較嚴厲，遇上對方有不文明行為，會立即面斥或拍下對方行徑，甚至會因而「厭惡」對方。對從內地來的新移民，左翼在申請來港與申請福利的資格，主張採取相對寬鬆態度，而右翼則採取相對嚴謹態度。

這是因為，左翼視內地人為弱勢，而右翼視大陸人為強勢。

在左翼眼中，內地人受着專制的中共政府統治，異見人士常

被打壓，只要政治意見不同、公開地發表一些批評政府的言論，或指責政府官員的錯失，甚至是為政治犯打官司的維權律師，不論是記者、博客、網民、知識份子、普通市民，輕則以言入罪監禁，例如發表要求中國政府推行憲政《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關注愛滋病人士權益的胡佳、藝術作品常諷刺中共政府的艾未未、關注汶川地震死難真相的黃琦、要求保障公民權利的王功權、關注強逼墮胎問題的陳光誠、要求查清三鹿奶粉事件的趙連海等，統統都先後被囚禁；重則像六四事件般，連生命也被奪去，隨時像李旺陽那樣「被自殺」。

再者，中共政府的教育被視為為政權說項的教育，說得難聽或直接一點，就叫「洗腦教育」。尤其是 1989 年後，為了減低人民爭取民主與反對專權制度的聲音，便推行「愛國教育」，希望從小在人民心中培養出「為國犧牲」的精神，包括犧牲個人利益與自由，去為「大家」、為「社會」謀求幸福；可是同時，透過「愛國教育」，在不知不覺中，企圖把黨等同國，把中共塑造成「為民請命」、「為民犧牲」、「為民謀幸福」的政權，所以即使犯上「小錯」，例如有「個別」官員貪污腐敗、打壓人民，也應忍耐，因為

中共政權大體上是代表人民去為大眾謀幸福。而且中共不行西方民主，是因可以更方便、更有效地為大眾謀幸福，所以即使不行民主政制、缺乏制衡與監察制度，大眾也應諒解。而傳媒多為黨的喉舌，可以批評地方政策失誤，但對於制度問題，只能「報喜不報憂」，務求人民不要對政制起懷疑態度；總之，即使犧牲了教育講求的全面性、啟發性、思考自主性，傳媒犧牲應有的監察責任，也要鞏固中共主政的地位。總之有貪腐問題、政策失誤導致人權不受保障和出現人命傷亡（例如強拆逼遷、黑心食品、官商勾結欺壓平民），即使是制度缺乏制衡問題所引致，也只能視作為「個別」事件，因為整個國家在黨的領導下，已在進步中，GDP 和經濟已在發展中，凡事以「貧富論成敗，以金錢作成功的量度單位」，所以要給予中共時間去「自我改善」，而非從制度上改革去確保有足夠的監察力量。

在左翼眼中，內地人民從小便生活在「洗腦教育」、「缺憾制度」下，是值得同情、關懷與給予援助的「弱勢」社群。因為從小在扭曲的教育與制度中長大，思維與品行難免有偏差，所以要體諒、同情、包容對方，如果見到內地人有不文明行為，應該好言相

勸，慢慢教化勸導對方。

而新移民就像上兩代從內地移民來港的香港人，都是希望脫貧或逃離一黨專政魔爪下而遷移或走難到香港，所以要援助新移民融入香港，對新移民持寬容態度。

左翼認為大家也是人，人必然有不完美的地方，必然有缺點。內地人有缺點，香港人也有缺點；內地人會有不文明行為，香港人也一樣會有，大家不比對方高尚。所以大家應該互相包容諒解。如果個人修養比別人好，那更應教育修養較低的人，而非排斥對方。

右翼：中國人是強勢。

右翼縱使也會覺得大陸人由於在較落後與專制的教育及環境中長大，因此思維與品行可能出現先天性偏差是值得同情與諒解，可是，在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確是不斷強大，加上港英時代的「順民政策」、「愚民教育」，為了減低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反對，也灌輸以「貧富論成敗、以金錢作成功的量度單位」的思維，少以「道德論成敗」，所以拼搏就是要努力賺錢；富豪，尤其是努力賺錢的富豪，例如李嘉誠等，不論在賺錢過程中，有不是之處，但因最終身家豐厚，也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因此，香港人也會認同

以經濟指數論國家成敗的觀點，所以經濟強國美國、德國是大國，而國民快樂指數甚高，但經濟不茂盛的不丹（位於尼泊爾與西藏旁的國家），不是大國。

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已經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乃世界強國。加上回歸後，香港不論在政治與經濟上也要看中國面色，天然氣、糧食、食水在政府指導下，也被逼依靠中國大陸，所以中國與中國人屬於「強勢」社群。大陸人不再是改革開放初期或之前的「大陸燦」了，現在已經是穿金戴銀，反笑香港人是「港燦」的富貴人士、認為他們是香港人「恩客」、他們的消費是帶動香港經濟與拯救香港，再加上大陸有十三億人且地大物博，而香港只有七百萬人且地小人多，大陸人絕對是強勢社群。從前是大陸人看香港人面色，現在已是香港人看大陸人面色。

不少香港店鋪、學校甚至政府，為了方便強勢的大陸人，棄繁體字寫簡體字、棄廣東話說普通話，就是強勢大陸人在改變香港的好例子。因此右翼不主張對大陸人講包容，因為包容是強勢對弱勢的體諒，而非弱勢迎合強勢的行為，所以相對弱勢的香港人並沒資格對大陸人講包容。右翼認為包容，只能建基於互相尊重與平等的

大前提下，而且只能包容不同聲音、意見、人種，但不是包容破壞現有秩序的行為。

所以右翼認為，強勢大陸人在經濟、文化、生活上對香港帶來的改變（即香港被逼改變部份原有的經濟結構、社會文化、生活環境去迎合大陸人，去賺大陸人的錢），是「侵略」、是「入侵」；因為香港人根本無從選擇，是由中共政府支撐的特區政府代香港人去選擇「被侵略」。因過於迎合中共政府，把香港經濟、文化、生活與大陸接軌，不知不覺間由獨特的國際大都會發展成「強大」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特區政府因而被社運人士稱為「港共政府」。

右翼認為香港已被大陸侵略中，而香港無從反抗，所以大陸人怎會是弱勢？又怎去「包容」？又怎去好言相勸（右翼是假設了強勢人民不會「紆尊降貴」去聽弱勢一方的「教訓」）？而當中部份大陸人的不文明言行，是在破壞香港的秩序、公共衞生、法治，再講「包容」，就是在「包庇」、在「縱容」不友善行為去破壞香港種種。

右翼也會認同人是有缺點，香港人隨時一樣會犯上與大陸人同樣的過錯。但香港人從港英時代開始，被灌輸一種含有「紳士風

度」、「西方文明」的教育，當香港人有不文明行為，是「個別」事件，也應斥責之；但大陸人在大陸因缺乏「紳士風度」、「西方文明」的教育，所以是「制度性」、「整體性」事件，乃「習以為常」。例如香港人和西方人也有人會隨處小便，例如喝醉酒的時候，但那是一時錯失；但部份大陸人則是習慣了在鄉鎮的率性生活，包括小童可隨處小便，是習慣。兩者都是隨處小便，但有根本性的分別。

右翼也認為，家園與特色正在不斷被強勢社群入侵，還盲目講包容、諒解、教育對方，是不切實際。

（三）身份構建思維之別

左翼：大中華主義。

準確點說，左翼是「心繫香港，情牽中國，關懷世界」。

左翼認為香港人雖然是香港的主體，但香港人的根、香港人的血緣乃中華民族，大部份香港人都是數次中國難民潮，走難到香港的「內地人」，家鄉與祖籍在中國內地。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香港人有責任推動內地的發展、民主、文明。加上左翼有國際主義思

想，認為有責任為世界帶來美好的改善，所以內地在獨裁統治下，基於國際主義的責任心、基於血緣同種、基於文化之便、基於地理環境之便，也應協助內地改革。尤其香港是中國最自由、民主程度也較高的地方，更加有責任推動「家鄉」進行改革去拯救同胞。因此左翼認為香港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改革；這也基於左翼認為，大家同根下，是互為影響，尤其兩地政府同屬一脈，內地為宗，香港為屬，所以必須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運行，便應協助內地建設民主法治之度。

香港作為中華一份子，經濟較好時便協助內地脫貧，例如韓戰禁運期，香港人把物資運往內地，改善內地同胞生活；在大躍進與文革時，因內地人連溫飽也有問題，香港人也運送糧食物資去救濟；在改革開放初期，內地需要資本，香港的工業家與商家，基於民族情懷與商機，也回國發展投資，協助內地改革開放；1989 年的北京學生運動，香港人作為中華一份子，便聲援內地的民主運動。所以左翼認同香港基於民族情懷，一向有協助內地的傳統。

左翼國際主義講求多元化，雖然香港人乃香港主體，但香港是多元化社會，加上左翼國際主義的「平等一致化」思想，大家應不

分彼此，所以講求包容而非排斥。

左翼認為，香港人應該「保衞」本土身份，不應被中共大一統思維蠶食，而最佳的保衞身份方法，就是打敗不斷意圖統一政治制度（一起邁向專制）、經濟結構的中共政府，才是治本之道。

右翼：大香港主義。

右翼認為香港人與大陸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族群，不論在文化、經濟結構、政制、法治制度、教育、語言、文字、生活，都有很大差別，所以縱使有祖先也來自大陸，但本身人類發展就是不斷出現族群分散，所以血緣縱有相同之處，但也應視為兩個不同族群，香港人不是大陸人的支流。而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與香港人的差別更大，所以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族群。

有些右翼，例如本土城邦自治派，認為香港也是華夏一宗的支流，但香港才是華夏正宗。因為大陸在中共統治下，已經摒棄了華夏的「儒、墨、道、法」（或許政制上，大陸保存了一些法家權、術、勢思維）傳統，反而香港才是保留華夏文化傳統最完整的地方。應該大陸跟隨香港文化，而非香港跟隨大陸文化，所以香港保留特色與發展大香港主義，才是保衞華夏之舉。

當然有些本上派則認為，香港是嶺南文化或香港文化，不是華夏文化，不是同根。

既然是不同族群，香港人根本沒有責任協助大陸推動民主和改革，尤其是香港已經自身難保，豈有餘力協助他人？就等於泥菩薩過江，自求多福也成問題，根本沒有多餘福蔭去普照他人。香港在主體意識下，應保障自身族群權益為先。

由於兩地族群特性不同，右翼認為，香港人應該「尋回」本土身份，不再盲目相信大中華主義思維，不應再認為兩地是同宗同根同族。再加上大陸是強勢，香港根本無力抵抗大陸入侵，所以主張與大陸切割，才能自保，才能保留香港的文化與特色，不會被大陸同化。

右翼認為推動大香港主義，就是在「尋回」本土身份的構建，避免香港在大陸強權下，被逼族群模糊化，被逼邊界模糊下，被逼中港一體化，令深圳河南北再沒分別。所以應向加拿大魁北克族主張的與加拿大「切割」一樣，強調香港族與大陸族的差別，講求身份之別與族群之別，甚至是族群分割與族群撕裂，處於「弱勢」的香港才能自保。

左右互搏

左翼認為不應在政策上「區隔」弱勢的內地人，應基於人道主義去幫助他們，是「利他主義」。左翼認為右翼講甚麼「族群切割」是不切實際，因為即使不承認對方是同族人，但不論民生、經濟、政治，香港也無法逃離中國內地的影響，不應「自欺欺人」，反應積極推動內地改革，去讓香港有一線生機；而左翼也認為，在缺乏財力與軍力，講甚麼「城邦自治」、「香港獨立」，是「癡人說夢話」。

右翼認為，連香港的改革也推動不了，又怎去推動大陸改革？在本土居民也照顧不暇，又怎去照顧更多新移民人口、他國的弱勢人士？連自己也吃不飽，又怎去確保他人都要吃得飽？這是「利己主義」。

右翼認為在一方過份強大，而香港過份弱小，在地位不平等兼且對方不尊重弱小的己方下，講甚麼「包容」而不去抵抗，是漠視社會實況，是不切實際，是「離地」。右翼認為左翼那套只講包容」而不去抵抗，只會令香港不斷被侵蝕而已。

香港社運組織列表

時期	組織
回歸浪潮（一波）—傳統保守民主派	民主黨——由李柱銘、司徒華、李永達等人在1994年10月2日成立，由港同盟與匯點成員為骨幹。自從第二波與第三波的民運浪潮出現，以及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改方案、拒絕參與當年的變相五區公投運動、在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沒有堅持「公民提名優先」旗幟，或不敢保證「公民提名不可少」、不參與拉布與議會衝擊、甚少參與街頭衝擊後，民主黨被視為傳統民主派的最保守代表，甚至進步民主派會視民主黨思維過份守舊，與建制派差別越來越少。何俊仁、劉慧卿、蔡耀昌等為民主黨骨幹。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於1973年由司徒華等人創立。教協與民主黨一樣，自從有新興的社運團體出現後，被視為保守民主派，甚至被笑為「只搞特惠超級市場，而少搞抗爭」。以張文光、徐漢光等人為骨幹。教協、支聯會、民主黨由於有不少骨幹同為三個組織成員，所以被指為「三位一體」。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由司徒華等人在1989年成立，支援當年的北京愛國學生運動。每年主要負責推動建設民主中國與平反六四之務。李卓人、張文光、蔡耀昌等人為骨幹。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由陳立橋、馮檢基、李永達在1986年成立。港同盟成立之時，民協約一半成員離開，留下馮檢基、廖成利等人。在民主道路，民協主張「又傾又砌」路線，主張與中共談判路線，所以要保持一定關係，但同時要表達追求民主的意見；例如參加臨時立法會等，是「又傾又砌」、2010年支持政改方案、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沒有堅持「公民提名優先」旗幟，或不敢保證「公民提名不可少」是典型例子。民生方面主張捍衛基層權益，在深水埗一帶有大量基層支持。

時期	組織
回歸浪潮（一波）（續上）	公共專業聯盟——由莫乃光與黎廣德等人在2007年3月成立，以民主派的專業人士為主，骨幹還有梁繼昌、吳永輝等人。立場在民主派中被視為較為保守，包括在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支持沒有公民提名、沒有公民推薦、沒有間選提名委員會的「湯家驊方案」，以及不參與拉布與衝擊行為。
介乎回歸浪潮（一波）與保育浪潮（二波）之間——傳統民主派，但相對較為開放	公民黨——由余若薇、吳靄儀、梁家傑等「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與關信基、陳清僑等學者在2006年3月組成。由於參與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高舉公民提名旗幟，立場較進取；手法上甚少參與較激烈的抗爭手法，以傳統手法為主，不主張街頭衝擊與拉布等手法。不過個別骨幹，例如湯家驊在民主路線與立場公開唱反調，但公民黨也能「包容」，所以有時有聲音會質疑公民黨的立場較搖擺。
	街坊工友服務處——由梁耀忠在1985年成立。八十年代梁耀忠等人協助葵芳邨、葵興邨的「偷工減料事件」，為受影響的居民抗爭，所以街工一向以葵青區與荃灣區一帶為根本地，也以服務基層、勞工及公共屋邨居民為主。街工在傳統民主派中，乃比較激進一群，參與不少街頭抗爭。雖然街工沒有參與變相五區公投與拉布，但也大力反對剪布，以及支持公民提名。
	工黨——在2011年12月成立，由李卓人、張超雄、張國柱等人成立。服務對象以勞工為主，成員多持左翼思想，在傳統泛民中，較為熱心參與街頭抗爭一群。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1977年成立，主張推動人權與追求公義社會，熱衷於教育及街頭抗爭，也支持變相五區公投與公民提名，為傳統民主派中，最激進一群。

時期	組織
保育浪潮（二波）—進步民主派，持左翼思想與大中華情意結	（一）追求建立左翼社會：社民連（2006年成立，以梁國雄為標誌，追求社會民主主義）、土地正義聯盟（由朱凱迪、王浩賢、黃俊邦等人在2011年成立，反對地產霸權）、青年重奪未來（一班左翼青年成立）、青年拒當樓奴運動、80後社會大學（由陳景輝、陳劍青等人成立，多辦講座與討論會）、工廈3/F（由FM101等一班左翼青年，如梁穎禮等人組成）、學聯（1958年成立，全名為《香港專上學上聯會》，由大專院校成員組成，多年來也是街頭抗爭運動的核心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信奉民主社會主義，乃「工人國際委員會」的香港成員）、左翼21（2010年由多個香港左翼人士成立，例如郭永健、黃永志、區諾軒）、搖滾不容殺人政權（不少成員也曾為FM101與工廈3/F成員）、民間電台（由曾健成等人成立，主張政府把大氣電波權交還香港人）。
	（二）主力關注土地與發展的關係，關注本地農業：打鼓嶺坪輋保衞家園聯盟、土地民化陣線（反對中港同城化的土地發展，反對地產商囤地與關注香港農業）、本土行動（由保衞天星碼頭起，一班保育社運份子成立的組織，包括朱凱迪、葉寶琳、陳景輝、林輝、周思中、司徒薇等）、馬寶寶社區農場、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鄉土學社（以上水梧桐河一帶為根據地）、石崗菜園關注組、香港農業自主香港生活、古洞北發展關注組、菜園村生態社區營造工作室、新界東北發展關注組、香港本地農業發展關注組、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反對中港同城化的香港「被規劃」，即香港人無法自主自身的城市規劃）、人民規劃行動、創建香港、中西區關注組（關組文化文物保育）、中大農業發展組、虎草村支援組、新圍村關注組、鄉上學社、捍衞農村青年陣線。

時期	組織
保育浪潮（二波）（續上）	（三）平權組織，為弱勢社群爭取平等權益，包括勞工、基層、傷健、婦女、同志、性工作者、跨性別人士、少數族裔等：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聯區小販發展平台、影子長策會、新婦女協進會、草根持份者、同根社、龍耳、南方民主同盟、青鳥、紫藤、失明人互聯會。
本土浪潮（三波）—進步民主派，持大香港主義或本土香港思想	（一）城邦自治派，主張香港高度自治，或成為一個自治邦領：城邦自治派（以陳雲及其三部曲學說《城邦論》、《遺民論》、《中華邦聯論》為精神支柱和理論基礎，擁有香港才是華夏正統思維）、香港自治運動（2011年5月成立，英文簡稱為HKAM，雖然也追求城邦自治，但不信服陳雲一套，認為香港不是華夏一份子；成立時本與陳雲一家，後來分裂，包括龍獅旗設計爭議事件）、自由香港政府（追求香港成立自治城邦，但不信服陳雲理論）。
	（二）港獨派，主張香港應該獨立建國：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2012年7月成立，主張香港人要自立自決，反對中國干預香港）、香港人優先（由張漢賢等人於2013年4月成立，由「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分裂出來）、港人自決，藍色起義（由陳梓進等人成立，成員多曾是「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骨幹，但其後因與張漢賢等人分歧而分裂出來）、香港獨立黨、香港新世代、香港精神、香港獨立聯盟、香港建國軍團、香港國、香港民主共和國政府、香港獨立運動、香港開國。
	（三）歸英派，主張香港應交由英國管治：全民支持香港回歸英國、萬人要求英國恢復香港主權。
	（四）大粵派，主張與廣東甚至廣西等粵人地區，組成大粵人王國——大粵民國。

時期	組織
本土浪潮（三波）(續上)	（五）本土優先派的「區隔本土派」，主張香港事由香港人自決，照顧香港本土利益，反對中共企圖同化香港，主張「政策區隔」，但沒有主張「族群切割」；沒有明顯的獨立 / 自治信念或長遠信念不明顯，可說是「政治現實派」：人民力量（2011年1月成立，由前綫、普羅政治學苑、選民力量、香港泛藍等團體組成，但香港泛藍與普羅政治學苑先後退出，而由陳偉業在2013年6月成立的「進步民主連線」其後加入；骨幹有陳偉業、陳志全、袁彌明、甄燊港、劉嘉鴻等人）、香港本土（由范國威、毛孟靜、譚凱邦等人成立）、調理農務蘭花系（於2012年下半年成立，骨幹有馬健賢、莊明堅等人）、香港本土優先運動、香港抵抗運動、衞港革新、本土居民愛香港。
	（六）本上優先派的「切割本土派」，主張香港事由香港人自決，照顧香港本土利益，反對中共企圖同化香港；提出「政策區隔」，也強調「族群切割」；沒有明顯的獨立/自治信念或長遠信念不明顯，可說是「政治現實派」：熱血公民（2012年初由黃洋達等人成立）、普羅政治學苑（由黃毓民成立，曾是「人民力量」成員組織）、香港本土力量（由十數位活躍於香港高登討論區的網民於2011年2月下旬，因為反對當年的財政預算案把6,000元也有意派給非永久香港居民而成立，其主張為「為香港人發聲，捍衞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權益，抵禦文化清洗」）、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在2012年10月，由外號「金金大師」的梁金成等人成立，由關注水貨客滋擾問題，發展到關注自由行過多等問題）、反赤化反殖民（由梁金成與天河明人等網民組成）、香港人主場、本土青年行動、香港旗飄揚、大香港主義。
	（七）廣東話派，守護香港文化，尤其是香港語言的母語廣東話：港語學、港人講雅語、香港語文運動（英文簡稱HKLM）、學生哥齊反普教中（由一班中學生於2014年2月成立，反對政府計劃推行全港學校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為中文科授課語言的政策）。

時期	組織
本土浪潮（三波）（續上）	（八）行動派，就香港本土的出路，成員沒有統一思想，但主張反建制、反不公、反霸權，也主張參與抗爭行動：香港V煞團、公義同盟。
介乎保育浪潮（二波）與本土浪潮（三波）之間，為進步民主派，但沒有清晰是大中華主義或大香港主義思維定義	學民思潮——由黃之鋒等中學生於2011年5月成立，反對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策，認為背後有為中共宣傳與洗腦之嫌，害怕國民教育成為中國大陸的「愛國教育」翻版；知名成員包括黃之鋒、周庭、黎民洛、劉貳龍等人。
	保衞香港自由聯盟——簡稱保自聯，由韓連山、黎則奮、何芝君、曾健成等人成立。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2012年7月成立，由一班反對政府「國民教育」推行的家長與學者成立，知名成員有陳惜姿、姚冠東、張韻琪、方保僑等。
	廿一世紀少年——由David Chu、林朗彥、黃莉莉等前學民思潮成員在脫離學民思潮後，於2014年年中成立的年青人組織。
	環保組織：長春社、綠色和平、綠色力量、地球之友、綠色行動、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及全球化監察。
	新民主同盟——由范國威、關永業、梁里、任啟邦、丘文俊、鍾錦麟、張國強、容溟舟、陳竟明等前民主黨成員，因不滿民主黨支持政府2012年政改方案，而於2010年10月成立的政治組織。
	香港泛藍組織，即親國民黨的香港政治組織——神州青年服務社（1977年成立，於2010年代曾加入政團人民力量，知名成員包括梁漢華、林偉棠、謝義方、陳志宏等）、民主陣線（由麥業成、謝開秋、廖任等元朗與天水圍地區人士於2003年成立）、港九工團聯合會（1948年成立，但近年已在社運舞台不大活躍）。
	其他：漫畫刁民（由尊子與張萬有等漫畫家成立，爭取民主公義）、同志公民、女同學社（爭取同性戀者平權）、香港社會關注組、公民起動組織、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家長公民。

第五章・傳統民主派的危機

由民主回歸派在第一波回歸民運浪潮起，已經在香港民主力量佔主導位置的傳統民主派，近年位置不斷受威脅，例子包括民主回歸派第一大黨的民主黨在選舉中，不論議席與票數不斷下降，以立法會選舉為最佳例子。由 1995 年立法局有 19 席，到 1998 與 2000 年的立法會皆有 13 席，到 2004 年的立法會有 9 席，到 2008 年的立法會得 8 席，到 2012 年立法會餘下 6 席。在十七年間，民主黨的得票率由大約 42% 跌到大約 13%。除了新興民主政黨在部份民主派支持者心中，更值得信賴之外，也是因為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傳統民主派，因在思維與手法上，追不上部份民主派支持者的改變，而面對「日落西山」的危機。

香港沒有民主的原因

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為了減低管治成本與減低反抗聲音等因素，先後讓不少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南非、新西蘭、澳洲等，轉為「自治領」，然後擁有強大治權的自治領，大多隨後也獨立起來。

根據英國爆出的絕密檔案 FCO40/327，原屬外交部的報告和書

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共為免英國也把香港變成自治領，然後出現香港獨立情況，已表明反對把香港變成自治領或成立自治政府，否則便會出兵解放香港。在韓戰等陰影下，英國政府為免出現開戰情況，也擱置了讓香港變成自治領的政策。

為免香港成為自治領，中共認為香港不可實行民主，否則便是再搞「獨立的政治實體」。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八、九十年代，李柱銘等民主派爭取香港民主，會被中共一些聲音說為搞「港獨」、搞「獨立的政治實體」。而現在有本土派追求「城邦自治」等，更踩中了中共的底線。其次，辛亥革命期間，與推翻北洋軍閥時代，基於殖民地之利，香港也作為革命思想宣傳基地或成為革命英烈逃避追捕的地方；加上中國內戰，大量國民黨士兵逃往英治香港，中共害怕香港一來秉承革命基地傳統，二來怕在香港的國民黨人士把香港變成為「反共基地」，也主張透過不同手段去對付香港的國民黨人士，因此更不希望給予香港民主，令國民黨人士在香港有掌政機會。

英國政府為免得罪中共政府，在英治香港時期也多番拒絕香港人要求香港有民主的訴求，只是給予較大的自由度、較健全的法治

系統與少量的民主體制。所以到現在，香港人一直要為爭取建立民主政制而奮鬥。

談判路線成效甚微

傳統民主派認為，面對擁有強大國力與軍隊的中共，加上香港並無武裝力量，根本不可能透過革命去爭取民主，也不可能透過抗爭為主導的方法令中共妥協，所以只有「投其所好」，以談判為主導路線，透過一次又一次談判，去逐步逐步為香港爭取民主。這就是「沒有談判，哪有改變」路線。

由於中共擁有權力強勢，所以不易與中共「硬碰硬」，否則談判便觸礁，連少少的讓步也爭取不到。因此，主張談判路線的傳統民主派，在與中共談判時，由於先天欠缺平等的談判籌碼，所以常出現兩個情況。一是在談判時，為了達到一些成果，所以不會堅持底線，會作出讓步，但一旦讓步太深，便會被視為出賣了原則理念。例如 2010 年，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來換取增加五席「超級區議員」的「進步」（有意見批評此非進步，因為功能組別議席還維持在一半比例，而大多功能組別議席只由少數人選出，選票等值

嚴重不均等，新增五席只是加多了功能組別選民人數而已），就算政府不承諾在將來取消功能組別、不承諾將來特首普選會在低提名門檻下實行、不在下屆區議會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民主黨都肯「讓步」支持方案，被部份民主派支持者視為出爾反爾、不守承諾、出賣原則；更因沒有先得到其他民主派盟友的同意便支持政改方案，又不肯押後政改表決時間，被部份民主派支持者視為阻礙了抗爭力量的聚焦，因此也令民主黨與部份民主派關係跌至新低點，出現後來有政團「狙擊」民主黨、要求「票債票償」的情況。

又或者，為求中共願意展開談判，而一開始把目標降低。例如在爭取 2017 年特首選舉方案，由於「明知」中共不會給一些民主成份較高的提名方案放行，例如公民提名、公民推薦、間選提名委員會等，只提出會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改革提名委員會方案，甚至改變提名委員會內「四大界別」平均分佈的格局。例如湯家驊方案、十八學者方案、以陳方安生為首的「香港 2020」所提的政改方案，全是如此。但這些方案和建制派的大同小異，甚至論民主成份，建制派組織「幫港出聲」的何濼生方案，其民主成份也比湯家驊方案、陳方安生為首的「香港 2020」所提的政改方案，也要高，

非常諷刺。

例如戴耀廷在 2014 年 2 月 12 日曾經撰文《開天殺價 VS 明碼實價》，也是如此思維，認為如果民主派叫價「太高」，雖則理念純正，但脫離政治現實，隨時令中共連談判的機會也不肯「賜予」。當然，進步民主派批評戴耀廷不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談判技巧；有批評更指，「公民提名」雖然叫價高，但卻是明碼實價，反而沒有公民提名的叫價，也因隨時讓步，而令所得甚低，也可以是「開天殺價」。

進步民主派會認為，即使在叫價中讓步，中共也未必肯讓步，為何一開始不先努力抗爭，嘗試透過不同抗爭方法去逼令中共讓步；當最後多種方法也無法成功，才在叫價上讓步也不遲。而且中共一向缺乏誠信，為何還指望中共會信守談判後的諾言？為何如斯信任中共往後不施詐？為何中共劣迹斑斑下，還要信任對方，甚至指望對方會「自我完善」、「自我改善」？他們是專制統治的最大既得利益一群，基於人性貪念，他們會「自我完善」、「自我改善」嗎？

每當有民主派人士，說甚麼等中共「自我完善」，然後被動

地等中共把民主「賜予」香港，而不是主動透過抗爭去給予中共壓力，去令中共讓步，筆者會不禁問：

當中共大力打擊 88 直選，你等它信它；

當中共大力打擊 95 直選，你等它信它；

當撰寫《基本法》時缺乏港人參與，你等它信它；

當劉山青被捕，你等它信它；

當 89六四 發生，你等它信它；

當魯平痛斥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你等它信它；

當中共取消直通車，你等它信它；

當中共成立臨立會，你等它信它；

當臨立會還原惡法，你等它信它；

當委任區議員制度重生，你等它信它；

當特區政府繞過終審法院提呈人大釋法，你等它信它；

當鍾庭耀被打壓，你等它信它；

當政府要為廿三條立法，連白紙草案也不肯，你等它信它；

當大班與毓民等名嘴被逼封咪，你等它信它；

當港台節目《頭條新聞》被針對，你等它信它；

當中共以政治人才不足而拖延普選，你等它信它；

當人大釋法否決 07/08 雙普選，你等它信它；

當中共由《基本法》三部曲僭建到甚麼五部曲去拖延普選，你等它信它；

當政府拘捕社運人士馮炳德，你等它信它；

當警員深夜所謂探訪陳巧文家長，你等它信它；

當港台被打壓，你等它信它；

當政府一直不肯取消功能組別，你等它信它；

當五區公投不斷被打壓，你等它信它；

當政府否決 2012 雙普選，你等它信它；

當中聯辦繞過特區政府與民主黨達成政改協議，你等它信它；

當政府強搶民主女神像，你等它信它；

當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你等它信它；

當陳玉峰被低調通緝，你等它信它；

當 DBC 事件發生，你等它信它；

當種票事件不斷出現，你等它信它；

當 HKTV 事件發生，你等它信它；

當異見傳媒相繼被攻擊，你等它信它；

當中資要杯葛異見傳媒，你等它信它；

當溫和傳媒也被打壓，你等它信它；

當傳媒不斷自我審查和河蟹，你等它信它；

當公民提名甚至政黨提名也不能，你等它信它；

當僭建甚麼愛國愛港標準，你等它信它；

到今時今日你還等它信它，幻想專權政府會突然自動頓悟覺醒，幻想不積極抗爭就能令對方妥協讓步，究竟你是可悲還是可笑？

欺世盜名的陳方安生

除了叫價不進取，被部份民主派支持者，尤其進步民主派支持者，視為懦弱與保守外；當在談判中，為了少許成果甚至是沒有實效的「表面成果」，而違反承諾的過份讓步，也會失去部份支持者的信任，甚至有被出賣感覺。除了「突然」支持 2012 政改方案的民主黨與民協是經典例子外，陳方安生也是另一經典例子。

曾幾何時，因政見與董建華不合，而拒絕在第二屆特區政府中

留任政務司司長一職的陳方安生，在「郭亞女事件」光芒下，被稱為「香港良心」，被視為香港民主女神之一。可惜在 2014 年的是否堅持公民提名爭議，陳方安生可算是一鋪清袋。

2013 年 12 月 20 日，陳方安生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會為了爭取「公民提名」而參與 2014 年 1 月 1 日的「元旦遊行」。可是在元旦遊行不久後，陳方安生領導的「香港 2020」所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但沒有公民提名，就連公民推薦、間選提名委員會，也沒有，更謊稱 2020 方案中，提名委員會約三分一成員是由三百多萬選民直選出來，所以已算「間接公民提名」。可惜這分明是詭辯，這分明是指鹿為馬。因為親共紅人譚惠珠也稱，2012 年的提名委員會也是「間接公民提名」，因為當中的直選立法會議員與直選區議員，也是由三百多萬選民直選出來。堂堂一個「香港良心」陳方安生，為求方案得到認同，竟然也學了建制派的語言偽術，怎不令人失望。

而且在 2014 年 5 月 6 日，「和平佔中」首次就普選方案選出三個入圍 6 月「電子公投」的方案投票前，陳方安生竟指堅持「公民提名」者乃「激進」勢力，並說不希望「和平佔中」被「激進」

勢力捆綁。可是，當年 2005 年，陳方安生參與港島區立法會選舉，便是透過「公民提名」的方法而成為候選人。為何她當年參選立法會，「公民提名」不激進，但到 2014 年卻變成「激進」訴求？包括反對堅持公民提名的湯家驊，他參選區議會與立法會也是透過「公民提名」的方法而成為候選人，為何到了特首提名，公民提名訴求會忽然變成「激進」？

這當然不是陳方安生或湯家驊心底裏認為公民提名是激進，因為此方法在區議會與立法會也行之已久；而是她們二人明白到，中共在 2017 年特首提名方法，是容不下公民提名，勉強堅持，隨時徒勞無功，為何不現實點，一早放棄公民提名，而盡量在提名委員會內爭取較大的民主成份呢？因為這是中共訂下的框架，而她們二人認為民間的抗爭力量不足以令中共讓步。

這固然是對抗爭力量與參與抗爭人民的不信任，所以有聲音批評他們，竟然不多信任抗爭力量，為何還參與標榜公民抗命的「和平佔中」？這不是矛盾嗎？而且，即使想「務實地」透過談判爭取，也不應用上「語言偽術」與「忽然變臉」的方法去企圖為自己的方案和路線爭取支持。

更令進步民主派支持者失望的是，當陳方安生的 2020 方案、湯家驊方案，在「和平佔中」初選中低票落敗，分別只得 43 票與 17 票，但當選的三個含有「公民提名」方案，分別有 452 票、708 票、1142 票，是別人十分一也沒有時，陳方安生與湯家驊也忽然「反面」，說選舉是「篩選」、「不民主」、不能充份反映民意，以及令不欲與中共對抗之市民拒之門外，完全給人一副「賴地硬」、「輸打贏要」的賴皮感覺。因為選舉前，她們並沒有這樣提出意見，而且「和平佔中」初選乃開放給全港市民，且每票的票值均等，只要認同「和平佔中」行動，便可投票，但很難說是「篩選」，因為在 6 月 22 日的「電子公投」也只是呼籲認同「和平佔中」行動的人投票，最多只可說兩場選舉是多此一舉，可省略其一。而且，不欲與中共對抗之市民根本不會參加「和平佔中」這類公民抗命行動。再者，相比其他當選方案的提倡者，例如學聯與學民思潮，他們的成員是不斷開街站去宣傳和拉票，投票日也不斷拉票，相反陳方安生他們卻十分「懶惰」，不但沒有拉票，連投票日自己也不去投票，不落敗才奇怪。難道世上有「不勞而獲」與「守株待兔」的事情？

這也說明，如果只靠「政治光環」而缺乏毅力及道理去說服人，即使天皇老子也沒有勝出道理。

其實當陳方安生多次譴責立法會內衝擊與拉布等行為是「不正確」、「不尊重議會」、「不尊重官員」，卻忘記由於立法會制度缺陷，令少數商界財團聲音能透過不公平制度設計，去長期凌駕多數聲音，令到民意與政策方向被扭曲，令到部份非既得利益集團的聲音被長期打壓，才惡性循環地逼一些議員使用拉布與衝擊等較激烈手法，就像當年台灣的「萬年國會」（註1）一樣。雖然不需認同這些手段，但作為一個民主派標誌，最少也應明白有民主中人使用這些手段的「無奈性」。陳方安生這些言論一早已與進步民主派支持者距離越遠。

在不少人心中，所有學者和政客提倡公民提名以外的方案，包括甚麼湯家驊方案、陳方安生方案、陳弘毅方案、十八學者方案……甚麼公民推薦，甚麼擴大提名委員民主成份，甚麼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甚麼間接公民提名，都是掩耳盜鈴、取巧投機、挂的是羊頭，賣的是狗肉；因為人們要的是公民提名，人們要的是公民權得到保障。這些方案只是變質和變種的公民提名，只有公民驅殼，

而沒有公民權之靈魂。就像人們去餐廳點一個沙爹牛肉公仔麵，你給甚麼雙腸公仔麵、沙爹牛生麵等等，全是貨不對辦、貨不對題，簡單來說，就是騙人，是「你呃人，你講大話」的行為。

當政客學者組織甚麼公民推薦，甚麼明碼實價談判，甚麼混合方案，其實就和建制派的循序漸進，民主程序一樣，只是為掩蓋真相是何等醜陋的幻像，是引導人誤會的謊言，使人們誤以為這些方案或路線都符合民主、都能捍衛公民權，結果忘掉了自己應有的權利的真實模樣，忘掉了去保護和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可見，不論是民主派還是建制派，只要有份製造幻像，就有份摧毀香港的民主人權。這令人想起了哲學家齊澤克一句說話：「幻像隱瞞了真相的恐怖。」（註2）

功利的傳統民主派

傳統民主派由於以談判為主導路線，認為民意便是談判籌碼，而民意反映在選票上，所以傳統民主派常常不敢嘗試作出一些可能會失去選票的「破格」手法，例如拉布、街頭抗爭、議會衝擊，在不能保證得到更多選票時，「惰性」地不敢嘗試創新抗爭手段，怕

會失票。例如民主黨與民協當年不參與變相五區公投、傳統民主派多次不肯參與拉布等，都被進步民主派批評為不思進取。

這種想法當然能理解，但當一切以「選票」作為量度標準，以及可以在談判時為「取悅」強權政府而放棄原則或底線的讓步，除了給人為了成果而放棄原則乃「本末倒置」外，凡事以「選票」作為量度標準，久而久之，會給人覺得「功利」的感覺，乃眷戀議席才這樣；縱使出發點並非這樣，但很多時便給人這種觀感。

尤其當為了選票，而譴責進步民主派一些抗爭行為，例如民主黨曾譴責 2011 年 9 月 1 日衝入科學館的社運人士；民主黨與公民黨曾譴責立法會衝擊行為；民主黨在 2014 年 5 月支持「剪布」；民主黨與公民黨在 2014 年 5 月聲言考慮支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去阻止議員衝擊行為，卻忘記這卻變相使一個制度有「先天缺陷」的不公義議會，進一步削弱議員已經「所剩無幾」的監察與制衡政府的權力，令專制政府可以更專橫！白白變成了削弱異見聲音能被公平反映的幫兇。

太着緊選票，令到有時傳統民主派在選舉時，如果有進步民主派一起較量，會出現進退失據情況。常常見到民主黨等，在有其

他民主派名單一起參與的區議會選舉，總說「不要浪費選票，要集中投票給民主黨」、「投票給勝算較高的民主黨，不要分票給其他民主派團隊，否則乃浪費選票」；例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在 2014 年 3 月的海怡西補選，便叫人「集中票投民主黨，不要浪費選票」，因為當時還有進步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參選。最後，民主黨候選人單仲偕的得票比人民力量袁彌明低，當有不同民主派候選團隊，民主黨在區議會得票會是民主派中最高的神話正式被打破，也證明傳統民主派要反思為何出現被新興民主派追上的情況，是否思維與手法開始廣被民主派支持者唾棄？

而「浪費選票」論，也是嚴重缺乏民主常識，因為選票並不會因抉擇如何而出現浪費情況。選舉其中一項主要功能就是反映民意。只要你認為某個候選人最能代表你，或最合心水，就投給該候選人；如果沒候選人合心水，就可以投白票或不投票。得票率同投票率，就是反映該候選人及其代表的聲音的認受性。選舉結果可以反映各大聲音有幾多民意授權，從而影響當選者的施政方針。所以根本沒有選票是浪費的，縱使你支持的候選人落敗。如果選舉只計席位贏輸而忽略民意反映，那是連選舉真意都未清楚！

那次海怡西補選的政治意義重大，是因為兩位民主陣營的候選人皆是空降，地區成績不多，民主派選民只能從兩位的政治路線立場上取捨，變成了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決。所以那次也是守舊民主派（政改立場較保守，爭取手法較溫和）與進步民主派（政改立場較進取，爭取手法較冒進）的對決；也是類中華（擁抱中國民主夢為先，支持新移民福利）與類本土（對港中融合抱強烈存疑態度，高舉陸路入境稅牌）的對決。當然，何俊仁艷照門、馮煒光背棄選民（把民主黨在該區的地區成績一次過清袋）、單仲偕被指不夠勤力，也令民主黨流失選票；而新民黨之贏，除了建制派選民支持外，也因新民黨在當區已扎根數年，而其候選人也搬入了該區以示扎根決心，黨的地區成績不錯，再加上上次黨友只輸十二票的同情分，對着兩位空降對手，過半數而當選是正常。

有民意基礎才能談判

相反，新興的二波與三波民運浪潮人士，所有談判必須要有民意基礎、民意支持、民意授權才有談判籌碼。因此，要獲得人民支持，必須站在道德高地、堅守理念和原則，因為這樣才有道德感

召。當本身原則有道德性，再加上能感召人民的抗爭手法，以及用激烈手法吸引人民焦點而明白其訴求，所以難免要創新與有時製造悲壯性去吸引支持。這便是「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手法要足以威嚇強權政府令其肯坐下來談判，之後要靠原則與手法的道德感召去爭取民意授權，去獲得談判籌碼，才有機會爭取到目標。因此爭取支持對象，乃應人民為先，而非像傳統民主派那樣，一開始便過份為強權政府「着想」；更絕不能為了談判而放棄底線和原則，因為說服不了別人，可靠包裝與宣傳技巧改進再嘗試，而非要為了「說服」別人而放棄底線和原則，否則，進步民主派只視這為「未爭取，先投降；未堅持，先讓步；未抗爭，先跪低」。

當然，傳統民主派批評這種思維過於理想化，只懂站在道德高地而不懂「談判技巧的藝術」。

團結也有底線

常有聲音指，民主派為求擴大力量，必須「團結」，而團結抗爭力量，也一向是社運主流手法之一。例如高山大會、真普選聯盟、人民力量整合「票債票償」力量、社民連整合左翼力量等。當

手法有異，但目標相同，可以整合。但問題是，如果原則底線也不一樣，甚至相差甚大，勉強整合也只是「一時團結」，在貌合神離下，分裂乃遲早之事。正如水和油是「溝不埋」的，勉強「溝埋」就等於兩個有殺父之仇的家庭互定婚約，肯定遲早出事。

就正如在「真普選聯盟」，一些成員例如湯家驊、莫乃光、郭榮鏗等不主張爭取公民提名；民主黨認為公民提名非必不可缺；人民力量與社民連等認為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根本大家的原則雖同為爭取「真普選」，但底線實在相差太遠，分裂乃遲早事。必須底線原則相同，即使細節與路線手法有分歧，也能整合與團結；否則，只是為「團結而團結」，不會長久，因為要政團必須為了「團結」而放棄底線，也是強人所難。正如周星馳名句「冇理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同樣地「冇底線，同禽獸有咩分別」！正如一個非常好色的男子，他縱使十分喜歡美女，但底線是不能「勾二嫂」，要「朋友妻不可窺」，否則，如果這個好色男子，因為喜歡美女，連朋友妻也可以淫慾，那和禽獸有分別嗎？

所以，追求團結，也必須底線原則相同才能，否則只是奢求而已。

重奪普選權
倒梁爭民主
10/F
漢陽苑
HAN-YANG WON

在 2014 年台灣學生的反服貿運動，香港不少政界人士也去了台灣給當地學生打氣，包括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與時事評論員李慧玲。到場考察的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在接受訪問時說：「參與集會人士與警察都很克制，沒有挑釁，學生甚至會嗌咪說警察只是緊守崗位，要多謝他們。」她指出，香港的警察與示威者的互信有限，難像台灣般。她也說：「至於香港的激進民主派，會在運動中攻擊其他泛民，而台灣的社運人士很團結，大家為了達到同一目的，會尊重大會的領導。」

追求團結當然是好，因為個人與力量分散往往事倍功半。但基於同一標準，立法會拉布與衝擊行為，為何包括陳淑莊在內的溫和泛民，要劃清界線，甚至冷嘲熱諷？為何別人為民主抗爭時，不說大家要團結，反而劃清界線與冷嘲熱諷？這些根本是路線立場與抗爭手法不同之爭議。如果路線立場不同，已不能為團結而團結，正如民主派不應去團結建制派。如果抗爭手法不同，有爭議甚至激辯乃正常，因社會是多元化的，但決不能人家爭議你的手法時，就說人不團結，說人攻擊，但卻無視自己也有同樣行為，卻以雙重標準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

在該次台灣之行，陳淑莊認為，不能照搬台灣的模式到香港，因為當地的立法院是民主的象徵，但香港立法會仍有一半是功能組別的議員。但她強調，不鼓勵也不否定佔領香港的立法會，但強調任何佔領行動都要有論述，而不是突然佔領，社會也要對議題有一定的討論。但這些言論正正是香港一些所謂傳統民主派領導嚴重缺乏抗爭或民主常識的例子。

陳淑莊表示台灣立法院乃民選，所以佔領合理；但香港立法會並非普選出來，所以不鼓勵佔領。但常理不是越不民主，才越需要反抗和佔領？難道香港立法會對民生民權保障好好，所以不需要激烈反抗？而且說甚麼「不能突然佔領」，但香港缺乏民主及人權被壓已經多年，現在還叫「突然」？這和建制派常說「普選不能一步到位」的邏輯有何分別？

那次陳淑莊走去鼓勵台灣學生，曾走入立法院與學生握手兼影相，之後還在她的 Facebook 戶口張貼出來。但引人詬病的是，為何對於香港，她會說出「不鼓勵也不否定佔領香港的立法會」的語言偽術？怕影響選票？同一時間，她做議員時，又不拉布，又不衝擊，甚至曾和公民黨譴責立法會個別激進派議員的衝擊行為，對香

港被政治檢控的社運人士，又不見陳淑莊力撐與影相，這又怎不令人失望？難道台灣衝擊者就是英雄？香港衝擊者就是暴徒或太過衝動？

當言行與理念相同，走去台灣，乃是聲援；但當言行是雙重標準，走去台灣，還要自 post 照片，就是抽水！

而另一位一起到台灣聲援太陽花學運的李慧玲，也犯上毛病。2014 年 6 月 13 日，立法會大樓外反對政府與新界東北議案前期撥款的示威者，因財委會主席無理限制議員發言時間與提案次數，發動衝擊，包括有衝門行為。事後時事評論員李慧玲批評有示威者戴面具衝門的行為，更指戴面具與口罩的衝擊者「不知是人還是鬼」，其拍檔更指他們「另有用心」。李的批評被指有「雙重標準」，因為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同樣有台灣學生衝擊立法院、毀壞立法院公物、戴面具與口罩衝擊，以及佔領議會廳令議會長達一星期無法運作，但李慧玲反而親身到台灣稱讚台灣示威人士、拍照「打卡」。反觀香港的衝擊立法會，連議會廳也進不去，無法阻止議會運作，論程度，與台灣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卻反而被李慧玲斥責，可見其評論充滿着盲點。戴面具與口罩，是為了免被上司與親友認出，以及避免政府認出而可能影響家人安危。

底線不同而分裂

底線不同不但不能團結，更會分裂，因為沒有團結基礎。所以多次所謂「泛民分裂」，便是緣於底線不同，本來底線不同、手法路線不同，也可以各有各做，但由於要爭取人民支持，包括民主派支持者支持，不同民主派互相爭辯在所難免，當擦槍走火，雙方出現「感情裂痕」，甚至出現「私怨」，便由「互不合作」局面變成「分裂」局面，甚至抹黑對方的動機；例如進步民主派說民主黨「投共」，民主黨指進步民主派收了中共錢才會「狙擊」民主黨……

因底線不同而分裂的例子，包括民主黨於 2010 年支持政改方案、五區公投派與談判派的爭辯、「公民提名不可少」派與「公民提名並非不可少」派的爭辯（雖然部份「公民提名並非不可少」派的政團，例如民主黨也稱「支持公民提名」，但在沒有簽署學民思潮發起的《公民提名約章》與不堅持公民提名下，始終較難說服人們）、支持「和平佔中」與不信服「和平佔中」的爭辯（例如熱血公民與黃毓民等從頭開始已不信任佔中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民主黨雖然宣誓參與「和平佔中」，稱不怕犧牲，但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曾說：「不信佔中可以帶來普選，只能盡力而為。」）等等。

由分裂到抹黑

出現激烈爭辯便難免有怨氣，甚至久而久之便成冤家。當道理不夠講或怨氣過大時，難免出現猜疑對方動機與抹黑對方的情況。進步民主派除了一些聲音會指傳統民主派的談判路線乃愚蠢外，有些聲音則從動機猜疑，認為對方為了私人「着數」才願意大幅向強權政府讓步。這種動機論永遠會挑動對方神經，令雙方關係破裂。

而傳統民主派，也從動機論引伸對進步民主派一些指控，常見的有：

(1) 由於要互相爭取民主派支持者支持與選票，傳統民主派與進步民主派在路線、原則、底線出現分歧，必定會公開「駁火」，甚至火力不比批評共同敵人的建制派小。而由於進步民主派一向給人激進形象，因不論行為與言論也較「火爆」，而傳統民主派會認為對方對「同路人」也不手下留情，便會批評「激進派總是扯泛民後腿，鬥爭泛民還比鬥中共鬥建制派來得激烈的，他們首要的鬥爭目標不是中央或特區政府，而是泛民」。

進步民主派會反駁：

講鬥爭口號，進步民主派不少口號乃「打倒共產黨」、「推倒中共」、「反共抗共」；就訴求而言，堅持公民提名、推倒《基

本法》然後全民制憲，比溫和民主派更令中共難以釋懷；就行動而言，年復年抬棺材、衝擊中聯辦、衝擊來港的中共領導人，也比大多數溫和民主派更激烈地反共。

因此不論口號、訴求、行動，比傳統溫和民主派的反共程度更深，也來得更火爆激烈，所以當用同樣態度去批評傳統民主派時，便會令傳統民主派覺得他們「鬥爭泛民還比鬥中共鬥建制派來得激烈」。

而且進步民主派攻擊溫和泛民時，多是因溫和泛民有時立場與中共太類近才會這樣，例如反對拉布、反五區共投、不敢非公民提名不可，才攻擊之，是因大是大非立場不夠鮮明而變相維穩才攻擊之；即不管有心還是無意，當保守泛民變相幫了中共打壓降低激進民主聲音時（例如一起批評堅持公民提名聲音），進步泛民便會回擊之。那已充份說明，進步民主派視傳統民主派的一些行為變相做了中共維穩幫手，便會以攻擊中共之激烈程度與深度，來攻擊傳統民主派。因而會給人錯覺他們「首要的鬥爭目標不是中央或特區政府，而是泛民」。

⑵ 像劉慧卿、單仲偕曾說：「激進派是收中共錢去搞民主黨，他們令香港的民主運動舉步維艱。」

進步民主派會反駁：

第一，拖垮香港民主運動是激進派？那為何社民連未出現前、激進派聲勢未開始壯大前，在 2004 年七一後，不管六四還是七一等請願示威活動，人數與聲勢也大減？反之，社民連成立後、新的社運模式在天星皇后碼頭事件盛放後，不論之後的遊行示威，例如反高鐵、2009 年七一、2009 年六四、包圍政總、反國教、反再殖民反赤化、保育運動、聲援林老師等行動的聲勢或參與人數都比以往的行動多，而且大部份行動不是主流泛民所牽頭。甚至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也是增加的多。那憑甚麼說香港民主運動被激進派拖垮？

第二，若論拖垮，難道不是守舊民主派廿多三十年來手法因循、不思進取、抗爭永遠由上而下、過程行禮如儀、成效不彰所致？難道不是大量追求民主人民熱情，因為主流泛民年復年的抗爭方程式因循不變，且見不到實效，而遊行多是表態一下而已，卻無法達成目標，才令民主運動不斷走下坡？而議會內則例牌投票反對，然後因制度不公而無法改變現狀後，講甚麼：「今日係香港民主最黑暗一天」，年復年的最黑暗，但卻缺乏力量改變現狀，才令人民心淡從而令民主運動衰落？

難道主流泛民看不到，天星皇后反高鐵等衝擊配合理論型的

新社運模式，在幾年前如何令香港民主運動出現小陽春？雖然於議題上，例如推廣本土農業、保育觀塘、保衛馬屎埔等，有創新性，但當左翼新社運抗爭模式還是衝不破由上而下的結構，開始缺乏創新效果時，右翼的新抗爭模式為現在的民主與本土民生運動又帶來了新希望嗎？從光復旺角菜街、發酵中的「愛國愛黨運動」，這些沒領袖的自發式抗爭，只靠所謂網路上的散兵宣傳，但卻是網民不斷集思廣益成果，令運動不再公式化，不再由上而下，不再一成不變，而是創意無限、由下而上、主動發揮議題出擊，而不再是跟政府鼻子，等政府失誤才被動出擊、手段千變萬化而不再千篇一律、參與者也是領導者而不再需要有人帶領，不再需要只聽台上領導者指示，令運動不再是例行公事。這些成果，全是主流泛民看不起的所謂激進派支持者所為。加上本土派興起，令例如本土優先、反思自由行過多等議題上更令群眾感受到逼切性，令運動宣傳事半功倍，令上本民生議題走向新境界，這也是部份激進派行動所得的成果。那麼激進派是拖垮香港民主運動，還是令香港民主運動由衰落而帶來改變希望，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一些主流保守泛民常暗指或明示激進民主派是收中共錢。但若論進步民主派被中共收買，為何激進派要搞中共視為眼中

釘的五區公投、反對政改方案、拉布、堅持公民提名、反對解放軍擴大特權法；但偏偏，有些所謂主流泛民，和中共在這些議題立場上是相近甚至不謀而合。如果一定要有陰謀收錢論，誰的機會更大？而且這種陰謀誅心論，在缺乏證據和理據下提出，是極其不道德。

⑶「激進派太激進，不像從前按牌理出牌，不再在制度、法理層面跟對手相爭，而常訴諸於群眾力量。」

進步民主派會反駁：

第一，獨裁政府手段骯髒不是近年開始，早於幾十年前也是，看梁天偉慘劇、劉山青被囚已可知。與一個獨裁政府較量，只跟隨對方設計的缺陷制度去玩，必敗無疑，看香港民主運動多年來也成效不彰已知。所以不論議會內還是街頭上的抗爭，不能死跟對方設計路線，要出奇才能制勝，立法會內掟雞蛋便是一例。即使 03七一、反國教也是靠人多，靠人民堅持不斷包圍政總，靠群眾力量才能成事。但守舊的主流泛民，往往只當群眾是輔助而不是殺敵武器，因此多年的遊行請願才那麼公式化，不懂把群眾化成力量。只是當 03七一，才偶然明白群眾之重要性，從而迷信「人多便事成」。可是近來的「光復上水」、「佔領廣東道」、「佔領旺

角」，從港共中共反應可知，「創意」也是運動成功的要素。而DBC 與反國教就證明持續不斷堅持與不妥協的重要性。可是保守主流泛民沒有從這些事件吸收養份，反把自己的落伍與失敗諉過他人。

第二，如果民主派也有人不再在制度、法理層面跟對手相爭，這是因為對手已不同了！！回歸前的港英政府，還會跟你講制度講道理，因此還可在制度內就議題或政策商討、妥協，這是主流泛民多年來的慣常做法；但回歸後的土共政府，是不會跟你講制度講道理講法治，才使過往也有成效的商議妥協路線變得無甚成效，進步爭取派只好走更激更街頭的路線，這是因對手變了之故，不能再守舊因循，必須因時制宜，不能墨守成規。主流泛民不反省自身的手法與原則如何落伍，卻不斷諉過他人，那就大錯特錯了！

(4) 「『堅持公民提名』等主張會削弱『和平佔中』對溫和大眾的號召力，令參與的人減少。」

進步民主派會反駁：

大家可以不認同「堅持公民提名」的主張和行動，但「堅持公民提名」的團體與方案出現後，傳媒和市民就「和平佔中」的討論是多了還是少了？報道是多了還是少了？不同政改宣傳和討論是多

了還是少了？「堅持公民提名」的團體，例如學聯、學民思潮、佔中後援會等，不斷擺街站宣傳人民提名權利和佔中，是令（和平佔中）議題受到的關注是多了還是少了？ 而答案是多了，且把公民提名討論帶到更廣更深。

而且「堅持公民提名」能使市民意識到，類似佔中此類大型公民抗命運動，由於是化被動為主動的抗爭模式，不論從道德角度還是功利角度考慮，都應從爭取民權利益最大化出發，才能吸引更多市民認同、參與、授權。如果為了迎合一兩個不敢堅持公民提名優先但又缺乏動員力的所謂民主大黨派，令到大量支持公民提名的人民卻步參與佔中，那將會是得不償失。

簡單的說，不會有人因佔中是為追求公民提名而卻步，只會是人民因沒有公民提名而卻步，為何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明？佔中熱心人士應去說服一些所謂大黨去接受堅持公民提名優先，而不是去暗諷或斥責堅持公民提名的人士與團體。

(5) 「進步民主派」的手法太暴力，與傳統民主派的「和理非非」路線不同（由劉慧卿提出，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

進步民主派會反駁：

不管是街頭衝擊還是議會內衝擊，進步民主派的行為絕對不是暴力行為，因為：

⑴ 從不會威脅別人的人身安全，只是以出格的行為表達意見；

⑵ 抗議目標只是掌有實權的高官，從不會針對官員的家屬、執行任務的中低級公務員、不會禍及無辜市民。

既然不針對任何人的人身安全，也不會對無權者抗議，那如何暴力？如何不和平？

用積極的態度去嘗試不同的抗爭方法是非理性嗎？難道消極、惰性的行禮如儀式的表態和做騷，就代表理性？

語言間有粗口只能代表不禮貌、粗鄙，但可以因此而抹殺背後的意見訴求？如果不講粗口就等於正確，那麼獨裁政府的高官、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等人意見必定正確，那為何不與他們結盟合作？

以行為和有沒講粗口去作為抗爭正當性的量度單位，而不是從訴求與原則理念去量度，是膚淺、「不理性」的思維，因為這和「以貌取人」無甚分別。

⑹「進步民主派是為了搶選票而攻擊溫和民主派。」

進步民主派會反駁：

如果他們真是那麼功利，那麼着重選票，會在立法會內衝擊、會在街頭衝擊嗎？因為那些才是真正大量失去「選票」的行為，還同時要面對高舉「和理非非」的所謂民主同路人去攻擊他們的抗爭行為粗鄙不和諧；面對被「同路人」拖後腿的指責。

進步民主派與保守民主派衝突

近兩次的政改方案，都充份顯示傳統溫和保守民主派與新興進步激進民主派的衝突，皆因雙方從底線、抗爭路線、抗爭手法都差別甚大，但又要爭取人民支持，所以難免有過火的爭辯。從「和平佔中」與「公民提名」事件，可看出兩派的衝突。

2014 年春天，傳統泛民主派人士舉行了一個名為「雞蛋抗高牆絕食為普選」的行動，希望在 2017 年政改方案，能得到一個合符普及而平等、合符普選的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以絕食去顯示爭取之決心。雞蛋代表弱勢一方、代表爭取與抗爭一方；高牆代表強勢一方，代表權力一方。今次行動，就希望以絕食決志顯示鬥心，希望打動權力一方，也希望感召市民支持，一起爭取普選。

今次行動的搞手以民主黨與工黨為主導，總共有十七名人士參

與絕食，包括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張國柱，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胡志偉，工黨成員林祖明、傷健人士葉榮、郭紹傑，民主黨成員林卓廷、尹兆堅等。是次行動初時表明「無限期絕食」，而且會有接力行動，即輪替行動。

「無限期絕食」，即不設時限，每位參加者盡量挑戰個人極限，按身體狀況與能力去盡量在最長時間不進食。而接力行動，意指當十七位人士完成絕食行動後，會有另一批人士參與，是謂之接力，而非當初外界誤會，每人絕食一定時數，例如數小時或數十小時後，由別人輪替。因為從前那種按時限輪替的所謂絕食方法，在以往中多數以此形式進行，一直為人所詬病，因為這乃在一個限期內「禁食」，而非真正絕食，道德力與感召力也大大欠奉。因此，今次行動表明「無限期絕食」，就是希望以正視聽，表明與過往有很大分別，乃有進步的做法。

最初，也有不少評論看淡是次絕食，認為縱使可以喝一些流質飲料去補充營養，例如汽水那些，但估計那些絕食者，不過數天便會因頂不住而投降。雖然初期，何俊仁與何秀蘭等，只是三四天便退出或投降了，但到最後，竟然有三位參與者絕食了十七天，共三百六十八個小時，包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民主黨成員尹

FOR
UNIVERSAL
SUFFRAGE
雞蛋抗高牆
絕食為普選
簽名撐普選
請簽佔中意向書

兆堅、工黨成員郭紹傑，令不少人跌眼鏡，也令不少人佩服，縱使後來有人質疑是否有「偷食」，以及指責胡志偉在絕食期間常常回家過夜；但參與絕食人士都堅稱並沒有偷食，還指在沒有證據下指責絕食者「偷食」，是可惡的人格謀殺行為。但部份進步民主派人士還是指絕食過程中常回家，令行動行為欠缺透明度，對講求高道德感召的絕食行為，這樣常常回家睡覺過夜，足以使到當事人的行動道德感召性大打折扣。正等於，如果聲言支持留守包圍政府，但不現身，只在家中，怎能令人信服？

是次行動，在香港金融中心地帶中環的匯豐銀行外面紮營舉行，期間成功感召了超過一百名市民簽署「佔領中環」意向書，表明將會參與「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去爭取普選。也有一千一百多名市民簽署，支持香港「真普選聯盟」（一個由大部份香港民主黨派組成的聯盟）提出的政改方案「三軌方案」，即可以透過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提名委員會提名，去成為行政長官參選人。雖然香港民主派多年來的絕食行動與決心，與台灣那邊的施明德、施明正那種難以相比，但今次從收集了的簽名來看，今次行動的成績算是不錯。

可是，是次絕食行動卻暴露了香港民主派之分裂與分歧，尤其是進步民主派與保守民主派的分裂與分歧。

香港民主派之分裂

民主黨與工黨被視為傳統的保守民主派，因為他們在民主派中，被視為不論在政治改革步伐，以及抗爭手段，也較為傳統守舊與保守，不及新興的民主黨派那麼創新與大膽。尤其在 2010 年，民主黨竟然在中聯辦與中共談判後，妥協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更一度被不少民主派支持者視為出賣民主派支持者與市民的行為，引來進步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在選舉中狙擊民主黨，當中不少進步民主派支持者也支持狙擊民主黨行動，這從 2011 年區議會選舉到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到 2013 和 2014 年的區議會補選，那些打着狙擊民主黨旗號的政黨，得票從幾個巴仙升到 15%，可以看到民主派支持者也出現對立情況，使到香港的民主派出現極大裂痕。當然此裂痕源於 2010 年，民主黨沒有參與、甚至不主張「五區公投」運動，而主張透過談判與妥協去爭取普選。而當年參不參與、主不主張「五區公投」運動，成為進步民主派與保守民主派的辨別。前者支持「五區公投」這些被中央政府視為「違憲違法」的爭取民主行

動，後者則不多主張大型街頭運動，反而主張以談判及妥協為主導爭取方法，務求在中央政府設下的框架下，爭取得多少便是多少。

而今次「雞蛋抗高牆　絕食為普選」行動，引發了兩派的爭拗。

首先，進步民主派支持者認為以民主黨為首的保守民主派，多年來只懂不斷重複舊有且效用不大的抗爭方式，包括遊行示威、簽名集會、絕食等行動，認為對方不思進取，只是沉醉於固有方程式。所以也認為今次絕食行動也無甚效用。而保守民主派認為，從沒行動或手法能一步到位，要透過不斷行動才能不斷感召市民支持。

於是，有些進步民主派人士，例如反水貨客、北區關注組的梁金成，在絕食者旁邊「打邊爐」，即是火鍋，去嘲笑保守民主派之手法守舊。更有人主張所謂「暴食爭普選」，即是不斷暴飲暴食去爭取普選，當然不是來真的，只是諷刺保守民主派在手法上之守舊。

這樣一來，自然挑起罵戰，尤其是那班主張「打邊爐」，原本決定了在 4 月 6 日舉行，但當晚因天雨關係而取消，引來還在現場的絕食者反擊與嘲笑，譏諷他們遇到少少困難便退縮。而那些「暴食爭普選」的人，由於不是來真的，不是每小時不停進食的真正暴

食，而只是食飯時大吃大喝而已，也得不到大量認同與支持。保守民主派認為那些諷刺行為無助爭取民主，而且只是破壞別人行動的感召力；民主黨林卓廷更直指如斯諷刺行為是「涼薄」。

但進步民主派認為，保守民主派受諷刺後還是不思進取，多年來對所有創新或激烈的抗爭手段，包括議會內「掟東西」、大罵官員、拉布去阻撓政府方案，在議會外包圍政府機構、留守、衝擊、佔領馬路去阻塞交通等手段，保守民主派一直拒絕參與，甚至劃清界線與譴責有關行為破壞社會安寧、超越法律。今次罵戰互有攻守，卻暴露了兩派民主派的鴻溝與不和，不少人認為此乃香港民主之隱憂，乃大削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而且如果論「涼薄」，絕不及當有進步民主派成員因為抗爭而面臨司法審訊，甚至入獄，但不論在底線與原則的要求也較低的民主黨，卻多次沒有證據下指責有進步民主派政團是「收共產黨錢去搞民主黨」。自從 2012 年立法會選舉以來，民主黨個別成員多次聲稱人民力量等激進派，是收了中共的利益金錢輸送，受命令去故意分裂香港的民主派，進行破壞行為。當然，以上所有指控，在沒有證據下，疑點歸於被告，但確實反映了香港的保守與進步民主派，一些人分裂地步已到了水火難容，而在沒有拿出證據下，提出人格謀殺的指控，更是不負責行

為。進步民主派也認為，社運人士一邊因抗爭而被定罪，但另一邊傳統民主派人士卻接受專制政府頒的「河蟹」勳章，這些行為才是真正的「涼薄」。

民主派的分裂原因

按常理，對於別人絕食，縱使是不同陣營，也不會挖苦對方。今次這樣大的爭拗，是基於對對方的不信任。

進步民主派不信任保守民主派，源於民主黨與民協在 2010 年，在政府方案沒有符合普選聯等民主派提倡的三大底線下（立即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特首選舉提名門檻要低、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突然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令到有被出賣之感覺，認為保守民主派為了得到些少的所謂進步或利益，竟然不顧所提出的原則底線，走去支持政府政改方案，同時放棄透過大型街頭運動去逼政府妥協，滿足民主派提出的原則底線。這樣，民主黨為首的保守民主派失去了部份民主派支持者的信任，甚至大為不滿，認為是違反誠信的行為。

2014年的政改討論，部份民主派，包括進步民主派主張「公民提名」。因為人民本身除了平等的投票權，也應該有平等的提名

權。公民直接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除了捍衛了人民應有的公民權之外，還是最低程度的篩選方案，比任何方案都具民主程度。很可惜，民主黨、工黨、民協，雖然也表示支持公民提名，但不肯簽署學民思潮提出的公民提名約章，不肯主張爭取公民提名優先，令到部份民主派支持者對他們進一步不信任與不滿。而當中，較年輕的民主派支持者，例如學聯、學民思潮等，對一些主流民主派議員不肯承諾「公民提名不可少」的意向，也令雙方鴻溝日深。

而且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卻出現兩個版本。進步民主派認為三軌方案缺一不可，但民主黨卻聲稱並非缺一不可，即表示，最後如果政府提出方案，可能缺少三軌方案的其中一軌或兩軌，民主黨也有機會支持。那即是表示，三軌方案並非缺一不可，那麼三軌方案的意義大減。進步民主派支持者認為，如果沒有了公民提名，甚至連政黨提名也沒有，那麼政改方案的篩選程度，必然是高的，甚至未必符合普選的國際標準。那麼，民主派與建制派的面目便分別不大，雙方的差別便不大，怎會不引起一些民主派支持者的詬病與不滿？

民主黨的政改底線乃泛民主派人士在方案下可以入閘成為候選人便可，此已引起不少民主派人士不滿。因為泛民主派可入閘，不代表篩選程度不低，也不代表政改方案必定合符普選原則。

正因為這樣，加上 2010 年的前科，進步民主派對民主黨等保守民主派完全失去信任，認為對方縱使絕食，縱使目前還聲稱支持三軌方案，但最後在投票時，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出賣了市民對他們的信任。

況且，到目前，民主黨等泛民，都不肯承諾將來在政改方案的投票取態，與「和平佔中」的電子公投結果綑綁在一起，令將來隨時出現，佔中訴求與主導參與政黨的投票意向不同，更令人難以完全放心政黨們是真心支持佔領中環，尤其是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曾公開表示，不認為佔中能帶來實效、帶來普選，這就使人們懷疑，高調參與佔中對某些政客來說，只是「形象工程」多於堅定地相信要透過公民抗命等反抗形式才能帶來民主普選與改變不公現狀。人們怕，不承諾將來在政改方案的投票取態，與「和平佔中」的電子公投結果綑綁在一起，會出現政黨過橋抽板的情況。

⑴ 不參與《公民提名》約章簽署，不表明爭取民主成份最高的公民提名方案優先，不表明「公民提名不可少」；

⑵ 就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不承諾「缺一不可」，反而多次表示「非缺一不可」，以便將來在政改方案投票時能更靈活；

⑶ 不肯承諾將來在政改方案的投票取態，與「和平佔中」的電

子公投結果綑綁在一起，令將來隨時出現，佔中訴求與主導參與政黨的投票意向不同的情況；

這三大因素，就是為甚麼即使民主黨為首的保守民主派，又高調宣誓參與佔中，又為普選絕食，也不能給予一些民主派支持者信任與信心，怕自己會再被出賣，怕會繼 2010 年後，再被「賣豬仔」。

而且，絕食與佔領中環這些行動，需要有很高的道德感召性，因為這些全是犧牲自己健康與自由的高道德情操抗爭手法，但如果原則與追求的目標，欠缺高道德性，只會得到別人的同情，而非認同。這也是為何民主派兩派今次出現重大分歧，令香港民主力量難於團結。

泛民主派上海行成為中共的裝飾品

今次「雞蛋抗高牆 絕食爭普選」行動，選擇在 4 月 13 日結束，是配合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到上海與中央官員傾談政改回來的時間。而到上海的中央官員，則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不過今次上海之行，只流於兩方各自表述，沒有達成共識。

部份香港民主派，例如民主黨的黃碧雲，認為中央最少展示了溝通誠意；但也有部份民主派，認為中央只是單方面「教訓」香港的民主派。這使香港民主派今次成為中共表示溝通誠意的裝飾品而已。而且穿着有關六四衣服的社民連梁國雄不能入境、已被視為「較聽話」的公民黨郭榮鏗未能進入交通大學法學院、沒有參與參觀行程的議員不能與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面，都被視為中央欠缺真誠與香港民主派溝通，只是包裝而已，假裝自己願意聆聽異見，但實際上是絕不會採納異見。

表明愛共產黨才可以做特首

在上海的政改座談會上，李飛表明，特首選舉必須有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旨在降低政治對抗、降低憲制危機、降低民粹主義共三項風險，乃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此乃被認為是提名委員會是確保當選特首者符合中共心目中的「愛國愛港」標準，乃保持官商利益集團的固有利益與權力，延續地產霸權與政治霸權。暗示參選人必須有「機構提名」、「全票制」、「過半數委員同意」，才能成為候選人。

而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鄒平學明目張膽表明，愛國愛黨必須愛

黨：「愛國愛黨即不能與中央對抗，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最低要求。不愛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不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只愛歷史文化意義上那個中國，是不符合要求的。」這樣明言要愛中國共產黨才算是愛國愛港，基於文革與六四等事件，是頗難為大部份對政治有熱誠的香港人所接受。這樣，對中共的所謂溝通誠意，大大減低了。

六四衫突顯了民主派的不團結

今次上海行有一段插曲，就是人稱「長毛」的梁國雄議員，在上海入境時穿着一件印有「平反六四」字眼的衫，以及隨身物品有寫着關於六四字眼的道具，被當局拒絕入境。此事突顯了中港兩地的表達自由與言論自由之分別外，本來不是甚麼大件事。但之後隨行香港民主派議員的對應，反映了香港民主派陣營之分裂與不團結，甚至一些民主派支持者也批評事後處理方法。

十四位民主派議員，事前曾協商，說如果一旦任何人出事，就十四個人一起去，十四個人一起走。怎知長毛梁國雄被拒入境，當時沒有任何民主派人士聲援，或企圖阻撓海關人員搜查貴賓的隨身物件，更沒有兑現協商，沒有人即時抗議，拒絕入境或跟長毛梁國

雄一起折返香港。而民主黨的何俊仁更反其道而行，認為難得到了上海，不要輕易離去，反而勸告其他民主派議員留低，反映了民主派議員缺乏行動之團結與一致性。

第二天，只有工黨的何秀蘭與張國柱提早返港，以示不滿與抗議，其他泛民議員照樣留底。引起部份民主派支持者不滿的是，何秀蘭叫在香港接機的支持者，穿着有關六四的衣服聲援。但問題是，香港一向容許人民自由穿着衣服，包括可穿着六四衣服，只是內地不容許，那麼在香港穿着六四衣服接機的意義在那裏？於是，較激進的支持者認為，這就成為笑話。他們認為這個有點做騷成份，與梁國雄相比，相形見拙。

公民黨則表示，除了政改座談會，不出席其他參觀活動以示抗議。但公民黨成員湯家驊與郭榮鏗照樣出席其他參觀活動，湯家驊更學了董建華般，說甚麼：「離開容易，留低很難。」要把握與中央溝通機會。首先，這反映了公民黨的黨紀出現了重大問題，也缺乏行動一致性與團結性。其次，較激進的支持者認為，不參與參觀活動，算哪門子的抗議？這和清朝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態度有何分別？時事評論員林忌認為，這些乃是不痕不癢的抗議，連決心也看不出來，遑論令中央

政府就範。

公共專業聯盟的梁繼昌，其實也帶了有關要求平反六四或悼念六四事件的衣服。但他沒有選擇像梁國雄那樣，在入境時穿着，沒有在街上或公共場合上穿着，也沒有在內地的傳媒朋友及官員面前展示衣服，而只是在沒有人的時候，偷偷拉開外套拉鏈，展示有關衣服給同行人士，然後拍照片後，上傳到社交網站而已。但穿六四衣服意義在於，挑戰內地受限制的表達自由與言論自由，這樣不公開展示衣服，只流於自己觀看拍照留念，很難成為讓民主派激進支持者所接受與擁護的抗爭，令到出現反效果，認為這只是流於讓自己高興的無聊行為而已，甚至有網台評論員說這做法有點可笑和可悲。

更甚是，一些進步民主派主要人物，例如人民力量的譚香文，寫文章控訴這個民主派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多次有意無意不敢提出中共對香港普選的死穴「公民提名」。譚香文的文章寫到，首先，他大力為湯家驊那個沒有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背書。其次，他在會計界做的政改方案調查，當最大群眾，約六成受訪者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梁繼昌只是表示最多群眾，大約六成八受訪者，不

反對提名委員會提名方法，但大前提是提名委員會由普選產生，卻不交代多人支持公民提名，被部份界別選民，例如前會計界議員譚香文，指責他故意壓低公民提名聲音。而且，實際上那六成八人，當中有七成多認為提名委員會要普選才可支持，即近一半的受訪者是支持普選提名委員會。可是，梁繼昌還繼續支持沒有公民提名與提名委員會非完全普選產生的方案，實在辜負了業界聲音。所以這引來一些激進支持者反問，在普選立場如此建制派化的一個所謂泛民議員，又怎會做出一些令中共政府憤慨的事？所以連展示六四衣服也如此偷偷摸摸？

這種態度、應對與處理手法，只會給人不堪的感覺。這樣不團結，這樣分裂，這樣「內鬥在行，外鬥外行」的差劣表現，中央政府會怕嗎？會就範嗎？

而上海行不久，中共官員開始接觸個別民主派議員。自 2010 年民主黨在中聯辦與中共達成「政改協議」後，為免背負「出賣民主」之名，民主派議員對不公開地與中共代表在中聯辦會面已經可免則免。可是上海行不久，教協的民主派議員葉建源，竟然跟中共代表在中聯辦傾談政改問題，而事前卻沒有公佈，只是事後才開記

召交代此事。這種事後交代的方法，與梁振英被揭發住址有僭建後，才「開誠佈公」；或丈夫被發現外出「偷食」後才向妻子「坦白承認」有何分別？這樣「見過鬼也不怕黑」的處事方法，難免令人失望。

香港民主派的分裂與懦弱，正是香港抗爭力度不足，令到民主進程多年來無甚進步的主因之一。

公民提名「元素」爭議

上海行與民主黨、工黨絕食引發的爭議，與 2014 年 5 月 6 日「和平佔中」政改方案後，公民提名派與非公民提名派的爭辯，是 2017 政改引發出的香港民主派分裂事件。但其實，早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和平佔中」首次電子投票，已經引發進步民主派與傳統民主派的激烈爭辯。

和平佔中的首個全民投票在 2014 年元旦舉行，可惜只得 六萬二千多人參與，難免令人有點失望。

不過細看入面三條問題，實有「阿媽係女人」之感，難怪參與人數較低，以及結果多麼一面倒。如果問題爭議較大，如問「應否

為佔中而再推動五區公投 / 辭職公投」、「公民提名優先或列為大原則」，相信將會有不同結果。

先不論是否值得為「阿媽係女人」的調查而動用如此人力物力，但如果不表明是和平佔中主辦，筆者還會以為此調查是政府或民建聯所主辦，因為問題內容鵪鶉得令人發笑。

民主權威們，你們感到羞恥麼？

甚麼「公民提名元素」而不敢直接寫公民提名，根本是在偷換概念或文過飾非。含有 0.001% 已算包含元素，相信高達斌也能想出 N 個包含「公民提名元素」但又不民主的方案。這個「公民提名元素」堪比建制派常說的：「功能組別也含有民主成份，應予保留」。元素 VS 成份，兩邊在鬥荒謬麼？

這令筆者想起一段往事：有次去日本餐廳，朋友 order 了餐牌上的「豬軟骨湯拉麵」。誰知碗麵來到時，連一粒豬軟骨都冇，朋友便問餐廳伙記：「係咪落漏豬軟骨？」誰知對方答：「係豬軟骨『湯』拉麵，所以冇豬軟骨的。」朋友當時以為那餐廳「呃人」，猶如梁振英被唐英年指責「你呃人」般。但是經過元旦投票，朋友

恍然大悟，明白碗麵已有「豬軟骨元素」，乃貨真價實，是錯怪好人。朋友更開玩笑說：「下次你老婆叫你買 LV，你大可去羅湖城買山寨版 LV，然後大聲話已含有『LV 元素』，又省錢又誠實。至於公民提名同公民提名元素咪一 Q 樣，你細個冇聽過『差不多先生』的故事咩？」可見，公民提名「元素」是甚麼一回事的鬧劇。

建制派講「民主成份」不足為奇，因為人家厚顏無恥多年，但作為民主派也搞甚麼「公民提名元素」，就連工聯會黃國健都話問題「太虛」，那麼你們感到慚愧麼？爭取了民主幾十年，還是弄出如此貨色，學建制派搞語言偽術，你們感到羞恥麼？

難怪香港民主鬥士 icon 之一的馮檢基會講出甚麼「佔中係佔中三子的，這是基本常識」的「基本常識」，或甚麼「學民思潮應考慮如何配合佔中運動」等說話，好一副民主權威的模樣，可惜連所有爭取民主、公權運動，包括佔中，都應是由下而上，都是屬於全體爭取民主的人民之基本常識也搞不懂。

香港不少多年爭取民主的所謂權威們，就常犯上以為自己高高在上，總是權威，運動非由他們主導不成，運動乃上而下的錯誤和心態。正因如此，凡有對他們領導的運動內裏任何策略和內容，有任何質疑、異見、反建議甚至監察，總被視為不合作、不配合甚至

是搞破壞，儘管對方的立心也是想令運動搞得更好。

因此，你搞甚麼「夾實佔中」、甚麼佔中後援會、常大叫甚麼公民提名、甚麼辭職公投，你就是搞搞震。這些民主權威們，可能因為「領導」了太久而忘記了公民運動，應是由下而上、集思廣益、在有心同路人不斷監察和爭論，運動才能壯大成長。也許，權威們的心態，也反映了為何香港多年的民主運動，不是慘淡收場，就是虎頭蛇尾。

就是他媽的害怕公民提名

在一些民主權威心中，「公民提名」四隻字仿似魔鬼般恐怖，因為隨時會令到中共不肯「紆尊降貴」來與香港泛民談判，那就如何為港人爭取民主進步？所以談判派總是要盡量壓抑之或避免之。先不論公民提名比任何其他提名方法在民權上的正統性和道德性也要強，更容易號召群眾支持；也不論提名委員會只是製造一班「小數特權利益階級」去剝奪大眾原本應有的公權，就像鄧小平的「讓小數人先富起來」般，「讓少數人先特權起來」般荒謬。從宣傳層面上，寧願要市民花數百小時也未必搞得清是如何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也不願集中宣傳在區議會和立法會提名，已經行之有效的公民

提名，是多麼可笑。再從談判策略層面看，縱使你只想「泛民入閘」，卻不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一開始便露出底牌、不懂叫價技巧，面對老狐狸中共，你的「泛民入閘」底線想通過，就像老江一句說話：「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在市民眼中，不論是建制派想盡霸入閘名單，或部份泛民只想「泛民入閘」，都只是私利。如果一個全民運動，以私利作呼召，會多人參與麼？即使真是以私利為號召，但你自己卻戀棧權位，不肯身先士卒，先來個「辭職公投」，卻叫市民甘冒坐牢之代價，去為你的私利「佔中」，你當人民「傻的嗎」？

佔中三子推動佔中，的確為民主運動帶來一股風潮，帶來一股思潮，為香港民主史寫下重要一頁。但如果不想運動最後爛尾收場，枉費推動人的心血和浪費了人民的熱誠；或希望把佔中運動發揮更大功效，請所有民主權威們，在策略上要進取、在原則上要純正、在信念上要道德；否則如果還沉醉於自視權威、排斥異見，再玩甚麼語言偽術，那就真的要「早抖」了，或對家也早抖了。你早抖是因徒勞無功，對家早抖是因你們根本搔不着他們的癢處，不足為患。

要打破專制政府訂下的框架

爭取民主的人，不應還在中共定下的框架內遊走，而是應該想盡辦法怎去打破不合理的框架，例如中共多次以「法律」因素去限制與拖延香港的民主進程，但實質卻是害怕香港有真正民主會「鼓勵」中國大陸民主發展而影響中共一黨專政地位，乃「政治」因素。可是香港不少民主派便真在「法律」因素框架內取爭取民主理據，而非在「政治」因素框架內爭取理據，哪有不敗之理？

可惜傳統民主派只懂把目光與行動，限死在先天不公的框架內，只懂跟着中共可以隨時任意演繹的遊戲規則玩，結果只是變成了對方劇本內，其中一些為其塗脂粉抹的角色，卻以為自己已成功爭取了甚麼「偉大成就」（張文光說法），說出甚麼「要不是我們推動政改，咩咩咩之流又怎會當選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曾在 NOW 電視時事節目指，如果不是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節目內另一位嘉賓范國威又怎會當選立法會議員），真是愚不可及！！（註3）

這種「有政改，范國威之流點入到立法會！」與「有中共照顧，你們香港人一早完蛋了！」的思維不就是同出一轍嗎？

不敢參與五區公投、不敢公民提名不可少、不敢辭職公投，只懂跟對方節拍去支持政改、在提名委員會組成上糾纏、去上海面

聖，不就是被對方玩到原地不停轉卻不自知的事例麼？ 多年來只識跟着中共設計的極不公平、任意演繹、缺陷處處的所謂「遊戲規則」框架去設計方案、去傾、去跪、去妥協、去見步行步，當然多年來都被人玩到不停原地轉圈啦！之後天真到以為自己好「務實」，甚至原地轉就以為「有突破」、「成功爭取」，真是又可悲又可笑！

嘗試打破專制政府訂下的先天不公框架去抗爭，未來還可能有生機，否則，繼續下去，情況不容樂觀。傳統民主派的支持者不斷流失，卻缺乏足夠反省與改善，正正說明民主派之敗，敗於不思進取，不斷後退！

註釋：

(1) 就「萬年國會」內容，可參考管行健《你不知道的台灣》一書。

(2) 可參考劉世衡著作《難以擺脫的幻像纏繞——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

(3) 可參考《主場新聞》報道：「劉慧卿：冇政改，范國威之流點入到立法會」。

第六章・新媒體運動

近年有一個名詞興起，叫「新媒體」。不少人稱「新媒體」為「網上傳媒」，即「非主流傳媒」。「網上傳媒」泛指網台、網上文章、博客、網絡報紙等等，因為並非是報章、雜誌、電台、電視等「主流傳媒」，所以也被稱為「非主流傳媒」。

媒體革命

「新媒體」雖然包含「網上傳媒」，但是「新媒體」並非百分百等同「網上傳媒」。因為「新媒體」不但是一些新形式、新科技的傳播媒介，也是有別於傳統主流傳媒的新傳播手法。「新媒體」也是一場不論從手法、思維、傳播形式上改變傳統舊有主流媒體的「運動」，甚至可以說是一場嘗試顛覆舊有傳媒一向運作模式的「媒體革命」。

舊媒體 VS 新媒體

新的非主流傳媒與舊的主流傳媒，不論手法、思維、傳播形式都有很大差別，其中可分數個明顯區別：

（一）垂直單向式導向 VS 橫向多向式互動

舊媒體：

舊有的傳統主流傳媒，傳播知識的方式，是從上而下的單向式宣傳。即媒體聘請一些「權威」撰稿員去寫文章，把知識教授給讀者；或聘請一些「權威」評論員去主持節目，把他們的個人意見與觀點陳述給聽眾。又或聘請記者，從「中立」或媒體立場角度把時事新聞報道給大家。

不論節目主持、記者、文章作者，多是一些被媒體認定的「權威」，再把他們的立場與觀點告訴大家。好像報章、雜誌，就是由記者、作者去把該媒體希望報道的新聞和評論陳述給讀者，乃一個單向式導向傳播知識手法。而電台的「個人意見」節目，也是這個傳播知識方式。基本上是媒體寫甚麼和講甚麼，受眾就看甚麼和聽甚麼的單向傳播。

當然電台節目由於容許電話 phone-in，即俗稱的「烽煙」節目，聽眾可打電話與節目主持人傾談與分享意見，多了點互動，但受眾較少，因只限於打電話聽眾與節目主持人間的互動而已。而香

港電台的電視節目《城市論壇》，除了講者發表意見外，也讓少數台下觀眾發言表達意見，已算較多互動了。毛孟靜、香樹輝、謝志峰等先後任《城市論壇》主持。

六七事件後，港英政府為了疏導民怨，便在 1969 年於香港電台設立烽煙節目《電話訴心聲》，由民政主任接聽聽眾電話，讓官員與市民能夠「直接對話」，幫助政府了解民情，同時又可透過節目去宣傳政府觀點。《電話訴心聲》乃香港烽煙節目的鼻祖。

發展到七十年代，峰煙節目聘請傳媒人主持，因而也多了主持人的個人意見，可說是論政論時事為主，而聽眾打電話 phone-in 為輔。由歐陽義德主持的《太平山下漫步》便是此類節目的始祖，促成後來的香港電台早晨節目《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千禧年代》。由於選擇少與缺乏互動，此類時評烽煙節目的主持人便順理成章地成為輿論領導者。早期的李鑾輝、陳耀華，到中期的吳明林、梁家永，到後來加入的周融、吳志森等，便因主持之便而成為耳熟能詳的評論員。

在九十年代，商台也開辦早晨時事烽煙節目《風波裏的茶杯》，由鄭經翰與林旭華主持，人稱「大班」的鄭經翰，由於當時

聽眾甚廣，其意見深得不少人認同，九七回歸後，更被稱為「十點前特首」，足見在當時單向式傳播下，節目主持人的個人意見確對社會影響甚深。由於《風波裏的茶杯》風頭甚勁，新城電台邀得吳明林過檔，與蕭若元主持早晨時評烽煙節目《平息你的風波》，促成三台互鬥之局面。

除了早晨時段，黃昏時段的時評烽煙節目也影響甚廣。香港電台的《自由風自由 phone》（吳志森任主持時乃高峰期），以及由黃毓民主持的商台節目《政事有心人》也甚多聽眾。早在1993年亞洲電視製作的時評節目《龍門陣》，已聲名大噪的鄭經翰與黃毓民更是眾多時評主持人中，影響力最廣的，被稱為兩大「名嘴」。由於他們曾在 2003 年大力呼籲市民參與當年的七一遊行，有傳權貴因此不悅而導致「名嘴封咪事件」，二人都在該年七一遊行後不久，不是節目被腰斬便是不被商台續約。

除了電台節目，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議事論事》、《頭條新聞》、《鏗鏘集》，或 TVB 的《新聞透視》，ATV 的《時事追擊》、《把酒當歌》等，都是單向傳播式的新聞節目或時評節目。

在舊有傳統媒體，不論電台、電視、報章、雜誌，都是上而下

的單向傳播，甚至可以說是「崇拜權威的單向傳播」，受眾多是被動的接收「權威」發放的意見與訊息。

新媒體：

相對下，新媒體乃多向型互動傳播模式。有別於以往是受眾被動地接收訊息，接收文章作者與節目主持人的觀點，在新媒體還可以讓受眾主動地發放訊息，與作者、主持人，甚至其他讀者一起互動，一起討論，一起分享觀點，甚至互相辯論。在新媒體，文章作者與節目主持不是必然「權威」，是否權威全由受眾定奪，甚至可以即時挑戰主持人觀點。這種多向型互動傳播模式，令受眾由舊媒體只是被動地單向接收訊息，發展成多向地與別人互動，發揮自己的觀點，甚至啟發思維創立自己的論點與評述，不用人云亦云。

新媒體，例如網台節目，除了有烽煙在節目期間或之後，受眾可在 chat room、討論區立即發表意見互動，當然電台近年開設的「留言板」是先開了此風氣，但由網台發揚光大。而網上媒體文章，讀者更可即時留言發表己見，也有部份傳統媒體，例如《蘋果日報》、《雅虎新聞》等，容許讀者在網上版新聞留言。可見新媒

體確有督促舊媒體不斷進步以免被淘汰的威力。

網台節目更設有視頻，讓受眾除了聆聽聲音，也可以觀看視像，比電台純聲音更吸引，2000 年由蕭若元開設的《cyber 日報》，是網台節目的鼻祖，由蕭若元與黃毓民主持的節目《三獅會客室》更是網台評論和回應 chat room 留言節目的始祖。《cyber 日報》因曾派特約記者拍攝「叫雞實錄」，更與妓女懷疑「打真軍」曾引來全城哄動。不過，隨着科網股爆破，《cyber 日報》也因而消失。

到後來的「radio-45」、「radio-71」以及「人民網」的出現（全已關閉），網台才再次開始興起，這也因主流傳媒發生「名嘴封咪事件」而起。當然後來「香港人網」與「MyRadio」的出現及合併，更把網台風潮推到極點，影響力可與主流傳媒爭一日的長短，甚至令到電台時評烽煙節目走向下坡，影響力日漸式微。「香港人網」與「MyRadio」節目受眾更直逼甚至超越電台節目，蕭若元的《蕭鼓聲中》與《風也蕭蕭》，黃毓民的《毓民踩場》，潘紹聰的《恐怖在線》，更勝過很多電台節目收聽率。而《風也蕭蕭》、《毓民踩場》、《早朝天下》（黃洋達、林匡正、蘇浩主

持），更是當時「香港人網」與「MyRadio」合併期間，影響力甚深的時評節目。

即使是取代「香港人網」，於 2013 年開站的「謎米香港」（主要時政節目有蕭若元的《蕭遙遊》，和甄燊港與蘇浩的《國情揭露》、風格鬼馬生動，林匡正與 Henry 的《爆破地獄》、劉嘉鴻《隨意門》），和分家後的「MyRadio」（主要時政節目有黃毓民的《毓民踩場》、陳雲的《本土論壇》），「熱血時報」（主要時政節目有黃洋達與鄭松泰的《熱血政治》、與「MyRadio」聯播的《大香港早晨》），由鄭經翰主理的「D100」（主要時政節目有鄭經翰的《風波裏的茶杯》，其他節目有鄭家富與吳志森的《十級自由風》、林忌林非和倫爺的《維多利亞講》），也在目前網台界佔有主導位置。

網台另一特點，是除了政治節目，也會開一些非政治節目，但卻能最終吸引不少原本對政治不大關心的聽眾去聽政治節目甚至關心政治，再甚至支持創辦人支持的政治組織，此乃由於網台創辦人多是政治人，以前的「香港人網」（蕭若元創辦）到現在的「謎米香港」（蕭若元創辦）、「D100」（鄭經翰主導）、「熱血時報」

（黃洋達創辦）都有此特徵。

民間電台、溫和泛民主導的「OurTV」、「OurRadio」、Calvin 與夏薩特等人主理的「Ragazine」（主要節目有《網台大典》）、陶君行與索羅 B 主理的「香港花生」（主要節目有《大軍閱》）、姚冠東與鱷魚開辦的「低俗頻道」（主要時評節目有《現代豪俠傳》、《東評週》）、OnAirPower、OpenRadio、eetv、前「D100」義工 Kelvin Yu 成立的「IBHK」（得到前「D100」主持劉細良與探長等人支持），也是較有名且含有時政節目的網台。而《蘋果日報》在 2014 年也開始注重網上時評節目，例如邀得李慧玲到《蘋果日報》開咪，而《東方日報》則在 2013 年，再邀得黃毓民作出視頻時評節目。舊媒體的確受到新媒體的衝擊與鞭策。

網上文章方面，首先是博客文章形式，再到後來的網上文字媒體形式出現。在博客興起年代，林忌的「福佳與林忌」，一個諷刺時弊的博客、「無待堂」、「陳大文博客」、「無神論的巴別塔」、「庫斯克博客」等也是影響力大的香港時評博客，尤以最前者為甚。

網上文字媒體方面，2004 年由葉蔭聰與林靄雲創辦的「獨立

媒體」，開了網上評論文章與新聞報道混於一身的網站風潮。讓很多與主流媒體不同論調的文章與報道活躍於網上世界，讀者不比主流媒體少。而且更打破「迷信權威」的迷思，在網上博客或媒體，人人也可以成為新聞報道員或作者，不必先具有社會名氣才能寫文章。2012 年由容樂其成立的「輔仁媒體」，與同年由梁文道、蔡東豪、劉細良、宋漢生成立的「主場新聞」，2012 年由黃洋達成立的「熱血時報」，更與「獨立媒體」成為網上四大文字媒體。而 2013 年由游清源成立的「852 郵報」，和同年由星島集團創辦的「巴士的報」，也是不容忽視的網上文字媒體。當中，「獨立媒體」、「輔仁媒體」、「熱血時報」更因「本小」但影響力廣而成為佳話。其他網上文字媒體包括香港自治運動的「龍獅報」、學民思潮的「破折號」、高登仔的「膠登時報」、Facebook 專頁「香港不合作運動」、由曾焯文成立的「本土新聞」、已關閉的「城邦學社」等。

在網上世界，這種多向性互動的討論方式，也令部份傳統傳媒得到新生命。因在網上討論區，不少報章雜誌新聞，甚或電台電視節目便得到網民廣泛評論，其中「高登討論區」、「香

港討論區」、「Uwants 討論區」更影響力甚廣。高登「巴打」（brother）與「絲打」（sister）更創下不少高登潮文與潮語。高登潮文 / 小說（高登討論區成員寫的網上文章，甚至小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一路向西》更被拍成電影）、MK 文體（俗稱「MK 仔」或「MK 女」的基層打扮潮流青年所寫的「另類」文章，名句例如「你的拳頭和下體為我而硬，我的眼睛與下體為你而濕」、「當你在外面吃野鮑汁的時候，我也可以偷喝其他男人的豆漿」）、灶財書法（「九龍皇帝」曾灶財在街上牆上寫的毛筆字），更被稱為香港自家創立的「三大文體」，足見網上世界對政治、社會、文化之影響力如何深廣。

甚或一些 Facebook 專頁，例如「寰雨膠事錄」、「圖膠聞」等專頁，也會分享新聞，甚至討論組，讓大家一起互動，透過多向性討論去分享與建立思維與立場。

（二）手法多元化的新媒體

新媒體除了網上互動多向式傳播外，也有脫離網上世界，在「現實世界」運作的互動多向式傳播，而由保育浪潮社運開始發揮。

傳統民主派在以往，只是單向地透過派傳單、演講等方式宣傳政見，多是政治人物「講」，市民去「聽」，也是崇拜權威的單向式、上而下的施予「教導」模式。

但自從保育浪潮社運出現後，多了很多互動的宣傳形式，讓講者與受眾可以一起討論、互相刺激對方思維，甚至受眾與受眾間互相刺激思維。座談會、商討會便是好例子，「80 後社會大學」的座談會、「本土研究社」的座談會、黃洋達的「傾偈會」，甚至「和平佔中」的「商討日」等，便是以此模式運行。

此外，還會以小型展覽館和導賞團模式，去把主題與議題展現，然後受眾自行思考。關心社會與時事的油麻地活化廳，讓人思考土地與人關係的菜園村生活館及馬寶寶生活墟，是典型的社運人士創辦的小型展覽館。而菜園村導賞團、馬屎埔導賞團，則讓市民親身接觸香港新界農村，然後讓人反思發展與土地的關係等問題。這些互動的現實世界傳播，也是「新媒體」一種。

從保育浪潮起，也發展注重以文化推動社會運動，以藝術鼓勵社會力量的新傳播方法，也應視為「新媒體」一種。正如莫昭如所說：「商業有經濟力量，政府行使政治力量，文化界則擁有文化力

量。文化是促進草根民主的工具。」可見，善於利用藝術文化作媒體，也有利於啟發群眾思維與教育傳承。

音樂是其中一種文化藝術。保衞皇后碼頭時，由鄧小樺、陳減等文化人舉辦的「詩歌音樂會」、2010 年 11 月的「馬屎埔音樂會」、由 2009 年 9 月起，差不多每年也舉行的「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音樂會」、2010 年 7 月的「菜園村音樂會」、2009 年 9 月在時代廣場公共空間舉行的「高高興　唱低高鐵音樂會」、2013 年 5 月舉行的「全城承傳 • 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2014 年 6 月由「輔仁樂友社」主辦的六四「前英祭」等，都是以音樂會宣傳理念與啟動民智的好例子。

有音樂會，當然不少得歌曲與樂隊。2007 年一首《天星 • 遺情》，震撼人心，令人思考發展與保育的關係。

社運樂隊《黑鳥樂隊》，在千禧年代起的保育浪潮後繼有人，出現大量社運樂隊與音樂人。社運人士金珮偉（名曲有反映弱勢與被打婦女生活狀況的《誰說》）、AMK（名曲有《請讓我回家》）、My Little Airport（名曲有《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邊一個發明返工》）、神奇膠（名曲有《起勢維穩》、《一招

收你皮》）、音樂人 The Panacakes（名曲有《腦殘遊記》）、咖啡因公園（名曲有《人格障礙》）、音樂人怒人（名曲有《仆街人生》）、饒舌歌手 HEYO（名曲有《人民公僕》）、饒舌歌手 MastaMic（名曲有《禁歌》）、迷你噪音（名曲有《土地歸人民》）、Blaster（名曲有《失去的味道》）、VIIV 樂隊（名曲有《祭英烈》）、意色樓（名曲有《剎那快慰》）、秋紅（名曲有《圍住我》）、KOLOR（歌曲《鹿死》取名自「六四」諧音）等等。此外，一些學生與年輕人更組成街頭合唱團，把對社會的意見唱出來，例如「投訴合唱團」，與每年六四「報哀音」的《沒有製作》。

除了音樂，影片和微電影也是社運人士多向互動宣傳方式的一種熱門使用媒體，有點左翼電影大師差理 • 卓別靈與杜魯福的風範。麥海珊的影片《唱盤上的單行道》，讓人思考人與本土的關係、曾志雄的《旦日 一個夢》，憑片寄托人們堅持追求理想和反諷對政治冷感的「沉睡香港人」、2014 年 G.V.A.creative 創作的網上電影《香港將於 33 年後毀滅》、司徒夾帶製作的諷刺政府短片等，都是引發人們思考的影片作品。

此外，錄像，例如《SocRec 社會記錄頻道》常常記錄社運片

段、改圖、漫畫、照片也是新一代社運多運用的新媒體去宣傳理念與引發思考。

漫畫方面，左翼社運人林兆彬、雨林、調理農務蘭花系的雨林（另一位漫畫家）、四格漫畫大師 Cuson、爵爵港不停、Martin、TMAN COMIC、呀將、畫高登神獸卡的阿塗、阿雀、肉球不滿、貧友堆．一個墟、屎雕拔&膠粉、香城怪異錄、社漫、溫水劇場、阿平漫畫、Lady Kylie、90 後社會紀實、菜朝、門小雷、阿江等，全有前輩尊子、馬龍、草日、張萬有（曾主編香港四大漫畫《龍虎門》、《如來神掌》、《醉拳》、《中華英雄》）、牛佬（古惑仔系列）諷刺時弊之風。

改圖方面，朗思製作、郭家、香港重光、佔中冰室、熊圖製作、最 kai 拍檔、青民風號、D100、血濃於老味、醒下啦香港、香港大遊樂場、調理農務蘭花系的閹雞、熱血時報、正政唯識、惟工新聞、香港人醒覺等，也是網上流行的改圖單位。

雖然照片、錄像等方式，未必代表真相，又不又定令人更了解事實，皆因每人思考角度與理解力皆不同，但卻能引起人們追求事件真相與知識的好奇心和興趣。（註1）

（三）宣傳老闆意志 VS 宣傳政治理念

新舊媒體主要之別，乃新媒體是宣傳一群志同道合人士的政治或社運理念，

但舊媒體只是「為老闆服務」，要跟隨「老闆意志或喜好」。

舊媒體：

舊媒體雖然也標榜「編輯自主」，但很多時還是要跟從老闆意志，即「邊個出錢，就跟邊個的意志」，乃「資本家主導」，而「編輯自主」的空間有多大，還是視乎老闆給予多少空間。例如被譏為「中共黨報」的《文匯報》、《大公報》，其新聞評論或評論文章，不會見到支持香港民主派的報道或文章；在被視為常為民主派宣傳的《蘋果日報》，不會見到有文章或評論為中共或建制派「背書」；聲音較為「中間」的商業電台和《明報》、《信報》等，會很少見到有激進民主派或最保守的一群建制派聲音。最明顯例子，是 2005 年韓農到香港「反世貿」示威，清場後的各大報紙頭條，不論《蘋果日報》、《明報》、《文匯報》等，都是痛斥韓農「癱瘓灣仔」等類似標題，被左翼人士認為是資本家控制傳媒下，以「資

本主義」思維「抹黑」左翼抗爭活動；又或對曾蔭權種種缺乏深惡痛絕的《東方日報》，比其他傳媒更多報道「貪曾」種種缺失。

由於傳媒工作者是僱員，傳媒大股東是老闆，彼此是「從屬關係」，在市場機制下，因此由資本家的僱主主導旗下傳媒方向是正常之事，老闆給予的「編輯自主」空間有多大，則是老闆容許的範圍，否則超越老闆範圍，被炒或不被續約或文章被刪改的新聞便常出現（註2）。如果傳媒由政府控制或擁有，便視乎政府給予的「編輯自主」空間有多大，而通常民選政府給予的「編輯自主」空間較大，因為政府要向人民負責，所以政府擁有的傳媒即由人民擁有，如果政府不容許官媒為民發聲，到選舉時便要付上代價。反之，獨裁專權政府，由於缺乏選舉鞭策，所以較易走上要求官媒為政府說項或不能過份抨擊政府之路。例如中國大陸的傳媒以前常被評為「報喜不報憂」，縱使現在有改善，但也避談敏感政治話題或取向；在不少獨裁國家，例如朝鮮，傳媒更只是政府的喉舌，完全違反拉斯維訂下的傳媒三大天職：為民發聲、監察權貴、教育人類價值。

總之，誰對傳媒有權，便誰的意識形態話事，正如法國「後

建構主義」家 Michel Foucalt 的理論，權力控制「歷史、報道、知識」的話語權（註3）。在香港這個市場經濟社會，便常出現當超越老闆「容許」的「編輯自主」空間，傳媒人被炒、被停約或文章被擅自刪改的情況。

2003 年商台的「名嘴封咪」事件、2014 年 3 月，《信報》專欄作家陳嘉銘指《信報》編輯要求修改其批評長和系主席李嘉誠的文章《玩完香港，香港玩完》，否則會抽起文章、2014 年 3 月《信報》專欄作家練乙錚指其在 2013 年 11 月 7 日的文章《林煥記茶餐廳背後的六千頁解釋》，內容指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事件，除了北京干預還可能有高層涉貪，要求有關當局調查的一段，在不獲事前通知下，竟然被編輯刪掉，要「看報紙時才知道」、2013 年 9 月，《信報》的紀曉風專欄批評 TVB 在報道梁振英的手法向政府偏頗的內容，無故被抽起、2012 年 3 月特首選舉期間，被視為「高調挺梁振英」的《成報》私下刪改劉銳紹文章，把「質疑梁振英能力」變成「挺梁」文章、2012 年 4 月，《成報》專欄作家林匡正有關大陸維權人士陳光誠的文章，內容談到陳光誠「無故受到不合法的粗暴私刑對待」，「外國介入及施壓是保護人道，不應作譴責」，但在

大陸可以看到的網上版，文章無故被「開天窗」（即空白一片）、2012 年特首選舉期間，被視為「梁（振英）營」的劉迺強，收到被視為較親「唐（英年）營」的《信報》通知，「因題材敏感而終止其專欄」、前《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林和立，因指中共遊說一幫有錢人去支持無法穩定民心的董建華，被老闆郭鶴年直接罵他胡說八道，被調任副總編輯，實則「明升暗降」（註4）……這些都是脫離老闆容許「編輯自主空間」下場的例子。

新媒體：

新媒體則不同，由於大部份新媒體工作者只是義工或只收「象徵式」車馬費，新媒體老闆與工作者間只是同水平線的「合作關係」，而非「從屬關係」；只是一班「志同道合」或意見相近的人去合作，去宣傳理念。例如「本土研究社」和「80 後社會大學」，甚至「廿一世紀少年」，便常舉辦講座去宣傳他們相信的「人民自主」與「民主」理念；一班社運人士在油麻地活化廳透過藝術去宣傳爭取社會公義理念；一班主張思考土地與發展關係、推廣本地農業的社運人士，在菜園村生活館或馬屎埔生活墟去宣傳理念；民間

電台則是一班左翼社會份子，例如長毛梁國雄、Jovi、阿牛曾健成的宣傳左翼理念平台；以前的「香港人網」被視為黃毓民任主席時代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宣傳平台；「輔仁媒體」被指為本土社運人士文章集中地；「獨立媒體」被指為保育社運人士文章集中地；《熱血時報》被指是組織「熱血公民」宣傳平台；「MyRadio」開宗明義指理念是「本土、民主、反共」；「人力頻道」乃人民力量宣傳平台……可見到與舊媒體分別，在於舊媒體由「老闆意志」主導，新媒體乃共同宣傳彼此相信的理念。

不過，新媒體傳媒因是某政治組織平台，而部份政治組織高層與高層間有過節，有時被批評會出現為了打擊有過節的政治組織而「報道偏頗或疏忽」；例如《熱血時報》在 2014 年 5 月報道黃毓民與陳偉業有關上訴 2011 年 7 月 1 日被告「非法集結」的罪名事件，被指「故意」不報道陳偉業的名字。

但一些新媒體，雖然所用的手法較新，例如創立網台或網上報紙，但由於金錢投入甚多與媒體工作者受着正常薪酬，與老闆乃「從屬關係」，只是把以往報章或電台模式搬到網台與網上報章而已，並非「完全的新」，乃「舊瓶新酒」而已，因還是「資本主

導」/「老闆意志主導」。「D100」、「主場新聞」、「852 郵報」便是好例子，但由於這些媒體的主導人也是民主派支持者或人士，所以一般較易為網上人士所接受，皆因網上活躍者多為支持民主理念中人。

註釋：

(1) 可參考 Susan Sontag 關於照片與圖像對理解社會的著作 *On Photography* 及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2) 可參考 Edward Herman 與 Noam Chomsky 的合著 *Manufacturing Consent*，裏面談及傳媒只是財閥控制的維穩工具，因為傳媒為老闆意志服務。

(3) 可參考 Michel Foucalt 著作《性史》第一卷 *La volonté de savoir*，即《知識的意志》。

(4) 可參考台灣《自由時報》2013 年 1 月 2 日專題「中國滲透收購港媒染紅」中的《港媒赤化三部曲 / 掌控編採權逼走異聲》文章。

第七章・沉默的港人？沉睡的港豬？

「你醒一醒！到底點樣你先肯醒？！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冇晒辦法！……點解？！你唔可以離開我！你應我一聲好唔好？一切就好似一場夢。」這是經典香港電視劇《流氓大亨》最後一幕的對白，男主角方謹申（萬梓良飾演）對着牀邊昏迷多時的妻子宋楚翹（鄭裕玲飾演）的說話，希望用盡方法去刺激妻子蘇醒，最後以宋楚翹眼角流淚來結幕，相信如果在八十年代頭或之前出生的香港人，很多人會記得這幕。

情況就好像社運人士，多年來透過種種行動和文宣，希望叫醒身邊還未「覺醒」或「蘇醒」的市民，希望他們明白社會的困境，然後醒來一起努力去改善社會。多年來，成績不能說是超卓，甚至不太令人滿意，才導致不斷有已覺醒的社運人士求變求改革，造出第二波與第三波民運浪潮，渴望以不同方式嘗試叫醒更多人。

很多時候，未醒的人會被稱為「沉默的香港人」，認為他們是因為不知道有問題存在，或基於種種問題而不敢出來發聲，所以「沉默」；有些甚至稱為「沉睡的港豬」，認為不僅是沉默，還是在沉睡，像豬般常常熟睡，連理會身邊的社會大事也缺乏興趣。有時，當社會人士心灰意冷時，會聽到「沉默的香港人抵死的，自己

今民覺醒
種未來

不出來，縱容強權政府作惡，最後大家一齊受害」、「港豬唔醒，繼續縱容政府作惡，我哋不斷出來抗爭都冇咩用」等類似意氣之話，把社會困境其中一個原因歸咎很多市民不同心協力去改變不公，導致政府被縱容下而變本加厲，最後整個社會一起負擔後果。這就好像一支足球隊入面，如果只得一兩位球員努力踢球，而其他球員懶懶閒甚至不跑動，便要整隊球隊承擔落敗的結果。

不論慣用「沉默的港人」或「沉睡的港豬」去稱呼未醒的一群，在細心分析下，「沉默的港人」或「沉睡的港豬」又可分為數類：

（一）沉默者

沉默者是那些知道社會出現問題，例如沒有民主與公平制度下，社會衍生種種不公狀況、政府政策漏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等；但由於感受不到切身的壓逼感，認為未有「逼切」需要站出來；或都市人繁忙，連吃喝享樂去放鬆自己的時間也不夠，便寧願玩樂也不參與社運，甚至少理時政話題、不參與、不討論；或以「影響都唔係好大，有時間去玩下算」的心態面對社會問題，因為問題「未

殺到埋身」、「沒有切膚之痛」，當有天自己成為政策與制度缺陷的直接受害者，便會站出來，或最少為那件議題站出來。

一些也明知社會出現問題，但由於「怕事」、「怕有危險」，於是不站出來，只是心裏面支持出來抗爭的人，或最少不反對別人出來抗爭。他們可能是公務員或抗爭會影響自己「搵食」的人，於是把憤怒藏於心裏，只好默默支持別人代自己出來抗爭，甚至敬佩抗爭者。

「今日不站出來，明日站不出來」，很多時，總有人後悔遲了站出來或沒有站出來，導致社會問題惡化。也有些是對政團不信任，例如認為政黨「太功利」、「只係想保住份工，保住議員席位，而唔係真心為大家好」，要一些「去政治化」或「純潔」的團體，例如學民思潮呼籲，才肯站出來。這些沉默者，是社運人士首要爭取支持的一群。

（二）沉睡者

沉睡者指那些「不理會」時政，對時政話題沒有興趣的一群。他們感覺不到制度與社會出現問題，或問題影響到自身利益，寧願

關心另外話題，例如體育、娛樂等等，總之，就是不關心時政問題。

有些甚至認為時政問題只是「吵吵鬧鬧」，不明白社會乃由政治構建而成，因為不論制度、人事、政策，都是政治一部份，政治實乃影響每個人的「眾人之事」。由於認為政治乃吵吵鬧鬧，有人會說出「我討厭政治」這些說話，甚至可能覺得不理會時政話題是一件「很型」的事或很有「態度」，卻不知道或少去探索社會問題之根源和起因。

這可能與港英政府的「順民教育」和「愚民政策」有關，即不斷製造人民必須順應政府、政府施政不順是有人吵鬧和反對政府所造成，而這些「吵鬧」便是政治，所以少理為妙、政治爭拗導致經濟困局等等假像。但其實是倒轉因果，把人們不滿政府表現說成「吵鬧、搞事」、經濟不景氣持續是政府在龐大資源下也無力挽救所造成，並非因為有人反映不滿；再加上友好傳媒炒作，所以不少人受到影響。

所以有時會見到有人說「爭取民主把鬼咩！去投票把鬼咩！民主同投票可以當飯食咩！？」或類似言論。但人與禽獸的分別在

哪？禽獸只求溫飽，但人是有尊嚴的。如果只問「有冇飯食」，那和禽獸有分別嗎？除非那人是慘得連一口溫飽也難求的飢民，否則此類說話有點涼薄。

沉睡者也是社運人士爭取認同的一群，必須要讓對方認識到，時政與生活息息相關、社會由政治構成、現象由歷史構成等道理，才能進一步爭取認同。

（三）裝睡者

裝睡者好像調皮的小孩故意在父母面前裝睡，去逃避父母要求自己做功課與溫書的要求，但卻因「眼皮不斷在跳動」而被父母發現在裝睡，結果偷雞不成，反比父母責罵。

裝睡者某程度上知道社會因政治缺失而出現問題，但認為問題並非太嚴重或只是在「痲醉」自己，總以「事情仲未差到最壞地步」等說話來「安慰」自己。他們可能感到有心無力才這樣，或本身較冷漠，對社會公義興趣不大。例如會說自己情況不算最差，總有別人比自己差，說出「Well，你討厭香港的空氣污染？看看北京。你嫌香港塞車？看看北京。你擔心香港的食物不安全？看看北

京。相比遍地輻射的日本，強姦之國印度，睇韓劇會被槍斃的北韓，香港簡直是個天堂」等類似言論來安慰自己和逃避實況。

裝睡者認為根本無力改變社會，不信任群眾力量，認為參與社會只是徒勞無功。有時甚至會嘲笑社運人「浪費青春時間」、「無聊」等等。但他們也是社運者需要爭取認同的一群。

（四）真心膠

真心膠即真心相信社會很美好，或強權政府沒有私心，處處為民着想，只是政客「搞事」，社會才有問題，否則社會必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他們可能與社會實況脱節，或對社會問題認知不足，不知甚麼是因，甚麼是果。所以他們常常與社運人士唱反調，認為爭取民主的人是故意生事。「維園阿伯」、一些不理是非黑白但逢親政府者「必定是對的」的思維，就是真心膠例子。真心膠會說出「見到有人好激烈地反對某些事，或者從早到晚叫特首下台，我反而覺得：『嘩！使唔使呀？』……我想跟梁振英說句『加油』呀！他的壓力必然好大。先不要考慮他做每一個決定背後的原因，不要去 judge 他做得好不好，我真是好想跟他說一聲『加油』，因為這個角色實在很難做。我不想再對他施加壓力，想給他一份鼓

勵」等類似言論。雖然難以改變思維，但社運中人要加倍努力去爭取真心膠認同，令他們「去膠化」。

（五）助紂為虐

助紂為虐之徒，指那些為了金錢、權力、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生意商機，而不斷為極權政府種種惡行說好話的人，甚至為極權政府賣命去幹些損害大眾應有權利之事。他們通常是不公義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即透過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等不公制度而獲取利益的所謂「勝利者」。他們也可以是為了錢，而為「既得利益集團」賣名的文宣「打手」或「五毛」（即為了錢而職業地為做了惡行的龐大勢力去做事的人）。

他們常以「民主講求包容，大家要包容我們，不應批評我們」等「民主」藉口作擋箭牌。不同聲音當然要包容，但故意顛倒是非黑白、支持殘殺獨裁行為的反人道言論與行為，不但不應包容，反而要指責與直斥其非。例如說甚麼「六四冇死人」等言論，便是故意顛倒是非黑白、支持殘殺獨裁行為的反人道言論的好例子。對着助紂為虐之徒，不應包容，應指責其非，因為「包容」即是在縱容他們繼續作惡去傷天害理。

後語

挫敗的三十年？

香港乃華洋雜處同時，又能衍生自我特色。三個不同民運浪潮，就像奶茶、咖啡、鴛鴦，或茶樓、餐廳、茶餐廳的關係，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甚至是兩者結合而成。

不論是最早的民主回歸派，千禧年代興起的保育派，還是一零年代產生的本土派，大家目標與方向大同小異，都是在爭取民主、期望建設美好社會。但因經驗與經歷不同，在身份認同、原則取態、底線取捨、抗爭手法，都存着相異處，各適其適。

辛亥革命之成功，民主革命力量與北洋軍閥反清各有貢獻，令滿清皇朝倒台。香港也一樣，多年的抗爭運動，也難以定奪哪種力量或浪潮才是最有效，或互為相助，或互為鞭策。百花齊放、遍地開花，抗爭才有曙光。

1984 年到今天，已經三十年，香港民主運動已經最少渡過了三十個寒暑，如果連同民生社運抗爭，掠過的光陰還遠多於此數。

可是，「民主夢」還是遙遙無期，即連丁點曙光也看不

到，即連將來的「普選」是真是假、平等的投票權與提名權能否保障、監察議會還要被利益小圈子集團繼續憑藉制度缺陷而壟斷多久也不知，確實令人沮喪。香港的民主命運，甚至經濟命脈，還是控制在強權政府之手。命運，本來可以自己掌握；不過，不知是「天性」懶惰，還是缺乏承擔，甚或是根本從小也不明白「當家作主」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民眾還是「依賴」別人為自己前路打點，政府在民生經濟上把香港的命脈一步一步交托別人，結果，香港人的命運、前途，不容得由自己掌握。

民主固然不是靈丹妙藥，但卻是一個自己掌握命運，以及解決大眾紛爭的平台。當連一個讓人平等地排難解紛的平台也欠奉，總有為數不少的人因而尊嚴被奪、權利被削，社會談何和諧？談何幸福？

一方面，民眾冷淡，冷嘲熱諷遠比鼓勵支持多；另一方面，投身民運的能人志士，多年來成績欠奉，叫人難以投下信任。有些思維僵化，手法沒有「因時制宜」，但立場、底線卻會「因時制宜」，令人無所適從、難以捉摸，遑論信任。有些空有理想，卻永遠埋頭於自己的小圈子，與社會形勢脫節，令人難以親近，遑論支持。有些志向遠大，雄辯滔滔，但卻自我排他，心計重重，即連民主同路人也敬而遠之，遑論能集結社會力量以對抗強權。

結果，老一代民運人士被批評為尸位素餐、不思進取，甚至越趨保守、激情不再。多年來，老一代民運人士只懂在強權勢力設下的框架內抗爭，步履被「遊戲規矩」限死。強權政府只要來一句「不合符《基本法》」或「如此手法破壞經濟，影響法治」，老一輩的，不是被嚇得龜縮立場，便是底線退縮。從來沒有打破不公平框架的勇氣，沒有脫離無理規矩的智慧。當在資源與人力已經遠遜對方的時候，連勇氣與智慧也不及對手，怎有戰勝的機會？說白點，就是顧忌甚多、自我限死在無形框架下，又怎敵得過「老奸巨猾」的對手呢？難怪三十年來，《明天會更好》、《自由花》、《抗戰二十年》等民運名曲，一年又一年的重唱再重唱，一年又一年的安撫大眾與激勵士氣，卻難見民主路上得到寸進。

結果，新一代民運人士被批評為有志難伸、內鬥在行、外鬥外行。在抗爭路上未見重大勝利，只見「階段性勝利」，卻先見內裏四分五裂，又或者口號激昂慷慨，卻還是欠缺藍圖，難以聚眾。當奮力與強權拼搏去爭取應有權益時，卻同時也因彼此私怨而互相駁火，例如你話佢示威完就「散水」，不懂打蛇隨棍上；佢就話你只懂在電腦面前「吹水」，講就天下無敵，做則不見出力，只是「鍵盤戰士」。一些則批評常高叫「平反六四」口號的人，「實質成績」不多，又未能「成功爭取」，倒不如「返大陸叫」；但高呼「平反六四」的，則反擊

對方只懂高叫「打倒共產黨」口號，但又沒有提供打倒方法，也不如「返大陸叫」吧！堅持公民提名的，批評不敢堅持的人是懦弱；而不肯高叫公民提名的，反擊對方過份理想化……總之，種種爭拗令外人不解，令內人心酸。

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進程不但未見實質進步，而且停頓不前，前路茫茫。參與民運之上，不是被強權玩弄於股掌之中，便是因為內裏的人事鬥爭而心灰意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經四散。立志爭取自己決定命運的人，本已經少得可憐，而彼此的私怨鬥氣，更令有志向者不斷退出。

縱使，三十年來，稱不上失敗，但絕不能說得上成功。

可是，前路還是有希望的。長江後浪推前浪，舊的老化或舊人離去，自有新人補上。舊的一波民運浪潮走向式微，新的一波民運浪潮自會取而代之。

不怕革命尚未成功，只怕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一日抗爭路還在，一日還是有希望。

成功與失敗，在乎實際成績，也在乎心態。老套說句，只要心態不死，信心不死，前路還能靠着雙手去闖。

每逢別人談及六四事件，總聽到甚麼「沒有六四鎮壓，就沒有今天經濟繁榮局面」的言論。一方面把社會貧富及權利嚴重不均的情況隱瞞，一方面把經濟看得比人的尊嚴更重；但如果人連基本的尊嚴與自由也沒有，那麼經濟再繁榮又有甚麼

用？還不是住在豪宅的寵物罷了。

爭取民主，爭取應有權益，不是爭取甚麼經濟利益，而是爭取人的尊嚴，爭取人應有的自由，爭取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如果連「人」也不是，談何幸福快樂？

每年，總會有紀念五四、悼念六四、參與七一的日子。但我們每年在行禮如儀般悼念當年的英烈，或懷緬當年的激情，年又復年的不斷在指定日子重複着指定的動作時，還記不記得當年先烈爭取的是甚麼？不論五四、六四還是七一，爭取的還不是一個公義制度，渴望公義制度能為創造美好社會帶來基本的條件嗎？所以，在特別日子「打卡」、「拍照」、「高舉燭光」的同時，平常也必需有爭取公義的心態。或許不用站在抗爭前線，但最少也應默默支持抗爭鬥士，或最少不要反對為社會公義抗爭之徒；否則，每年的「特別日子」，再誠心也是徒然。

或許再過三十年，還未能達到成功，甚至可以斷言，接下來的三十年，必定遇到大量挫折，但不要緊，抗爭就是講求鬥志，誰的意志堅定，勝利終歸屬誰；誰到最後還能站着，誰便是勝利者。只要不放棄，凡事迎難而上，心態不變，原則堅定，光明還是會來臨。

學賢人黃宗羲說句：「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抗爭運動史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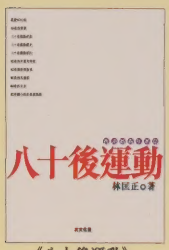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林匡正作品

香港本土社運全紀錄



《八十後運動》

《學民讀白》（主編）

《夾縫》

《香港大崩壞》

《激進》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香港公民抗爭三十年

- 有人的地方必有紛爭，有紛爭就必有爭鬥，此乃人性使然。而為自己謀求利益，甚或為大眾追求公義，也是人之本性。
- 不論甚麼社會，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爭取行動、抗爭運動、社會運動。抗爭文化、社會運動，是一個完整社會入面必然出現的元素。
- 自香港被割讓給英國，百多年來，發生一次又一次的抗爭運動、社會運動，不論經濟低沉期，還是商貿繁盛期，社運都會隨之而成。
- 有階級高低之分，就必定有抗爭，因為抗爭是指由下而上的反抗，是低下層人民，為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進而反抗上層統治者的行為。
-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的社會運動主體，除了以往爭取改善民生為主導，或從反殖去構建身份認同的抗爭，還加上了以爭取民主為主體的抗爭。
- 本書為香港開展民主運動的第三十個年頭，來個小總結，探討、剖析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的成敗得失。

剖析因由始末全紀錄

ISBN 978-962992351-8
11800
9 789629 923518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13 $118
ISBN : 978-962-992-351-8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　圖像：Jm.P